

2935  
2nd set.

# 歷史教學

2

24 FEB 19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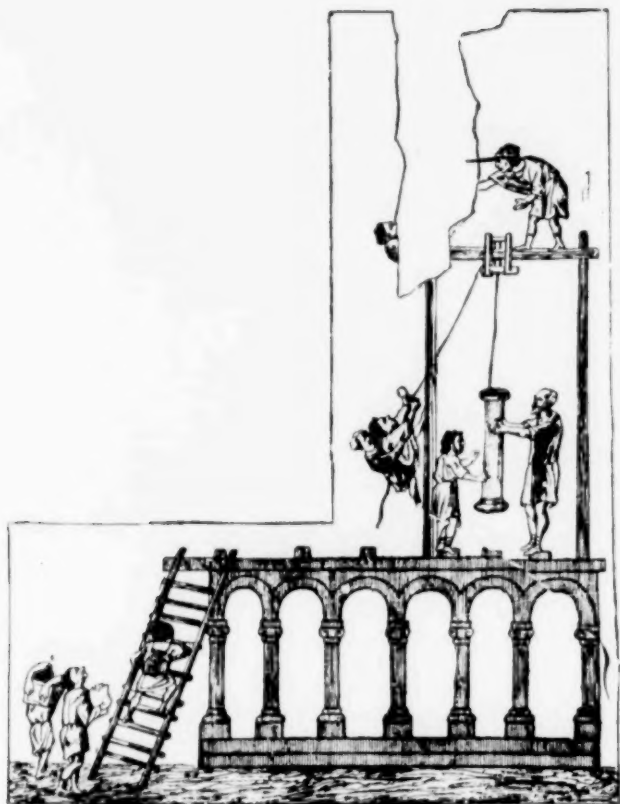
9512P

7 APR 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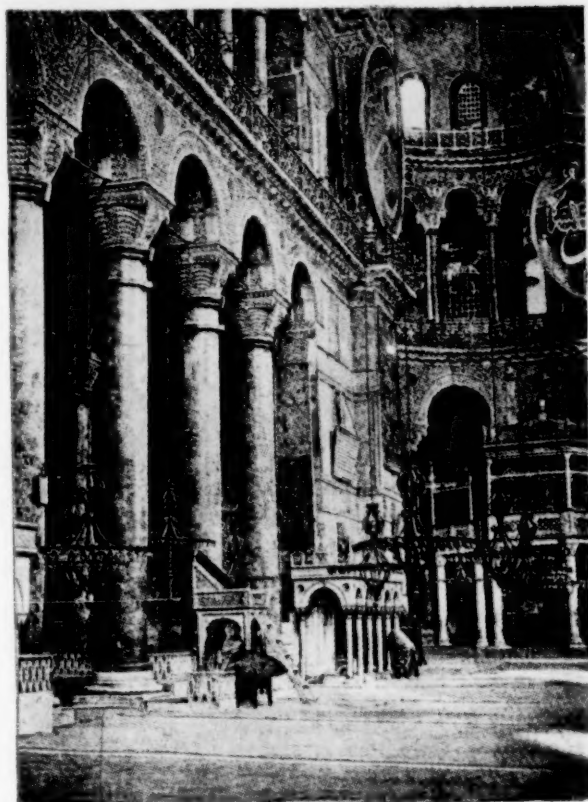
1958

## 世界歷史參考圖片 (二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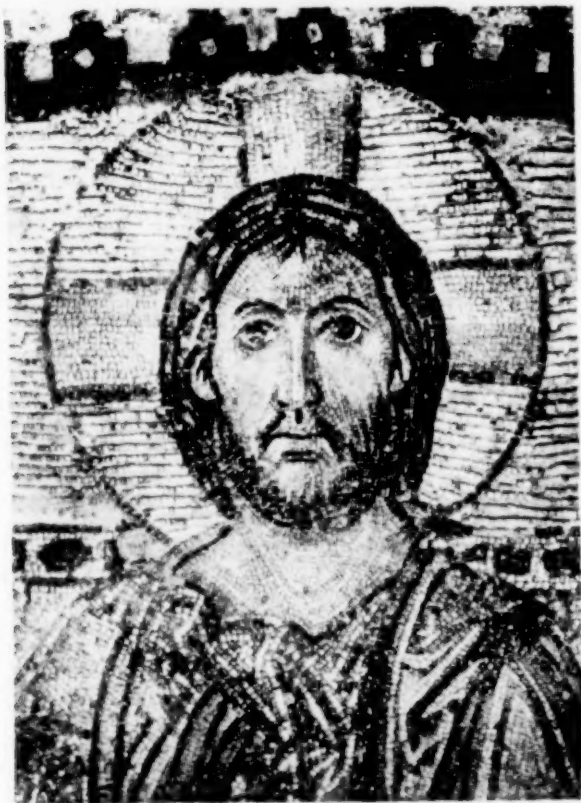
### 拜占廷帝國



圖一 劳动人民修建宫殿（拜占廷鈔本古書中的插画）。采自奧曼：“拜占廷帝國”，頁26。



圖二 聖·索菲亞大禮拜堂的內部。聖·索菲亞大禮拜堂興建於六世紀，是君士坦丁堡最著名的建築。采自奧曼：“拜占廷帝國”封面內插圖。



圖三 耶穌的頭部。九世紀時期拜占廷的鑲嵌藝術。采自林西：“拜占廷對於歐洲的影響”封面內插圖。



圖四 象牙雕刻（十世紀）。采自林西：“拜占廷對於歐洲的影響”，頁112。



## 理論學習

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孙定国 (2)

## 教學參考

义和团起义前夜清朝政府的对内和对外政策..... Г·В·叶菲莫夫 (13)

“沙基惨案”始末..... 余炎光 (21)

希腊化时期的文化..... 吴于廑 (24)

伊斯兰哲学对于中世纪时期欧洲经院哲学的影响..... 馬 坚 (32)

資料 世界中世纪史原始资料选辑(六)..... 耿淡如 译注 (35)

## 教學問題

加强历史教学的思想性与战斗性..... 刘 辉 (40)

在历史课中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初步体会..... 山东鄞城一中 馮伯端 (44)

世界古代史课程中进行无神论教育的经验..... X·M·沙比罗 (50)

初中古代罗马史的课堂复习..... 越南河内中华中学 戴日新 (55)

X X X X X X X

圖 片 中国历史参考图片(三十八)、世界历史参考图片(二十五)..... (封底里、封底; 封里)

### 历史教学

· 月 刊 ·

一九五八年二月号

(总第86期)

一九五八年二月一日出版

編輯者 历史教学月刊  
編輯委员会

出版者 天津人民出版社  
(天津锦州道六号)

發行者 天津市报刊推广局

訂野处: 全国各地邮局

代訂处: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者 天津市第一印刷厂

定价每册 0.30元

預定价目

三个月三期 0.90元

半年六期 1.80元

全年十二期 3.60元

本期印数1——30,700



# 理论学习

## 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孙定国

科学地解决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在革命的实践中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列宁在“反对抵制”一文中，極簡明、極深刻地揭示了这一问题的全部内容。他說：“馬克思主义与其他一切社会主义理論不同，它精妙地結合着两种特点：一方面是完全用科学冷靜态度来分析客观情势与客观进化行程，另一方面是極坚决地承認群众所表现的革命毅力，革命創造性和革命首創精神底意义，同时当然也承認那些善于探索并实现其与某些階級联系的个别人物、集团、組織和政党所表现的革命毅力，革命創造性和革命首創精神底意义。”<sup>①</sup>一方面是历史和革命发展的客观規律性的問題，一方面又是人民群众和个人以及政党的作用的問題，而在第二方面又首先是人民群众的作用問題，这就是这个问题的全部内容。把这两个特点精妙地結合起来，就是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論的特点。它本身既具有如此的重要性，而又充滿着深刻的辯証关系，我們就不能不全面地來考察它、握掌它。而特别是今天我們的国家正在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設，正在进行着政治战綫和思想战綫偉大革命的时候，來考察这个问题，是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本文主要談以下几个問題：

一、批判历史唯心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錯誤理論；

二、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創造者，是历史发展的決定力量；

三、人民群众的創造力量，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共产主义建設条件下才能得到充分發揮；

四、正确地估計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五、在实际工作中發揚党的群众路綫的傳統，貫徹执行集体領導和党内民主的原則，为克服主觀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作風而斗争；

六、在历史教学和研究工作中必須大力貫徹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原理，为徹底粉碎資產階級历史唯心主义和資產階級社会学的反动理論而斗争。

### 一 批判历史唯心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錯誤理論

历史唯心主义的社会观和历史观，不是从意志論出发，就是从宿命論出发。意志論者認為个人的智慧、个人的意志是決定一切的；宿命論者則又認為上帝或神的智慧和意志是決定一切的。不論是意志論者还是宿命論者，都不承認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它自己的規律性，都不承認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決定性的作用，它們殊途而同归地把人民群众排斥于历史发展的軌道之外。这两种思潮，是近代資產階級的社会学的主要思潮，而它的思想内容在實質上却仍然是过去的反动統治階級的統治思想的繼續和发展。

中国的封建思想家就曾經長期地喧嚷着：“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云从龙，風从虎，聖人作而万物睹”等愚民的調子。受到十九世紀德國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影响的英国的著名的封建階級思想家卡萊尔，在他的“英雄与英雄崇拜”中同样地得出如下的結論：“全世界的历史，即人类在这个世界上所完成的历史，依我的見解，實質上就是那些在地球上辛勤劳作的偉大人物的历史……这些偉人的历史，真正構成了世界历史的灵魂。”

黑格尔哲学所包含的“历史民族”和“非历史民族”的理論部分，显然是宿命論的历史观的一种表現；而尼采的超人哲学思想又恰恰是意志論的历史观的强烈表現。尼采說：“毫无疑义，人类与其說是目

① “論馬克思恩格斯及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39頁。



的,不如說是手段……人类不过是供实验的材料,一大堆多余的废品,一片瓦砾场”,而只有“超人”可以为了追求自己的权欲,在烈火和血泊中昂头前进。美国的实用主义者詹姆士和杜威认为历史就是人类心理活动的历史,杜威认为只有出类拔萃的人——也就是大资本家——才能管理国家。这也同样是露骨的历史唯心主义。黑格尔的理论被新黑格尔主义者加以扩大和发展来为帝国主义服务,尼采的思想成为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基础,詹姆士和杜威的思想成为美帝国主义的国家哲学——这都不是偶然的。因为这种“理论”对于垄断资本的扩张和进行帝国主义侵略战争,都是最好的护符。这种“理论”在旧中国,也曾发生过巨大的影响作用,胡适积极地宣传詹姆士、杜威的实用主义历史观,而把人们分成:中行、高明、沈潜三种性质,来符合詹姆士的哲学家有硬心派和软心派的胡说。他主张“好人政府”和“好人政治”,这些好人,就是他所说的“社会上的优秀分子”,只要这些分子“加入政治运动”,就可以组成“好人政府”,实现“好人政治”;他公开地推崇阎锡山是“模范督军”,吴佩孚是“很可钦佩”的“军事天才”,梁启超和張謇是“人心所归”的“中坚”,甚至于无耻地说:“日本一个小国,那末贫瘠的土地,那末少的人民,只因为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等几十个人的努力,……居然在半个世纪之内一跃而为世界五大强国之一。”正是在这种极为反动的历史观指导下,胡适才投入蒋介石的怀抱,寄居美帝国主义旗下而长期与中国人民为敌。胡风是意志论的热烈拥护者,由于和尼采哲学息息相关的叔本华、柏格森的哲学思想构成了他的反人民反革命的文艺理论的世界观的基础,因而在胡风的全部言论中充满着尼采的“超人”思想,他狂妄地吹嘘着“自我扩张”、“人格力量”、“主观战斗精神”等“理论”,他认为:“作家通过自己的精神力量,……创造出一个特异的、精神世界。”胡风把人民看成是虫豸和苍蝇,把人民的革命斗争看作是蠢动着的生活形象。正是在这种极为反动的历史观指导下,胡风才以反革命分子的身份长期地潜伏在革命内部来破坏革命。至于作为蒋介石的嫡系的反动理论家如陶希圣、陈立夫之流,不是重版封建阶级的反动历史观,就是抄袭法西斯的反动历史观,作为蒋介石的所谓“民族至上”(就是四大家族的至上)、“国家至上”(就是四大家族的至上)、“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理论基础,借以维持反动统治,屠杀中国人民。他们的反动理论同样是意志论、宿命论的变种,这只要看一看陶希圣(代蒋介石)所写的“中国之命运”和陈立夫所

写的“唯生论”就够了。

显然,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历史观,是有它的深刻的阶级根源的。它们作为历史上私人占有制的统治者,是不可能承认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决定性的作用的。因为它们承认了这一点,就等于否认了它们自己在历史上的统治地位。而只有唯心主义的历史观,这不论是意志论还是宿命论,才有利于它们对劳动者在经济上的剥削和政治上的统治。为此,这种历史观才成为阶级社会的长期的统治思想。

关于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问题,我们再分析一下梁启超以及俄国的民粹派的观点特别是分析一下伟大的孙中山先生的观点是有很大大意义的。

梁启超有两篇文章涉及了这个问题,而从这两篇文章都可以看出他对这个问题的惶惑莫解的情况。

一篇是“英雄与时势”。

他写道:“或云英雄造时势,或云时势造英雄,此二语皆名言也。为前之说者曰,英雄者,人间世之造物主也,人间世之大事業,皆英雄心中所蕴蓄而发现者,总謂世界之历史,即英雄之传记,殆无不可也。故有路得而后有新教,有哥倫布而后有新洲,有华盛顿而后有美国独立,有俾斯麦而后有德国联邦。为后之说者曰,英雄者乘时者也,非能造时者也,人群之所渐渍积累旁薄蕴蓄,既已持满而将发,于斯时也,自能孕育英雄,以承其乏,故英雄虽有利益及于人群,要不过以其所受于人群之利益而还附之耳。故使路德非生于十六世纪而生于第十世纪,或不能成改革宗教之功,使十六世纪即无路德,亦必有他人起而改革之者,其它之实例亦然。虽无哥伯尼,地动之说终必行于世,虽无哥倫布,美洲新世界终必出现。余謂兩說皆是也。英雄固能造时势,时势亦能造英雄,英雄与时势,二者如形影之相随,未尝稍离,既有英雄,必有时势,既有时势,必有英雄。”①

在这一段话里,可以看出梁启超对于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调和态度。他以“两说皆是也”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之,他就不可能解决英雄和人民群众的真实关系。我们看来,只有人民群众才是时势的决定者,也才是英雄的造就者。当然,我们并不排斥英雄的作用,而英雄的作用,只是由于他正确地反映了人群的需要和时势的需要。

另一篇是他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正是在这一篇里彻底暴露出梁启超的历史唯心主义思想,他抛掉了调和的态度走向了唯心主义的一元论。

他写道:“史界因果之劈头一大问题,则英雄造

① “饮水室全集”杂文类,第四十二册。

时势耶？时势造英雄耶？换言之，则所谓‘历史为数伟大人物之产儿’、‘英雄傳即历史’者，其說然耶否耶？罗素曾言：‘一部世界史，試將其中十余人抽出，恐局面或將全变。’此論吾儕不能不認為確含一部分真理。試思中国全部历史如失一孔子，失一秦始皇，失一汉武帝，……其局面当如何？佛学界失一道安，失一智顗，失一玄奘，失一慧能，宋明思想界失一朱熹，失一陆九淵，失一王守仁，清代思想界失一顧炎武，失一戴震，其局面又当何如？……此等人得名之曰‘历史的人格者’。何以謂之‘历史的人格者’？則以当时此地所演生之一群史实，此等人实为主动——最少亦一部分的主动——而其人面影之扩大，几乎掩复其社会也。”

在这一段話里，虽然梁啟超只說，罗素的話，含一部分真理，或者說英雄事实，最少亦一部分主动，似乎在这里还有一些伸縮余地，而在實質上他是承認了“英雄傳即历史”的理論。他在这里把杰出人物叫做是“历史的人格者”，而在后边又叫做是“首出的人格者”，并且进一步把这种“首出的人格者”加以时代化，例如他說：“战国之政治界，可謂为商鞅个性之时代化；晚明之思想界可謂为王守仁个性之时代化”，也就是說一个大人物的人面影的扩大，就可以掩复其一个社会，这正是他的历史唯心主义思想的具体表現。

总之，由于梁啟超所处的历史时代和他所代表的階級力量以及他从进步又轉向反动的政治地位，对这个問題，就不能不混淆不清以至于最后地坚持着唯心主义的观点。

俄国的民粹派在工人階級的馬克思主义政党出現之前，是以革命的姿態向着沙皇政府进行革命斗争的。可是民粹派有一个極端錯誤的英雄創造历史的理論。民粹派的米海洛夫斯基、拉弗洛夫等，錯誤地認為杰出人物和群众的关系，是“積極的英雄”和“消極的群氓”对立的关系。“消極的群氓”只有等待“積極的英雄”去解放他們，因此他們只能跟着英雄人物走，不能自己解放自己。为此，民粹主义者拒絕在工人和农民中間进行群众工作，而采取个人恐怖的斗争手段。民粹派者的这种“積極英雄”和“消極群氓”的理論和馬克思所曾經批判过的青年黑格尔派布鲁諾·鲍威尔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布鲁諾·鲍威尔就是把少数的出类拔萃的人物作为積極的精神和他們認為沒有生气的群众对立起来，他們認為劳动群众是“精神之敌”，是“惰性的物質”，是阻碍历史发展的力量，而只有批判的思維人物，才能够以他們的批判活动推动历史前进。

俄国民粹派的观点，不像梁啟超的观点那样混淆

不清，他們是斬釘截鉄地說積極的就是積極的，消極的就是消極的。无疑，民粹派認為只有英雄才能創造历史，而群众只能跟着英雄走。

孙中山先生的前期思想，这种民粹派的观点，也是十分显著的。他同样地把人类划分为几大类，他在“民权主义”的講演中曾有一段典型的說法。

他說：“我对于人类的分別，是何所根据呢？就是根据于各人天賦的聪明才力。照我的分別，應該有三种人：第一种人叫做先知先觉，这种人有絕頂的聪明，凡見一件事，便能够想出許多道理，听一句話，便能够做出許多事業。有了这种才力的人，才是先知先觉。由于这种先知先觉的人，預先想出了許多办法，做了許多事業，世界才有进步，人类才有文明。所以先知先觉的人，是世界上的創造者，是人类中的发明家。第二种人叫做后知后觉，这种人的聪明才力，比較第一种人是次一等的，自己不能够創造发明，只能夠跟随摹仿，第一种人已經做出来了的事，他便可以学到。第三种人叫做不知不觉，这种人的聪明才力是更次的，凡事虽有人指教他，他也不能知，只能去行。照現在政治运动的言詞說：第一种人是发明家，第二种人是宣傳家，第三种人是实行家。天下事業的进步，都是靠实行，所以世界上进步的責任，都在第三种人的身上。”<sup>①</sup>

显而易见，孙中山先生这种对于人类的划分法和俄国民粹派的两种人划分法，基本上是一致的。虽然是多了一个后知后觉的中間層，但这个中間層实际上还是属于第一类。特別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孙中山先生指出：世界上进步的責任都在第三种人身上，这总是比俄国民粹派要高明得多。可是在后边他又以建筑为例：繪圖的工程师是先知先觉，看圖的工头是后知后觉，砌磚盖瓦的工人是不知不觉。显然，这个砌磚盖瓦的实行家，按照他的說法总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力量，却依然还是一个不知不觉的被动的消極力量。

因此，可以斷定孙中山先生的前期思想，民粹主义的色彩是十分濃厚的，而且在他的政治活动上也有所表現。孙中山先生初期所領導的革命还没有充分注意到群众运动，就是最好的証明。

但是接受了十月革命影响和中国共产党幫助的孙中山先生，就大大不同了。誰都看到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使被人冷淡的旧三民主义轉变为被人欢迎的新三民主义亦即革命的三民主义。而新三民主义的重要革命表現之一，就在于孙中山先生注意到工农群众的問題。他說：“吾人欲証实民族主义实为健全之反帝国主义，則当努力于贊助

① “孙中山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31頁。



国内各种平民阶级之组织，以发扬国民之能力，盖惟国民党与民众深切结合之后，中国民族之真正自由与独立，始有可望也。”（“孙中山选集”，下卷，第525页）他又说：“中国以内，自北至南，自通商都会以至于穷乡僻壤，贫乏之农夫，劳苦之工人，所在皆是。因其所处之地位，与所感之痛苦，类皆相同，其要求解放之情，至为迫切，则其反抗帝国主义之意，亦必至为强烈。故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同上书，第527页）中山先生的晚年革命生活不断地注意到工农的组织 and 武装，正是他在政治思想上重大进步的表现。他在遗嘱中说：“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就可以看出他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比他的革命初期发生了如何重大的变化。当然，还必须指出，就是这样，孙中山先生还是不可能真正在科学的基础上认识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的力量的。

从以上这些例子，就可以看出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的特殊意义。

这就是说：曾经一度在中国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的梁启超，以及在俄国曾经一度认真进行过反对沙皇斗争的民粹派，特别是我国的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先生，在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这个问题上，也是有着而且是不能不有着历史唯心主义的观念的。而事实证明，持着这种观点去进行革命斗争，是不可能取得真正彻底的胜利的。除开从改良主义立场最后走上保皇党立场的梁启超不说，俄国的民粹派是真的用炸弹把沙皇亚历山大第二炸死，可是炸死了亚历山大第二，又出来了一个亚历山大第三。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之下也真的造成了颠覆清政府的伟业，可是代之而起的却是袁世凯的称帝和北洋军阀的混战。

这就说明了英雄创造历史的观点，不仅可以像公开的意志论、宿命论那样用以巩固反动的统治阶级利益，而且也可以导致那些好心好意的革命家（那怕是不屈不挠的伟大革命家）所领导的革命事业遭受失败。俄国民粹派（指它们还在革命的时候）特别是中国的孙中山先生就是显著的例子，更用不着说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了。

必须指出，要完全科学地解决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作用的问题，正像和发现马克思主义的其它原理一样，并不是一件随随便便的事情，它一方面依赖历史的客观发展提供了可能的条件，而另一方面则是彻底的革命的阶级立场问题。

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人们已经有可能发现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而在这个客观规律性的被认识的

过程中，提供了科学地认识阶级斗争的历史作用的条件，同时也就是提供了科学地认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决定性的作用的条件，作为无产阶级的思想家——马克思和恩格斯首次地、科学地解决了这个几千年来极为混乱和复杂的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早期著作“神圣家族”一书中，尖锐地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布鲁诺·鲍威尔把劳动群众说成是“精神之敌”和“惰性的物质”的“英雄创造历史”的反动理论。

在这里有必要转抄列宁“哲学笔记”中的一段话，在这一段话里，可以明白地看出马克思批判鲍威尔的论点的尖锐性，也可以明白地看出马克思在解决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的思想的深刻性：

“〔第88页——90页〕。这一小节（第六章：《绝对的批判的批判，或布鲁诺先生所体现的批判的批判》。（1）绝对批判的第一次征讨。（a）《精神》和《群众》）极其重要，这里批判了这样一个观点：似乎由于群众关心历史，似乎由于依靠群众（群众是满足于对“思想”的“表面”理解的），因而历史是没有成效的。

《因此，如果绝对的批判为了《表面性》而真的谴责什么东西，那末这就是谴责过去的全部历史，因为历史上的事业和思想都是《群众》的事业和思想。绝对的批判推翻群众的历史并打算用批判的历史来代替它（参看尤利·孚赫先生的论英国生活中的迫切问题的文章）。》〔第88——89页〕

《《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它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另一方面，不难了解，任何得到历史承认的群众的《利益》，当它最初出现于世界舞台时，在《思想》或《观念》中远远地超出自己的实际界限，很容易使自己和人的一般利益混合起来。这种错觉构成傅立叶所谓的每个历史时代的色调》——用法国革命的例子阐明了这点，并说出了一句名言〔第90页开头〕：

《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范围的扩大。》

在鲍威尔那里，精神和群众的分离达到了何种尖锐的程度，这可以从下面那句遭到马克思抨击的话中看出来：《精神的真正敌人应该到群众中去寻找，而不是到其他什么东西中去寻找。》〔第90页〕

马克思回答说：进步的敌人是已经独立存在着的（Verselbständigten）、群众自卑的产物，但这种产物不是观念的，而是物质的、外在的。早在1789年路斯达洛编辑的报纸上就有过这样的箴言：

伟人们之所以看起来伟大，

只是因为我们在跪着。



站起来吧！”①

从这一段引文中，就可以看出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成为共产主义的开山大师，正是由于他們在青年时代，即已科学地提出了“历史是人民群众的历史”的光輝理論，他們把这个理論，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基石之一。馬克思在这里所說的“历史上的事業和思想都是‘群众’的事業和思想”，“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業，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范围的扩大。”——这些極為深刻的天才思想，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日益放射出无限的光芒来。

偉大的列宁，繼承了、發揮了馬克思和恩格斯这一天才思想，当俄国工人階級日益成为能进行有組織的革命斗争的强大先进力量的时候，曾經遇到过民粹派的思想阻碍。在当时还是馬克思主义者的普列哈諾夫首先批判了民粹派的錯誤观点。可是这个斗争的徹底胜利，是由列宁光輝地完成了。（当然还必须指出，在后来，斯大林在这方面也作出了重大的貢獻。）大家知道，俄国革命正是由于徹底粉碎了民粹派的观点而大踏步地前进了，通过二月革命发展成为轟轟烈烈的群众性的十月革命。而依靠工人階級、依靠群众自己的力量来进行革命的斗争并取得革命的徹底胜利，乃是十月革命極偉大、極優良的傳統之一。

我們党的中央和毛澤东同志，对于馬克思主义的这个原理始終予以高度注意，并且繼續着、發揚着光輝的十月革命的傳統，在中国革命的每个阶段上，都对党内的任何脫离人民群众的傾向进行批判，同时对于封建階級、資產階級的历史唯心主义的思潮进行不妥協的斗争，从而使中国人民贏得兩次革命的偉大胜利。

馬克思主义者不能不注意到：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事業，是人民群众的事業，而人民群众的事業，是不可能不由人民群众自己起来进行斗争而能够取得和巩固胜利的。同时，馬克思主义也还不能不注意到：我們承認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决定性的作用，决不是否認杰出人物的作用，正如列宁所告訴我們的一样，我們必須全面地来考察这个問題。

## 二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創造者，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

馬克思主义既然指出决定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是物質資料生产方式，階級社会的发展动力是階級斗争，这就会自然而然地进一步得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創造者、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的結論。

既然社会发展的历史，是生产发展的历史，是生产方式也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历史，那末，它就不可能不是物質資料生产者本身的历史，就不可

能不是劳动群众的历史。因为，只有它們，才是生产过程中的基本力量，沒有这个基本力量，就不可能創造出为社会生存所必需的物質資料。也同样是十分显然的，階級斗争既然是階級社会发展的动力，在階級社会里，新的生产力突破旧的生产关系是通过階級斗争来实现的。而人民群众又是决定着进步的、革命的階級取得斗争胜利的主要力量，沒有这个主要力量，就不可能冲破旧生产关系的桎梏，解放新的生产力。毛澤东同志說过：“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显然是絕對無疑的。

关于这个問題，我們將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分析：

### （一）人民群众在創造社会物質財富中的作用。

恩格斯在他的“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中說过：“政治經濟学家們肯定說：劳动是一切財富的源泉。劳动确实跟自然界一起是一切財富的源泉：自然界提供劳动以材料，而劳动把材料变为財富。但是劳动的意义还远不止于此。它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并且是重要到如此地步，以致我們在某种意义上應該說：劳动創造了人本身。”②恩格斯在这里是說，首先，是劳动創造了人类本身，而劳动又把自然界的材料变为社会財富，从而，劳动是整个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基本条件。也就是說劳动創造了人类本身而劳动又延續了人类整个历史。这就可以明白看出：劳动，同时也就是劳动者在人类历史发展上的最基本的和最重要的作用是什么了。人类是要吃、要穿、要住、要行的，而这一切都必需一定的物質資料。而要生产这些物質資料，就必须生产这些物質資料的生产工具和使用这些工具。一切社会財富，除非自然界所供給的材料外，起决定作用的是劳动者。劳动者是創造这些社会財富的真正負担者。中国古書上講：“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按我們的观点看来，这个人，不是抽象的人，而只能是劳动的人，亦即劳动者。

从整个历史的发展看来，从第一把原始的石刀石斧一直到今天的苏联的現代的原子发电站，也就是从人类的石器时代直到原子能时代，人类在生产工具的发展上是日益翻新的。可是，任何生产工具的出现和使用，是和劳动者的双手分不开的。以我国为例，即可以充分說明这一点。旧石器时代，中国猿人創始了无定型的原始石器和骨片工具，河套人、山頂洞人在石器方面已有了新的进步（尖狀、刮削、斧狀石器等）；

① 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2—13頁。

② “馬克思恩格斯文选”兩卷集，第二卷，莫斯科中文版，第80頁。

新石器时代，在赤崁紅山发现的新石器中有磨制的石斧、磨制的带孔石刀，有较大的犁状的打击石器，也还发现了石磨盘、石棒和石杵等；仰韶文化系统的新石器有磨制的石斧和石刀；龙山文化系统的新石器亦有磨光的石器，同时还有蚌器；长江以南东南沿海一带，也有同样发现。这就说明了我们的古老先人，在脱离了猿猴世界之后，为了自己的生存，在生产工具的创造上，就是根据今天考古学家所能够掌握的材料已是大有可观了。而随着生产工具的发展，在紅山已有范纹陶器，仰韶文化以彩陶著称，龙山文化又以黑陶著称，长江以南地区以拍印的几何纹的硬陶器为其主要特点。从陶器的发展上可以看出我们古老先人如何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日益创造着新的社会财富，而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仰韶文化遗址中兽骨是很多的。经过兽骨鉴定证明，当时对猪的饲养是很发达的；龙山文化的遗址中关于兽骨的鉴定就发现有狗、兔、马、猪、獐、鹿、麋鹿、羊、牛等九种之多，其中以猪骨、狗骨为最多。这可以证明当时的牧畜业已有相当发展。而从各种排具、陶器及其他迹象看来，农业种植也有一定发展。这就又说明了他们在和自然界的残酷斗争中，已在改变植物、驯服动物方面作出初步成绩。中国神话中所歌颂的神农氏、伏羲氏、燧人氏的功德，事实上就是对这些古老先人的集体劳绩的歌颂。

从石器生产进入金属工具生产的新时期，劳动者的伟大创造力量有进一步的发展。即以殷代重达一千四百斤的司母戊鼎而言，已经完全可以看出在当时青铜器的发展程度。在当时由于金属工具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显然已经开始了人们之间的阶级分化，而在奴隶主占有制的社会里只有奴隶才是劳动的负担者。当时的社会财富，比以前是大大地增加了。卜辞中所见的农作物以黍为最多，麦次之。黍、麦已成为当时的重要食粮。蚕、桑、丝、帛等字亦屡见于卜辞，证明殷代奴隶主已经穿上了美丽的丝织衣裳。关于西周，即根据“诗经”的某些篇章，已可以看到生产发展的情况，例如：“周原膴膴”，“黍稷薿薿”，“花蓂蓂蓂，禾役穰穰，麻麦幪幪，瓜瓞嗶嗶”（生民之什），

“曾孙之稼，如茨如梁，曾孙之稼，如坻如京，乃求千斯仓，乃求万斯箱，黍稷稻粱，农民之庆”（甫田篇）

——这些生动的句子，正是生动地描写了当时的农业盛况，而特别是周族发现了比黍、麦更为易于种植和更为普通的新的粮食品种——稷，这是对农业的一大贡献。牧畜业和手工业，西周比殷代亦为前进。春秋战国时期，由于铁的比较广泛应用，又大大地提高了生产力，促进了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在战国时代如齐、楚、韩、赵、魏、秦

若干国家的城堡，变成了繁荣的城市；齐国的临淄人口达七万户，万户之邑已所在多有，魏国的大路上，晝夜马车络绎不绝，即可见当时的劳动者，贡献给社会的财富越来越大了。事实证明，从奴隶主占有制社会发展为封建社会，生产的发展是必然的，劳动人民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也是必然的。

中国的封建社会为时较长，生产工具的改进较慢，可是劳动人民在几千年来支付了高度的劳动，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造成了周秦以后汉、唐、宋、明几个封建经济重要发展的时期。即在生产工具的改进上，也可以看出劳动者的创造力量。在这里我们应该感谢宋代的沈括和明代的宋应星这两位伟大的学者。前者写出“梦溪笔谈”，后者写出“天工开物”，这是两部古代稀有的注意生产的著作。在这两书中把劳动人民在生产上的创造，作了重要的描写和概括（特别是“天工开物”）。从这两部书以及其它材料方面，清楚看出在封建社会条件下，劳动人民对生产工具的改进的惨淡经营坚持不懈的努力。从秦汉到明代之前，在农业主要生产工具的发展上，有耨犁、踏犁、连枷、耨耩、拖耙等；在水力工具的发展上有筒车、牛车、踏车、拔车、桔槔、轱辘等；在纺织工具方面有木棉搅车、纺车、纰车等；而在采矿和锻冶工具方面有鑿井机、吸卤机和水力冶铁鼓风炉等；在交通工具方面，草船之类亦不断发展，甚至有使用转动机的千里船等。这些工具的制造和改进，往往是数百年才发生若干变化，可是这个变化，就是数百年来劳动人民生产经验的积累；而且有些工具，直到今天在生产中还起着重要的作用。

在我国古代的生产发展历史上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我们先人的劳动创作提供了全世界意义的贡献，这就是关于纸、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的发明。尽管这些发明，往往是和某些个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例如说：纸是汉代的蔡伦发明的，印刷术中的活字铅，是宋代毕升发明的，可是据历史学家考证，他们的发明，无例外地都是集中了多少年来的劳动者的创造结果。即以纸为例，蔡伦是在公元105年把试制成功的纸送给当时的皇帝，可是历史证明在公元前一世纪末年以来中国即有用丝絮造成的纸，为此，纸字是从蔡而氏声的。这就是说，蔡伦并不是纸的首次创造者，而是纸的重大改进者。当然，这并没有减轻蔡伦的功绩，而正是说明了他总结了劳动者的创造经验而又改进了它。至于其它的发明，也正是如此。这几项伟大发明的世界意义，已是全世界人们所公认的了。

而这种劳动人民的创造在世界上的任何民族都是一样的，在这里用俄国的托尔斯泰的一段有名的话来



总结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劳动业绩也是完全一样的。这段话就是：

“我正在读索洛维约夫的历史，彼得大帝以前的俄国一切都不像样子：残暴、抢劫、强制、粗鲁、愚笨、低能。……俄国的历史是一团糟构成的。”

可是，这一团糟，怎样会产生一个伟大的统一的国家来呢？

读到那些关于抢劫、统治、战争、破坏的问题（历史上所谈的也就是这些）的时候，自然就会想到一个问题：那些被破坏了的东西，是谁制造的？是谁怎样用粮食养活了全世界的人们？是谁制造出了丝绸、呢绒、衣衫、锦缎，叫皇帝和贵族们穿着出风头？是谁捕来了赠送给外国使节的玄狐和黑貂？是谁采掘了金矿和铁矿？是谁饲养了马和牛羊？是谁建筑了房屋、宫殿和教堂？是谁运来了各种各样的商品？……”

作为宗法社会农民代言人的托尔斯泰，在这里肯定了劳动人民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虽然他是说俄国的历史说的，可是同样地适用于我国，适用于全世界的各个民族。

封建史的结束开始了人类的资本主义的新时期，这个时期，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说：“资产阶级既将一切生产工具迅速改进，并使交通工具极臻便利，……资产阶级占得阶级统治地位还不到一百年，而它所造成的生产力却比先前一切世代总共造成的生产力还要宏伟众多。自然力的被征服，机器的采用，工农业上化学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交通，电报的传达，一洲一洲大陆的垦殖，河川的通航，好似从地底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试问从前哪一个世纪能料想到有这样大的生产力沉眠在社会劳动里面呢！”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斩钉截铁地说：“资产阶级所靠着形成起来的生产和交换工具，是在封建社会里面造成的。”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所回答的问题，告诉了我们资本主义社会所爆发出来的强大生产力，正是在千百年来劳动艰苦创造的基础上之诞生的，没有千百年来劳动者的生产积累，就不可能出现资本主义社会的强大生产力。而在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资本主义的兴盛和产业革命分不开的，而产业革命又是和蒸汽机的发明分不开的，而蒸汽机的发明大家又公认那是和英国一个平凡劳动者——钟表匠瓦特的名字联结在一起的。正是由于蒸汽机的发明和改进，进一步地在生产上获得了普遍的应用，实现了伟大的产业革命，才使伟大的工人阶级为资本主义社会创造了一——如同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为过去任何世纪所不曾有过的社会财富。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成千成万的工厂和商店，插

入云霄的摩天大楼，纵横散布在大地和海洋上的轮船交通网，无一不是工人阶级和劳动者的双手造成的。没有工人阶级和劳动者的创造力量就不会有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虽然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较为迟缓，可是中国的工人阶级也同样地随着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我们国家如同上海、天津等现代化的城市，创造了我们国家多少世纪所不能积累起来的社会财富。

总之，从有人类历史以来，从原始社会一直到几千年来的阶级社会，只有人民群众，也就是劳动者，才是生产工具的创造者和使用者，也只有他们才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在原始公社的时候，人们的全体都是劳动者，大家共同制作工具，共同创造社会物质财富，而在阶级社会里，则只有劳动者才从事于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因而劳动者在人类历史任何时期都是必需的，都是历史的主人。为此，恩格斯在他的“社会上的阶级——必需的和多余的”一文中写道：

“这个疑问常常发生：社会上不同的阶级，在什么程度内是有用的甚至必需的呢？回答自然是按照各个不同的历史时代而有分别。无疑的，封建贵族曾有一个时期是社会上不可少的与必需的成份；然而那是很久很久以前了。以后有一个时期资本主义中等阶级……同样应不可少的需要而起与封建贵族作斗争，打破它的政权，并接替它成了经济和政治上的支配者。但自阶级产生以来，从没有一个时期社会上可以不要劳动阶级的。那一阶级的名称和社会地位已经改变了；农奴代替了奴隶，自己又被自由工人……所代替。但这是明显的：无论社会底上层的、不生产的等级发生什么变更，没有一个生产者阶级，社会就不能生存。所以，这个阶级在一切情况下都是必要的——虽然这样的时代定要到来，届时它将不再是一个阶级，而是包括全社会的。”②恩格斯对于劳动者作如此的历史评价，首先是由于劳动者阶级，是生产的负担者，而如果没有劳动者的生产，任何社会都是要遭受灭亡的。

（二）人民群众在哲学、科学、艺术等精神领域中的作用。

资产阶级的社会学，往往企图把人民群众排斥在人们的精神活动的领域之外，也就是把人民群众排斥在科学、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之外，他们认为：这些领域是天才人物当然活动的场所，普通的人们是无权过问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莫斯科中文版，第13页。

② 恩格斯：“英国工人运动”，工人出版社1951年版，第60—61页。



这显然也是一种極大的歪曲。

馬克思主义从来也不否認偉大的哲學家、科學家、文學家、藝術家們在人們的思想、精神領域的貢獻，可是就是在这个領域里，人民群眾也是起了重大作用。這就是因為社會生活既然是以生產為基礎的，既然勞動人民在生產領域中起決定性的作用，那末，在精神領域里，就不可能把勞動人民拋擲出去，而認為這是和他們毫不相干的。盡管在奴隸社會里發展了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分工，腦力勞動在幾千年來的階級社會里，成為剝削階級的壟斷物，可是勞動人民在這幾千年來的被奴役的生活中，仍給人們的精神生活、文化生活創造了堅固的基礎和豐富的源泉。

即以哲學而言，列寧就曾經指出過：哲學唯物主義是人民群眾的自發唯物主義提高到了科學的水平。即以哲學的根本問題——思維對存在的關係而言，正是勞動者在生產實踐中逐漸摸索、了解人對自然界的關係而首先提出的。無論古希臘、古印度、古巴比倫、古中國的自發的唯物論，幾乎都是從和生產直接有關的東西例如水、火、風、土、木等物質要素開始認識世界的，這就是最大的證明。中國古代的五行說，在其原來的又意講來，顯然是被當作物質的實體來對待的，而對於天的懷疑例如：“天命不徵”、“天命靡常”等，這恰是勞動者反對當時的統治者以及反對天命的正義的呼聲，而在這種呼聲里，顯然已經包含着深刻的哲學思想。而哲學家們，只不過是總結了和概括了這些思想而發展成為他們自己的體系而已。古代是如此，近代亦無不同。為馬克思和恩格斯所稱贊的德國的狄慈根獨立地接近了辯證唯物論的思想，就是杰出的例子之一。當然我們絲毫不忽視在階級社會里，由於勞動者的生活條件和文化的限制，要由他們自己創造出一種完全賦有科學形態的哲學體系也是不可能的，這同樣可以狄慈根作例子。可是這又絲毫也不削弱勞動者在這個領域中的貢獻，如果說哲學脫離不了生產鬥爭和階級鬥爭的基礎的話，誰也就無法把勞動者排斥在這個領域之外。從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觀點看來，我們的辯證法和我們的唯物主義，正是在人民群眾的實踐中而日益發展着。哲學工作者的責任，就在於將研究和分析這些實踐所提出來的新的問題，加以總結加以概括，使之成為系統的理論的東西，又回到實踐中去提高實踐。一切經典作家從馬克思以來就是這樣作的。任何哲學工作者都必須以此為準繩，而不應狂妄自大，自認為哲學思想是從自己的頭腦中產生的因而脫離群眾，脫離實踐。如果是那樣，那就是唯心主義而不是唯物主義。

關於其它科學也必須如此說。

科學家都知道，科學的發展是和社會的生產的發展緊密相關的。由於牧畜業的需要，促進了算術的產生，由於農業和建築業的需要，促進了幾何學的產生，由於航海事業的發展，決定了天文學的產生。而這些科學部門的產生，正是千千萬萬人民群眾所累積起來的經驗的科學概括。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看來，少數有名的科學家的偉大貢獻，總是在多數的無名的科學家的創造基礎之上發展起來的。而這個多數無名的科學家也就是勞動人民。這不論是英國的達爾文還是俄國的米丘林，都是從這條道路走出來的。中國古代著名的數學家祖沖之在數學上的成就，著名的醫學家李時珍在醫學上的成就，也正是如此。中醫的古代典籍，不用說“皇帝內經”和張仲景的“傷寒論”，都包含着深刻的醫學理論思想，即如“神農本草經”一書，大家已公認是東漢末年的書，而其中包含的藥目即達三百六十五種，不僅評分藥性、藥味，而且詳分其“君”、“臣”、“佐使”的功能，其中值得我們後人深入挖掘的東西，據專家判定，是十分豐富的。試問我們先代所進行的這樣龐大的工作，不是來自千百年來勞動人民的長期經驗的積累，能不能有另外第二個來源呢？古傳神農嚐百草，神農大家公認是勞動者，當然我們知道嚐百草的不是某一個時期的一個神農或者兩個神農的事，而是多少年代的成千成百個神農的事。神農的名字正如神話中其他的偉大的名字一樣，它們都是代表多數，都是偉大的集體的代詞。關於張仲景、吳普、華佗、孫思邈、李時珍等偉大的醫學家，只不過是總結了這些無名氏的創造，而奠定了中國醫學的科學基礎而已。顯然，即此一端也完全可以看出勞動者對於科學的貢獻是如何巨大了。當然，我們還必須進一步指出，在二十世紀的科學發展，已經進入嶄新的原子能時代了。而在偉大的1957年，蘇聯的科學家，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之下，提供出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創造力，使人造衛星飛上了天，從而开辟了人類征服自然界的新紀元。可是我們有理由相信，蘇聯的科學家和全世界的進步科學家們都會把這種奇蹟，看作是世世代代的勞動人民和自然作鬥爭的劃時代的新結晶！因為凡是真正具有科學良心的科學家，總是不把自己的科學創造和勞動人民的勞績分開。

關於談到文學藝術，正如高爾基所告訴我們的：

“最深刻、最鮮明，在藝術上達到完美典型乃是民謠，勞動人民的口頭創作所創造的。”他還說：

“如果不知道人民口頭創作，那就不可能懂得勞動人民真正的歷史，而人民的口頭創作是不斷地和決定地影響到最偉大的書本文學作品的創造的。”

魯迅也發表過和高爾基相同的意見，他說：民間

文学虽不如士大夫文学的细致，但却刚健清新，它能给旧文学一种新的力量，旧文学衰頹时，往往因摄取了民间文学的力量而起了一种新的变化。

正是像高尔基、鲁迅这样伟大的世界文豪，才会对这个问题具有这样无比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解。

显然，这并不需要举出伟大的俄国作曲家格林卡的音乐创造的例子，也不需要举出歌德的关于“浮士德”或者是塞万提斯的关于“唐·吉珂德”的创作的例子来说明问题，只要稍为回忆一下我们国家在文学艺术上的发展历史就足够了。

谁都知道，在我国文学记录下来的较早的古诗之一叫作“击壤歌”，它的歌词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这首歌词，充满了劳动人民的生活气息，而且显示出他们坚决不相信不管是天上的还是地上的帝力的素朴的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这首诗既然是在打着土地而歌唱起来，那就显然不是出自文人墨客的笔下，而是出自劳动人民的口头。诗三百篇，尽管后代的注释家多半把它说成是朝廷宫闈的东西，就连一首恋诗也要强拉上文王后妃，而在实际上，“诗经”的绝大部分都是劳动人民的作品。“离骚”的作者屈原正是吸收了大量的民间歌谣写成了杰出的文学作品楚辞。关于后来汉代的乐府，六朝的新乐府，唐、五代的词，宋、金、元、明的曲，这些在文学上各种新文体的创造，几乎没有一个不能从民间文学找到它的发展渊源的。至于明清的民歌的发展，如“宝卷”、“弹词”、“鼓词”之类，又使我们直接可以看出民间文学的多采性。正由于民间文学存在着像这样丰富的宝藏，因而在中国的文学艺术史上几乎形成这样一条规律，往往是开始是民间的东西，而尔后又通过文人墨客把它变成适合于宫廷的东西，而当某种宫廷文学表现出一种衰頹现象，使它又不得不被迫从另一种新的民间文学中吸取生存的力量。当然当某种民间文学“上升”为宫廷的东西之后，它就受到歪曲和桎梏，使它受到某种定型的规格的约束，以至于最后发生本质的变化。可是民间文学的这种遭遇，并不是它的主流的发展趋势，而最重要的是在于民间文学的广大而深远传播，有力地提供了伟大的诗人、伟大的小说家和戏剧家从事创作的巨大源泉。诗人杜甫、白居易的诗创作是这样成长起来的，小说家施耐庵、罗贯中、吴承恩等的小说创作也是这样成长起来的。显然，像“水浒传”、“西游记”等那样的作品，不是在长期的民间口头文学的基础上的加工，是谁也不能够写得出来的。关于戏剧作品中的“白蛇传”、“梁山伯与祝英台”、“十五贯”等也是如此。试问民间文学为什么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呢？这就是因

为它是来源于人民的，是生根于群众的生活之中的。它反映了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反映了人民的欢乐和悲哀，同时也反映了人民的理想和幻想。正因为是这样，它才能成为优秀的文学家艺术家创造的基础，从而赋予了他们的作品的现实性、人民性以具体的内容。

由此可见，高尔基和鲁迅对于民间文学的崇高估价问题，正是和文学和艺术创作的源泉问题联系在一起的，而人民群众在文学艺术上的作用正是从这个根本问题上着眼才能获得根本的解决。

这在我国近代和现代的文学艺术的创作史上更足以说明这一点。关于鲁迅的作品不需要再说了，就是鲁迅以后的我国优秀作家的作品，例如“李有才板话”、“小二黑结婚”、“白毛女”、“铜墙铁壁”、“万水千山”、“三里湾”等，又有哪个作品不是严格地遵守这一条而能有所成就呢？

离开了人民群众，离开他们的生活和斗争，离开了创作的真正宝藏和源泉，也就根本不可能产生好的作品。这就是为了什么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路线而和胡风的反动文艺理论进行不妥协的斗争。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曾深刻地阐明了这个问题，他说：“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sup>①</sup>

马克思主义对于人民群众在文学艺术上的作用的估价就是如此。

显然，根据以上的分析，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企图把人民群众排斥在哲学、科学以及文学艺术等精神领域之外，乃是完全的歪曲。

今天把这个问题讲清楚，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从这次反右派斗争中，暴露出许多知识分子的弱点，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王国。他们错误地认为人类的智慧，只有在他们头脑中才存在着。他们看不起工人和农民。他们认为知识分子是凌驾于劳动之上的“人上人”。而所有这一切都是障碍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接受社会主义思想改造、使自己迅速地成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主要阻力。我们认为作一个新中国的知识分子，必须从这次斗争中，接受经验教训，通过生产的实践，阶级斗争的实践，科学研究的实践，牢固地建立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二版，第862页。



起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必須坚决相信：不論哪一門科学和文学、艺术的发展都是离不开劳动人民的。只有这样，然后才有可能把自己变成一个和劳动人民血肉相联的科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任何知識分子，只要輕視劳动人民和脱离劳动人民，他就必然輕的是进步退緩，重的是被历史抛弃！

### (三) 人民群众在阶级斗争中的决定性的作用

我們說，人民群众在阶级斗争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首先是指的在社会的革命变革的时候。劳动者是革命事业的真正負担者。在阶级社会里，社会的革命变革是新的生产力突破旧的生产关系、新的生产关系代替旧的生产关系的斗争，在这个斗争里首先是作为生产力的工具因素创造了改变生产关系的客观物质条件，然后决定胜负的是作为生产力的人的因素，也就是劳动者所积极参加和积极进行的革命斗争，沒有他們的斗争就不可能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冲突。为此，奴隶和奴隶主的斗争，农民和封建主的斗争，工人和资本家的斗争，便是阶级社会经济形态的变革和发展的基本动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馬克思才指出，当一切旧社会孕育着新社会的时候，暴力就是它的产婆。尽管有些劳动阶级，例如奴隶或者是农民（当它还不是受着工人阶级领导的时候），他們由于历史的局限，还不可能自觉地意識到这一点，以至于他們的斗争往往又遭受着多次的挫折和失败，可是归根到底，它們所贡献出来的力量，总不是徒然付諸东流，而是对于打破旧的生产关系起着决定胜负的作用。这已經被历史所确鑿地証实了。当然，我們絲毫也不抹杀奴隶主阶级、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在一定历史时期社会的革命变革方面曾經起过的进步作用，可是它們所起的进步作用，是不能脱离了劳动者的斗争而孤立地去进行。所謂“革命元勳”，在历史上，劳动者的斗争无例外地是属于第一位的。

如果从这个原理出发来分析历史上特别是近代史上的阶级斗争，就可以明白看出一个革命的广度和深度問題总是以人民群众在这个革命中所起的作用大小为轉移的。

显著的例子之一，是十八世紀的法国资产阶级的革命。列宁在估价这个革命的时候曾說过：“它替自己的阶级……资产阶级作出了这样多的事业，以致使得整个十九世紀……所作的，不过就是进行了，部分实现了，完成了那偉大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們所已經创造的事业。”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是一个徹底地消灭了封建土地占有制为资本主义开辟了广阔发展道路的革命。这个革命，无疑地是资产阶级领导的。可是，这个革命之所以具有如此徹底的性質，主要是法

国的人民群众（主要是二千二百万农民和恩格斯称之为无产阶级前身的人們）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和綱領以至于建立了自己的革命組織、积极地参加了这一革命斗争的結果。在这个革命頂峯上的雅可宾專政阶段，这个特点表现得异常突出。列宁曾指出在1793—1794年法国的“国民公会正是下層分子的專政，即城市的和乡村的貧民中最下層階層的專政”，当时在国民公会中，“不是大资产阶级或中等资产阶级，而是普通人民，貧民，也正是我們所說的‘无产阶级与农民’，完全地和整个地統治着”<sup>①</sup>。正是由于人民群众的壓力，雅可宾派的国民公会不得不执行人民的意志，因而造成了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的重大成果，虽然这个成果，依然被资产阶级利用它开辟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但是这是合乎規律的。对于我們重要的是法国这个资产阶级革命的徹底性，也就是革命的深度和广度，不是决定于別的，而是决定于法国人民的积极斗争。而以后的欧洲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比起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都是有遜色的；只有俄国的1905—1907年的资产阶级革命，才又历史地远远地超过了法国革命，虽然这个革命失败了，可是这个革命确是真正的资产阶级的革命。这个革命鍛煉了俄国的农民和工人阶级，特别是工人阶级的政党通过这次革命有可能确立唯一正确的布尔什維克路綫，在以后的斗争中决定着俄国革命的命运。俄国的第一次革命，給俄国革命留下了極為深远的影响。

列宁非常注意资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人民革命的区别。而列宁之所以注意这个区别，正是深刻地注意到人民群众在阶级斗争中的作用問題。列宁說：

“如果列举二十世紀几个革命做例子，那末无论葡萄牙革命或土耳其革命，当然都得承認是资产阶级的革命。可是，无论前者或后者都不是‘人民’革命，因为民众，最大多数人民，无论在前者或在后者当中都沒有显然积极地、独立地起来为着自己的政治要求和經濟要求而奋斗。反之，1905年至1907年的俄国资产阶级革命，虽然在其中未曾有过像葡萄牙革命和土耳其革命有时得到过的那般‘燦爛的’成功，但它毫无疑又是一个‘真正人民的’革命，因为民众，大多数人民，呻吟于压迫和剝削之下的社会最‘下層’的人，都會独立奋起，用自己的要求，用自己的尝试，即按自己方式来建設新社会以代替那正被破坏着的旧社会的尝试，影响了革命的整个行程。”<sup>②</sup>

① “列宁全集”第九卷，第217頁。

② “列宁文选”兩卷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93頁。



显然,法国的十八世紀的資產階級革命,和俄国的1905——1907年的革命,是根本不能相比的。一个是工人階級的萌芽时期,一个是工人階級已經完全成熟了而且已經有了自己的馬克思主义政党。可是列宁都給予以应有估价,对于法国革命,列宁所注意的首先是雅可賓的專政是普通人民、貧民的專政,对于俄国的革命,列宁所注意的首先又是社会上最下層的人用自己的要求自己的嘗試来影响革命的行程,而把它叫做是真正人民的革命。虽然俄国的第一次革命失败了,但是列宁的估价是远远优于葡萄牙和土尔其的革命,虽然它們也还贏得某些“燦爛”的成功。

根据以上的事实,就可說明人民群众在階級斗争中的作用的實質所在了。只有广大的人民群众積極地参加了革命斗争,才能賦予社会革命以应有的深度和广度,才能給予革命行程以重大的影响。革命成功了固然是如此,即使革命不幸而暂时地失败了,也还同样是如此。

这在我们国家的資產階級革命过程中,也同样地証明了这一条真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胜利了,可是,由于沒有广大人民的参加,这个胜利是不徹底的,是不巩固的,因而推翻的是清朝政府,而隨之而来的却是洪宪称帝。而一当中国革命进入新民主主义阶段,强大的中国工人階級走上了政治舞台的时候,一当孙中山先生接受了我党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的时候,就使中国革命大为改观了,在我党领导之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虽然遭受多次失败而革命終于經過迂迴曲折的道路取得最后的胜利,使中国社会得到根本的改造。归根結底,是人民群众在这里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毛主席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有力地闡明了人民群众在階級斗争中的决定作用的問題,他說:“国民党現在实行他們的堡壘政策,大筑其烏龜壳,以为这是他們的銅牆鐵壁。同志們,这果然是銅牆鐵壁么?一点也不!你們看,几千年来,那些封建皇帝的城池宮殿还不坚固么?群众一起来,一个个都倒了。俄国皇帝是世界上最凶惡的一个統治者;当无产階級和农民的革命起来的时候,那个皇帝还有沒有呢?沒有了。銅牆鐵壁呢?倒掉了。同志們,真正的銅牆鐵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銅牆鐵壁,什么力量

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們,我們却能打破反革命。”①毛主席的这一段話,基本上总结了历史上以及现实的階級斗争的經驗。任何时期的階級斗争,只要进步的階級要取得胜利,它就不能脫离人民群众,人民群众的銅牆鐵壁是打不破的,它却可以打破一切反动階級的銅牆鐵壁。这就是为什么馬克思主义始終要注意到人民群众在階級斗争中的作用問題。这个道理本来是很明显的,可是这个道理,对于不懂得馬克思主义的人,特别是对于那些沒有脫离剝削階級立場而具有着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思想情感的人們却又是很不容易理解的。即就我国而論,我們是依靠人民的力量打败了蔣介石,打败了帝国主义,为时并不很远,可是資產階級右派却非常健忘,他們还是忽視人民群众的力量,还是要和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較量一番。他們在我国已經胜利地建設着社会主义的时候,还要实行資產階級复辟,夢想着出現一个中国式的匈牙利事件。似乎沒有这一番較量,还显不出他們是“英雄好汉”,正如中国古話所說,“不到黄河心不死”。章伯鈞、罗隆基、曾昭掄、費孝通以至于微不足道的雷海宗之流都是如此。可是他們的这一番較量,又徹底打輸了!我們党又是依靠了全国人民的力量,徹底地粉碎了資產階級右派复辟的陰謀。这次反右派斗争的輝煌胜利,再一次地証明了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在階級斗争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一理論的正确性。

× × ×

綜上所述,这就不难清楚为什么馬克思主义把人民群众看作是历史的創造者了,而历史为什么是生产者的历史、是劳动人民的历史了。因为不論是在社会的物質财富和精神财富,也就是不論在生产領域和文化領域都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特別是在政治生活領域,劳动人民又是階級斗争决定勝負的負担者。那末,又怎样能說历史不是劳动人民的历史呢?历史唯心主义硬是要否認这一点,那不过是赤日昭然在天而盲目者却看不見罢了。对于我們來說,那显然是一目了然的事情。 (全文待續)

① “毛澤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二版,第134頁。

# 教学参考

## 义和团起义前夜清朝政府的 对内和对外政策

Г. В. 叶菲莫夫

在1897年末到1898年初之际，帝国主义列强以“租借”形式侵占了许多中国的港口，建立了广大的“势力范围”，取得了新的租借权和特权。

在这个危急的时期，统治中国的清朝政府充分地暴露了自身的昏庸腐朽。它惶恐地等待着帝国主义列强底新的要求，它无力抗拒列强底勒索，只把希望寄托于这些强国相互之间的矛盾，并指望帝国主义者把清朝的制度作为保全他们所必需的“秩序”之保证而加以支持。

封建政权害怕爱国主义的高涨、争取革新的斗争和群众反帝运动的生长。1898年九月间，清朝反动集团镇压了自由主义改良派的运动。但是满洲统治上层并不能认为自己的地位稍有巩固。继续实行了原先向帝国主义世界让步的政策，这不仅带来了进一步侵略中国的严重危险，而且它必然给国内反对清朝政权运动的加强创造了条件。但同时满洲统治集团又把清朝与帝国主义者的勾结，看做是维持自己统治底最可靠的手段。

这样一来，清朝政府就处在腹背受敌的境况。它一面畏惧人民的革命运动，一面又仇视外国人，想要停止实行对帝国主义世界让步的政策。但是，要实行真正新的政策——反侵略的政策，他们却是不可能的。清廷制度底一切反人民反国家的本质，使这种政策的实行失去可能性。

清朝机构不能从两个世纪交替时期所造成的复杂的政治情况里找到出路，结果是在1900年濒于灭亡的危险境。统治集团惟一的能事，就是敷衍应付、运用一切手段（照例是毫无效果的）试图巩固皇朝的地位。

在实际剥夺了光绪皇帝的权力以后，慈禧太后及其近臣就颁布了一系列取消新政的谕旨：加强箝制言论自由、撤废农工商总局、恢复八股取士之制等等。满洲贵族大臣，占据了从前由汉人充当的大量职位。这一切就引起了各种的流言，惹起全国的不满和愤慨。

慈禧及其小集团知道自己做得太过火了些，因此他们企图缓和一下由于极端加强反动方针在国内所造成的沉痛印象，就颁布了正式的圣旨，驳斥那种说政府歧视汉人单只信赖满人的令人惊惶的谣传。在另一道由太后名义颁布的懿旨里，说到朝廷经常关心国民福利并号召“全体官员尽忠竭诚以恢复吏治秩序”<sup>①</sup>。

最可以作为清朝政府上述政策之特征的，是十一月十六日的一道上谕：

“欧洲人的社会风习及其治理国家的办法虽然与我们不同，但是这些却使他们的国家在军事、农业、工业和商业方面向前发展。我们必需学习外国这些优点，改进政府的工作，一定会收到很好的效果。有一些经验贫乏的人，他们怀疑政府，认为政府墨守成规，不想吸取现代先进国家的经验。显然，这种想法和怀疑是非常错误和毫无根据的。着令全朝大臣文武百官各就所知，只要有利于国有利于民，具可奏闻。

① “日俄战争的开端”（Пролог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ой войны）。Материалы из архива С. Ю. Витте. С предисл. и под ред. В. Б. Глинского, 1916, стр. 94.



中央政府从中吸取精华，付诸施行。”<sup>①</sup>

清朝上层开始对军事措施予以极大的注意，因为它们可以向全国表示政府要保卫国家利益不受外国侵犯的决心，其实统治阶级把这种措施看做是防备“内部敌人”的有效手段。同时清政府也要借此给自己积蓄一些政治资本。

1898年秋及1898—1899年冬的国际政治局势，对于中国来说是多少缓和了一些的。1898年下半年，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进攻稍趋缓和。从英国侵占威海卫和扩大香港地界（1898年五——六月）以后，直到意大利要求租让三门湾供舰队碇泊（1899年五月）为止，这期间列强不曾有过向中国提出新要求的重大举动。在这几个月里，曾同外国列强签订了一系列的经济协定，但是这类协定却没有激起像签订“租借”领土的那些条约时所引起的愤怒。

帝国主义列强在几个月期间取得了中国的许多重要的港口，获得了正式被認為“势力范围”的广大领土，然后他们当然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开拓侵占的地区，特别是对于“势力范围”的经营。况且，进一步的侵占显然将会引起列强本身相互矛盾的极端尖锐化。因此就暂时放松对中国的进攻，但这种暂时的放松很快就被新的进攻所代替了。

列强进攻的一定阶段的结束，使清政府有可能进行某些布置。统治集团力图如此地说明局势：光绪的归政和李鸿章的谪贬将使中国的国际处境略为好转，从前那样的一再让步，现在将不会再有了。这一切当然不是从属于清朝政府，而是由于复杂的情况所造成的，但清政府却大吹大擂地把这种子虚乌有的功劳归为己有。

俄国驻北京的财务代办巴卡季洛夫(Покотилов)曾写道：“宫廷当然会有这样的愿望：要证明改良派是錯誤的，而且中国即使不采用他们所提出的办法也能对付得了敌人。”<sup>②</sup>

正因为如此，政府在1898年末和1899年，采取了某些在表面上看来是为了加强国防的步骤。

在“日俄战争的发端”一書里，曾对这些措施有如下的叙述：“中国政府在近百年來对武装力量問題抱着漠不关心的态度，甚至对日战争这样的惨痛教训也不曾使其有所改变，但从1898年下半年起，却采取了在它来说是异乎寻常的、积极的军事措施，几乎中国所有的省份都加强了整顿军队的工作：裁遣老弱，招募新兵，編練新軍，修整軍备等等。”<sup>③</sup>

这一个对局势的評述，是根据巴卡季洛夫的报告，巴卡季洛夫正是这样地估价了当时中国现实生活中的这些新的现象。

俄国公使格尔思(Гирс)也曾有过类似的对局势的估计。政府最初的措施之一是恢复北洋舰队。按照政府的定单在德国和英国建成了几艘巡洋艦。到1899年初，北洋舰队已拥有兩艘巡洋艦，排水量各为四千三百吨和三千吨，和五艘水雷艇。并商洽向德国除購兩艘铁甲艦和六艘巡洋艦的問題。

重新聘用外国人充当军事教練官。在华北的陆海军里以德国教練官占多数，他们是由在物質上依赖于天津德国洋行的袁世凱所大力引薦的<sup>④</sup>。

西太后为了籠絡军队拥护自己并防止騷动起見，特地“从自己的存款”里撥出四百万盧布支付兵餉<sup>⑤</sup>。

政府的措施仅限于改善军事組織的某些方面，未曾消除其根本缺点，这是因为还保全着旧制度的基础。

政府的旨在防止中国国际关系进一步恶化的新措施之一，是企圖調整傳教問題。列强曾不断地利用傳教士跟人民的冲突，作为向中国提出新要求的借口。还在1898年就曾頒布聖旨，勅令防止任何与教士冲突的案件。1899年三月十五日对这个問題頒布了新的命令<sup>⑥</sup>。根据这个命令，教会的主教有权以平等地位与巡撫总督进行直接的交涉。一切教案均由当地解决。清政府企圖借此防止各国利用教案作为向中央政府提出要求之借口。

在十九世紀的最后五年中，资产者和紳士阶层对于投資工業、鉄路和开矿，已不再是漠不关心的了。尽管当时有着在中国的条件在資本主义企業道路上必然会发生的一切障碍，但是以民族資本創辦这些企業的趋势正在增長着。改良派在自己的活动里，反映了这个趋势的发生和发展的进程。清政府企圖表明：他們也并不反对保卫本国经济发展的利益。他們想要借此取得在客觀上或主觀上助長改良派思想的那些阶層的支持。

① ЦИАЛ, Ф.ОКМФ, л.794, докладная записка Покотилова С.Ю.Витте от 23 декабря 1900 г. (5 января 1901 г.). 此处所引上諭因为查不到原文，系就俄文譯出。——譯者

② ЦИАЛ, Ф.ОКМФ, л.203, доклад Покотилова, л.60.

③ “日俄战争的發端”，第94—95頁。

④ АВПР, кит. стол, л.15, л.65, всеподпаянная записка Муравьева 30(18) VI, 1897.

⑤ “日俄战争的發端”，第95頁。

⑥ “清季外交史料”第一三七卷，第6—7頁，“总署奏擬訂地方官接待教士事宜以便保护摺”（光緒二十五年二月初四日即1899年三月十五日）。



在这方面，耐人寻味的是制订并經皇帝批准了关于矿务和铁路的新章程（实际上是由西太后和軍机处所批准的）。“矿务铁路章程”是在1898年十一月間批准的①。

“章程”的第一条规定，矿务铁路事业分为官办、商办和官商合办三种，但无论如何应以商办为主……大力发展私人实业，应当在计划中占有主要地位。政府机构应当协助私人实业，但不应当干涉其事务。

第三条规定，鉴于满洲、山东和龙州的铁路矿务事业与外国政策相联系，将来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股份企业皆不得援为先例。

第九条要求每个企业里的固定资产须有百分之三十是中国资本。第十三条规定，一切企业的管理权属于中国人。

第十八条说，凡投资于已见成效的企业在银五十万两以上，和为真正属于中国人所有的企业筹集资金达半数以上者，均应给予奖励。他们将可以按照捐款赈灾之例给予特赏。

上面提到的章程各条证明：政府要促进私人实业的主动精神，提出了奖励发展本国经济的方针，反映出要对外国人的企业建立管制的意图。

但是这些条文付诸实现的程度究竟如何呢？清政府能采用何种措施来维护上述的原则呢？清朝统治的最后几年的特征，是统治集团继续对外国资本家作了新的让步。在1903年，要求制订新的矿务铁路章程一事即可做为例证②。新章程的起草人报导说，他们曾从档案里翻寻原来的章程，在制订新章程时作为参考。他们除了墨守成规外并没有超越一步。

在1898年，俄国在中国的财政活动家们在评论这一章程的时候，对该章程实现的现实性极为怀疑，巴卡季洛夫写道：“实际上这些条文可以想像得到，将会造成中国官吏方面加强对欧洲实业家们的需求，以及使欧洲人的企业中必需有一批中国人来充当冒名顶替的股东。”③

“章程”在西方的外交官中间引起了不满。美国公使、法国政府都提出了正式的抗议。帕兹涅夫（Позднеев）向维特叙述法国的抗议时说：“要求禁止开采广西、广东和云南的矿藏……这就使中国政府的法令在很大程度上被破坏了。”④

事实证明了这种估计。1898年的“章程”只不过是一种迷惑民心的官样文章罢了。

帝国主义世界蔑视清朝政府的这一手腕，相信北京的统治上层不能真个地保证维护国家的安全。

意大利向中国提出勒索的这一件事，是给予中国

的一个新的严重考验，也是清朝政府策略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关头。

× × ×

意国帝国主义在中国没有什么实际的商务或其他经济的地位。自身国力薄弱的意帝国主义，长期未能积极参加外国列强在中国的斗争。但各国在远东方面日益加强的侵略行动，也引起了意大利资本主义集团的食欲。由于德国侵占胶州湾的影响，意大利报界以公开煽动的文章，提出了要求意国政府干预中国事务的问题。例如意大利的论坛报（Tribuna）在1897年十二月曾写道：“我们曾有机会指出，有人曾奉劝意大利投入远东方面的冒险，而未考虑其手段和可能性。但在轻举妄动与踌躇不前两者之间，还有应当遵循的中间的道路。”⑤这里已明显地看出，要求意大利在对中国的瓜分中也要获得自己一份的这种慎重的声明。法国大使在附呈上这一段报刊言论的节录时，指出：在意大利，越来越经常地听到这样的呼声，意大利已经到了行动的时候了。

一年以后，意大利外交部长就提出了：意大利需要在中国有一个舰队碇泊港湾的声明。俄国大使聂利多夫（Нелидов）在1898年一月七日（俄历1897年十二月二十日）向彼得堡彙报了这件事。沙皇曾在聂利多夫的报告上写了简短的批语：“他们也要插足了”⑥。

再过一年，意大利就决定提出自己的要求。1899年二月，报纸上出现了关于意大利派遣舰队开往中国领海的报导。然后意大利驻北京公使马尔丁诺（Мартино）旋即提出了将浙江省的三门湾供给意大利作为煤站的正式要求，并且马尔丁诺同时还要求浙江全省应被认为是意大利的势力范围。

马尔丁诺声称，厄尔巴（Эльба）号战艦已驶入三门湾“以便确定自己在当地友谊地蒞临这个事实”

① ЦГИАЛ, Ф.ОКМФ, л. 591. Высочайше утвержденные 7 К 1898 г. “Правила касательно горного и железнодорожного дела”, лл. 89-86.

② ЦГИАЛ, Ф. ОКМФ, л. 591, лл. 161-168

③ ЦГИАЛ, Ф. ОКМФ, л. 591, л. 77. Покотиллов-Витте, 24 (12) XII 1898 г.

④ 同上, л. 99. Позднеев-Витте, 31 (19) XII 1898 г.

⑤ Documents Diplomatiques Français (1871-1914), t. XIII, No 379, Билло-Ганото, 12 XII 1897 г.

⑥ АВПР, кит. стол, л. 15. секретная телеграмма Нелидова, 7 I 1898 г. (26 XII 1897 г.).

①。可見意大利甚至在外交上還沒有准备好就开始行动了，它显然以为会像其他各国所做的那样一帆风顺的。当意大利开始行动以后，它企圖获得其他强国方面的支持。但这似乎并不是很簡單的事。俄国駐意大利大使聶利多夫曾写道，意国外長向他保証說，这个要求本身对無論哪个国家都沒有任何的敌意，它是由于需要而提出的。沙皇看了这个电报以后，就用紅鉛筆在說到意大利由于需要必須取得港灣的這句話上，做了一个大大的問号②。

在給駐北京的俄国公使格尔思的正式指令里，关于意大利的要求問題曾做如下的指示：不要造成某种特別有利于意大利要求的印象，不要給予正式的支持，但“在一定的机会和适当的場合，可使其了解：我們并不怎样反对意国政府的意圖”。在密电的原稿上有着沙皇的批語：“够了”③。

日本对待意大利所提的要求是抱惡感的。賽納乐（英国公使）和赫金格（德公使）也不掩飾地說：意大利的宣布浙江省为其势力範圍的这个要求，他們兩国的政府都将不会同意。至于煤站問題，賽納乐曾說：“他已开始和中国的大臣們就这个断然的要求进行了会談，他們完全可以自行决定接受或拒絕意大利的要求，絕不会因此使英国对华的友好态度有所改变。”④

賽納乐补充說，大体說来意大利人是英国人的朋友，而且英国人將乐于給予意大利一个煤站。

从这样的支持里是不会有那么多得的，而且清朝外交方面根据这一切得到了正确的結論：列强不高兴在中国又多了一个爭竞争者。况且意大利对浙江省的意圖是不能实现的，因为这个沿海的省份是这么的重要，因之帝国主义列强將不会容許意大利占为己有的。

意国帝国主义的要求正是在这样的時候提出的：当时清政府自己正在就憂着將來会遇到这一类的要求。慈禧太后“一接到总理衙門关于这件事的奏摺，立刻把它丢在地板上，喝令馬上把这些紙头收拾出去，不許同她談这个問題”⑤。西太后知道繼續的讓步將会造成对朝廷的致命的威胁。她害怕人民的憤怒。

总理衙門方面断定，意大利如果真个企圖实现其計劃的話，也只能派出極有限的兵力。

清政府根据这种对局势的估計，就决定拒絕意大利的要求。飭令浙江巡撫准备对付侵略行动，飭令福建巡撫和南京总督补充軍隊并准备防御。

意大利政府原想用恫嚇手段达到目的，这样一来就不得不退步了，意大利公使馬尔丁諾也被召回羅馬去了。清政府大事吹嘘其政策的这一成就。慈禧及其拥护者強調地說：“光緒的廢黜便有可能实行比較强

有力的政策。”⑥

但是問題还不能認為已經解决。新任意国公使在1899年七月重新提出了要求把三門灣讓給意大利这个問題，但是再一次地被拒絕了。

由于意大利要求的重新提出，浙江巡撫刘樹堂在1900年初提出的奏摺，是可以說明当时的新情况的⑦。在奏摺里說道：意大利威胁中国逾时一載，在此期間本省已增加大批兵力，实行了一些重大的防御措施。“窃以为一意大利不足慮也”。

刘樹堂还举出下面五端，說明对意大利不足慮的理由：

1. 国小民貧，难筹战費。

2. 运一兵来华，約費华銀二百余元，难以动大众。

3. 自拿波利起至中国二万余里，俱无該国埠头，煤水皆仰給于人。

4. 一兵一卒皆須运自本国，非若英兵可撥由印度，法兵可出自安南。

5. 即使如願以償得地，而兵力不足以常川駐守，財力不足以振兴商务，虽得美地如获石田。

奏稿人做出了这样的結論：如果意大利人在甚么地方登陆，那么这倒是一件好事：就可以痛击他們并借此教訓敌人。刘樹堂还建議利用义勇民兵来御敌。

刘樹堂的奏摺是在意大利本身被迫放弃其难以实现的意圖时提出的。清政府之所以能拒絕了意大利的要求，只是因为其他帝国主义强国的反对，以及意大利不能用什么实力来对抗列强的立場，而預先注定了他們的失敗。

× × ×

拒絕意大利的要求，是中国国际地位黯淡淒涼的背景上的一閃之光。它本身并不會使列强在中国的政

① АВПР, кит. стол, д. 116, л. 30. Гирс-Муравьеву 14 (26) III 1899 г.

② 同上, д. 20, л. 39, секретная телеграмма Нелидова 7 III (23 II) 1899 г.

③ 同上, л. 20, л. 42, Проект секретной телеграммы Гирсу 9 III (24 II) 1899 г.

④ АВПР, кит. стол, д. 116, л. 33, Гирс-Муравьеву, 24 (14) III 1899 г.

⑤ “日俄战争的發端”，第95—96頁。

⑥ Li Ung-bing, Outlines of Chinese History. p. 596.

⑦ “浙江巡撫刘樹堂奏意人要素三門灣欲陈防务情形摺”（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清季外交史料”，第141卷，第13—16頁。



策有所改变。在1899年,中国又面临着英俄两国侵犯主权的新的行动。

1899年四月二十八日(十六日),俄英两国在经过长期谈判以后,达成了关于瓜分中国铁路利益之势力范围的协议。这个协议是在俄国外交大臣与英国驻彼得堡大使互换的照会中体现出来的。

俄国保证不提出对长江流域任何铁路特权的要求,英国保证不提出对长城以北任何铁路特权的要求。但这里有一项例外规定载于英大使的补充照会及俄国外交大臣表示同意的复照中。这项例外规定是指山海关至牛庄的铁路。英国力求与俄国达成有权修筑这条铁路的协议,借此在俄国势力范围内打进一个楔子。最后结果,山海关至牛庄铁路在名义上被承认为中国政府的铁路,但由汇丰银行提供路债,而以铁路本身作为借款的担保,归由英国人管理。因之,铁路也就整个地由英国所控制了<sup>①</sup>。这是俄国在瓜分中国铁路势力范围方面对英国的让步。

清政府对待英俄协定是相当敏感的。如果说多年以来清政府对待那些公然侵犯中国主权的协定都是漠然置之的话,那么对于英俄协定,清政府却照会英俄政府提出如下的正式声明:“中国土地权在自主,贵国自不肯侵越中国自主之权,将来中国设或作某处铁路,应由中国自主,即某国愿承办何处铁路,亦应听中国商明准驳,方于自主之权无损,自不得以贵国与某国自行商议之事作为中国允许之据。”<sup>②</sup>

俄国新任驻北京公使格尔思在引述这一声明时写道,俄英协定强烈地促使中国反对俄国。李鸿章把这一协定称为中国的瓜分。大臣们公开地说,列强没有权利签订这样的协定,这是对贫弱中国的压迫。可以看出,俄国在签订协定时,甚至在认为是自己势力范围的满洲方面对英国作了让步。

清政府对这两个国家的新协定如此恐惧,是因为北京方面很害怕俄英的联合行动。俄英之间的矛盾,究竟是可以被清朝外交所利用的,即使远不是经常成功的。现在,在协定签订了以后,这些可能性就大大地缩小了,至少是在建筑铁路问题上是这样。

中国历史学家刘彦在叙述俄英协定的历史时,曾提到清政府不承认协定这个事实,说这只是两国之间的勾当,因之其法律效力是极有限的。但同时刘彦自己却又做出这样的结论:协定所确立的势力范围也就说明了:华中华南的十省被认为是英国的势力范围,而满洲和蒙古则被认为是俄国的势力范围<sup>③</sup>。

×            ×            ×

俄英违反中国意愿而确定的两大强国“铁路利益范围”的新协定之签订,激起了英国大资产阶级积极

性的新的高涨。在中国经营的英国公司代表人团体“中国协会”(China Association),在庆祝该协定时连忙提出进一步巩固英国在长江流域统治权的新的庞大的纲领。当“中国协会”正式赞扬该协定时,同时也听到怀疑派的论调。著名的商业家和“中国通”李特尔,曾在曼彻斯特商会的会议上发表过演说,声称只有“实际占领”(effective occupation)长江流域才能保持英国的势力范围<sup>④</sup>。如果这是有必要的,这个好战的英镑骑士说,那么英国就应当力争保证自己在中国的优越地位。

李特尔绝不是唯一的人。各商业组织开始采纳要求更实际地保证长江流域地位的提案。英国资产阶级这些好战阶层的狂热,是由于在上海的英国商业家们所造成的。他们鼓吹要实现原来的最高纲领,即要在英国指导下改组中国的政府和经济。皮尔考维茨(N. Pelcovits)曾写道:“实际上,上海的叛乱者们认为不论在有没有其他强国支持的条件下,建立某种形式的英国的保护国,这可以解决中国的问题。如果这就意味着战争的话,那么他们准备最好地利用它。”<sup>⑤</sup>在“中国协会”上海委员会于1899年初所写的报告书里,安居在公共租界华丽公馆里的英国商人们抱怨在华投资的安全没有保证,要求扩大条约口岸的地界,表示实业界对未来事业绝不漠然坐视。他们要求恢复帕麦斯吞的政策,即暴力和战争的政策。“实际占领”长江流域这一思想,成为“协会”政策的根据。1899年夏,“协会”一致地要求建立英国对长江流域的保护。在总会的决议里坦率地提出要占领这几个据点:舟山群岛——浙江的锁钥,江陰(南京东面的城市)——用以控制江苏,以及其他几个可以控制湖南、湖北两省的据点<sup>⑥</sup>。

倍尔蒂在同“协会”的首领之一亨利谈话中说过,大概政府将不能采取什么措施来使其实现。亨利声称,“协会”并不坚持要立即全部地实现其计划,

① 参见“远东问题条约及外交文件彙編(1895—1905年)”,1906年版,第358—361页(俄文)。

② “总署致英俄两使承办铁路不得以他国所议作为中国允许之据照会”,“清季外交史料”,第138卷第25页,ABПР, кит. стол. л. 116, л. 88. Гирс-Муравьеву, 2 VI (21 V) 1899 г.

③ 刘彦:“中国近世外交史”,1911年版,第322、323、348—349页。

④ N. Pelcovits, Old China Hands and the Foreign Office, 1948, p. 243.

⑤ N. Pelcovits, p. 246.

⑥ N. Pelcovits, p. 253—254.

但是倍尔蒂，据皮尔考維茨写道，究竟还是極其怀疑，特别是对“实际占领”各个据点这方面①。

由于“协会”提出的一些問題，外交部发言人奥菲斯·布洛德立克于1899年六月七日在上院发表了如下的声明：

“我們不能把長江流域变成像山东或滿洲各省一样，第一，因为这个区域是極其辽阔的，第二，我們不准备承担实际上治理三分之一的中国这么无限的责任。”②

皮尔考維茨探討了这种情势以后，認為英国政府正式发言人的声明，可以証明他如下的論断：外交部已經不是实业界政策的順从的奉行着了。他根据上述事实論証說：“中国通和外交部之間的蜜月已告終結了。”③

皮尔考維茨上面这个表述，实际上就是承認：在列强对中国实行最殘酷的进攻时期，在实业界与外交部之間是完全一致的（用他的術語來說就是“蜜月”），外交部所实行的政策，是整个地而且充分地反映出那些与中国市場有密切联系的英国大資產階級底利益。

在1899年英国不能采纳协会的建議，这在协会本身也是了解的，因为这个时候中国到处在奔騰洶涌，推翻忠順地为帝国主义者效劳的清朝制度的革命爆发已經迫近了。任何一个新的侵略步驟，都会加速革命的爆发并造成对帝国主义者非常不利的后果。要把半殖民地的中国变为殖民地的这种企圖，将会遭遇到大规模的反抗的战争。这是問題的一个方面。

而且从外交情势的观点来看，协会所提議的極盼能采用的“方策”，它本身包含着非常严重的后果。

“实际占领”長江流域，将会引起其他帝国主义列强迅速的反对的措施，將带来全面战争的危險。英国正处在寻求同盟国的过程中，对于战争是没有准备的。这是問題的另一面。

至于一再提出的关于在英国控制下改組中国的方案，那么这个题目的商討，对于美国加紧提出自己的、主要是针对上述情况的綱領，却起了一定的作用。

沙皇俄国也采取了步驟，来进一步巩固自己在滿洲的統治权，虽然其規模远不及英国資產階級之大。

在1899年五月間，当英俄协定一达成協議以后，俄国政府立即提出要把南滿鐵路延長到北京的問題。这一个經濟和政治方面的重要特权，一方面被俄国統治集团認為是中国給予英国敷筑山海关至牛庄鐵路权益对俄国的补偿；另一方面，这也是帝俄政府着重宣示下列事实的一个步驟：即在英俄协定以后，俄国仍繼續認為整个滿洲是自己的“势力范围”。沙皇俄国

在自己的言論里強調地指出，賦予英国以建筑山海关至牛庄鐵路的特权，应当認為是惟一的例外，任何新的違反俄国利益的企圖，必將遭到俄国最坚决的反对。問題的第二方面，比第一方面更加重要。

以中东鐵路公司名义致函总理衙門，要把中东路干綫展延到北京的要求，遭到总理衙門断然的拒絕。中国方面拒絕了俄国的要求④。甚至决定不把这件事奏聞西太后。

总理衙門之决定采取这样的步驟，是因为惧怕对帝国主义列强新的讓步底后果。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政府政策的新趋向：面临着全民憤怒的增長，竭力要表明清廷对外国列强政策底坚定性。

但是，沙皇政府却也得到中国政府方面这个重要的保証：“倘今后要修筑自北京向北方或东北方通往俄国边境的鐵路，除由中国資金及本国官員自行建筑外，如欲与外国协商建筑时，必先与俄国政府或公司商洽賦予建筑权利，而且不得將建筑权讓与另一国家或外国公司。”⑤这是有利于俄国加强其在中国华北和东北的地位的。

沙皇政府声明：“尊重貴政府上述肯定的保証与厚意”，政府認為可以“不拒絕其所提出之要求，不坚持立即敷筑自东方通至北京的路綫”。（1899年六月五日格尔思給总理衙門的照会）

× × ×

在竭力設法加强中国的外交地位时，清廷的外交官們在1899年夏曾拟訂扩大对日联系的計劃。这些計劃是由于还在1898年就已提出的中国外交方針問題而拟訂的。由于与俄国同盟得不到肯定的結果，同时对西方各国一般地都不信任，清廷上層进退維谷，就开始拟訂与日本同盟的計劃。这个政策的最积极的信奉者，是軍机处和总理衙門的首腦庆亲王。庆亲王是滿洲貴族的最反动集团的首腦，这个集团，除了他們認為首先有利于鎮压內乱的那些軍事措施以外反对国家的任何改革。庆亲王及其同夥很仇視外国人，但又不得不与他們保持接触，不得不在他們中間寻觅同盟

① N. Pelcovits, *Old China Hands and the Foreign Office*, 1948, P. 255.

② *Parliamentary Debats*, v. 72, p. 803.

③ N. Pelcovits, p. 256.

④ АВПР, кит. стол, д. 116, лл. 95-191, Гирс-Муравьеву, 7 III (25 VI) 1899.

⑤ Э. В. Гримм, *Сборник договоров и других документов по истор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1892-1925)*, М., 1927, стр. 139.



者。他們在与俄国联盟失望之后，認為与俄国的对手日本联盟是改善中国国际地位的一个手段。

日本的外交活动也促进着这件事。1898年伊藤侯爵的使命显然不會落空。而且伊藤本人仍將繼續貫徹以前拟定的方針。1899年五月，伊藤致書庆亲王、荣禄和李鸿章，信內說到西方列强方面对全体黄种人的危險。他提到防止这种危險的必要性，中国实行改革及中日联合以謀自衛的重要性。“他在結論里表示了这个思想：如果中国希望帮助的話，那么日本时刻准备給予一切可能的援助，因为这种援助也是与其本身利益相符合的。”<sup>①</sup>

这样就出现了作为日本对华政策特征的所謂中日“亲善”的欺騙理論，这个理論就东京方面的理解，也就是建立日本对中国的保护权。庆亲王素来不是以思想机敏著称的，于是就吞下了伊藤投过来的釣餌。

1899年六月，庆亲王奏請西太后与日本建立紧密的联盟。庆亲王認為加强中国国际地位要从兩方面进行：国内方面，要加强陆軍和海軍，在国际方面，他建議“与日本締結同盟以加强天朝防禦力量”<sup>②</sup>。

当时北京的外交界正广泛流傳着关于已經簽訂或將要簽訂中日同盟的謠言。日本方面會花了不少气力来鼓动中国簽訂中日同盟。格尔思报告說：“日本的无数的公开或秘密的代理人，不惜使用任何手段来煽动中国人对西欧各国的仇恨，硬要使他们相信：中国只有与其同种族的鄰国日本結成紧密的同盟，才能保証自己的生存。”<sup>③</sup>

但是庆亲王的思想得不到慈禧方面的支持，也得不到荣禄方面的支持。庆亲王这个計劃的弊病是显而易見的。与日本同盟这个思想的本身，是由于要对付俄英协定这个願望而产生的。但在1899年，已出现了在国际局势上說来是比較重要和特异的英日同盟的远景。固然，当时还没有正式进行关于英日同盟的談判，但非正式的試探已經发生了<sup>④</sup>。在这种情势下，与日本协定并不能改善中国的国际地位，它必然会造成最严重的后果，也就是說，不仅会扩大日本在中国的陣地，而且也会扩大英国在中国的陣地。

与日本联盟的思想終于沒有实现。但是日本帝国主义也稍稍利用了有利的政治情势来謀取自己的利益。日本获得聘請日本教練官在陆海軍中服务的权利。也出现了要聘請日本前任駐北京公使矢野担任宮廷顧問等等方案。在“日俄战争的發端”一書里指出：日本人在中国活动的最突出的地方之一，是他們竭力要把中国的学校教育事業掌握在自己手里。1899年夏，在直隶省的省会保定府，創办了日語学校。在福州、南京、潮州、汕头及其他一些城市里，

由日本的团体“同文館”創办了許多学校。同文館这个机构是在1893年为着“改善由于战争而弄坏了的中日之間的关系”而特地設置的。这个机构遍設在中国的各个主要城市，除了开办学校以外，还利用他們出版的报纸作为宣傳的工具<sup>⑤</sup>。

日本也企圖加入爭奪鐵路权益的斗争。曾任駐倫敦公使、兼任三井煤礦輪船公司經理的加藤，获得了福州—厦門，福州—鄱陽湖的鐵路建筑权，据推測鄱陽湖流域煤的儲藏是很丰富的。順便說說，这些鐵路虽然没有建成，但是日本却比別的国家搶先一步作出了声明<sup>⑥</sup>。

日本逐步地在准备对中国进行新的侵略。但日本帝国主义認為，要能在中国获得实际的成就，必須对付俄国，因为俄国的反对日本在中国的計劃，是使日本的計劃难以实现的最重要的障碍。

×                      ×                      ×

1899年发生的那些新的侵略的行动，尤其是意大利的要求，就其意义和規模來說，比較1897—1898年那些事件都小些，但却激起了比以前尖銳的反应。它們造成了国内这样一种气氛，促使清政府繼續裝模做样地吹噓自己反侵略的决心。实际表明，清政府想以裝成决心要反抗敌人的姿态，来防止普遍的起义。

1899年五月，頒布了命令东南各省巡撫准备国防的諭旨<sup>⑦</sup>。1899年十一月，又頒布了通令各省督撫与各軍將領准备国防的諭旨<sup>⑧</sup>。諭旨里說：“現在时势日艰，各国虎視眈眈，爭先入我堂奥。”

外国人認為，中国軟弱，決不回击。因之他們就一再地提出新的要求。对此，中国無論如何都是不能同意的。

“万一强敌凭陵，胁我以万不能允之事，亦惟有理直气壯，敌愾同仇……近来各省督撫，每遇中外交涉重大事件，往往豫梗一和字于胸中，虽至临时毫无准备，此等鋼習，实为辜恩負国之尤。茲特严行申諭，嗣后倘遇万不得已之事，非战不能結局者，如業

① “日俄战争的發端”，第91頁。

② АВПР, кит. стол. л. 116, л. 103, Гирс—Муравьеву, 7 III (25 VI) 1899г.

③ АВПР, кит. стол. л. 116, л. 123, 14 III (21 VI) 1899г.

④ См. А. Гальперин. Англо-японский союз, гл. 2-я, § 3—5.

⑤ “日俄战争的發端”，第93頁。

⑥ 同上，第44頁。

⑦ “清季外交史料”，第138卷，第25頁。

⑧ 同上，第141卷，第3—4頁。

經宣战，万无即行議和之理，各省督撫，必須同心協力，不分畛域。”<sup>①</sup>

当然难以举出什么理由来反駁官方所謂加强国防的措施。但嗣后历史經驗再一次地証明，所有这一切措施都具有伪裝的性質。这只是政府为要提高自己在国内的威信的一种幌子罢了。不断地爆发的各地起义，使統治集团深感恐慌。排外心理的成長，帶有威胁的外形。朝廷竭力表示自己要反击敌人的决心，并借此来轉移运动底反对朝廷的趋向。在加强武装力量的同时，清廷也致力于編練能鎮压群众斗争的軍隊。

順便說說，关于圍繞着軍事措施展开的叫囂之本質，培萊斯孚特（Beresford）公爵曾給予相当好的說明。他和中國大臣談話的几則札錄，很可以作为当时統治集团一般心理的写照。

例如兩江總督劉坤一在和培萊斯孚特談話中說道，他就憂最近將來的叛亂，因為人民已經被苛捐雜稅的加重而激憤了，這些苛稅是用以償付外債的，而且加強軍事力量也需要經費。他聲稱有大批貧民和流離失所的人，在他所轄各省尋求棲身之所，“他不能配置足够的兵力來維持秩序”<sup>②</sup>。

湖廣總督張之洞也表明了同樣的想法。“他說，他很憂心他的所轄各省境內的叛亂，如果叛亂具有嚴重的性質，那麼他將因餉械匱乏而沒有足夠兵力來鎮壓他們。”<sup>③</sup>

既然像劉坤一、張之洞這些縱使是極無能的但究竟也想改善國家地位的人，在同英國公爵談話中這麼公開地說出了自己對人民運動的恐懼，那麼朝廷方面，也就是李鴻章、慶親王、剛毅、李秉衡、榮祿等大臣們就更不用說了，他們是以最深的憎恨對待人民的，而且，對於他們來說，最可怕的不是外國的侵略，他們所畏懼的只是這些侵略所加在他們身上的那種責任罷了。軍事的措施要求增加巨額的經費。它們業已耗盡了國庫的全部預算收入。籌措經費的辦法還是和從前一樣：搜刮人民。1899年，戶部奏稱，為應付最必需的開支，還短少一千一百萬兩。關於這一個需求，范文瀾這樣寫道：“全國人民飢寒交迫，政府還要加索一千數百萬兩，捐稅已經繁多，不便再添設新名目。”<sup>④</sup>

慈禧召集大臣會議，商討國家財政情況。結果議得“裁革陋規，剔除中飽，認真整頓，化私為公”十六字<sup>⑤</sup>。

會議的決議之所以是有趣的，當然不是由於在清朝封建制度下整頓財政制度的計劃不可能實現，而是因為它承認了政府機構里從太古以來就存在的不可根除的弊端。正因為這項決議具有空洞籠統的性質，

而且不可能有實際的效果，而金錢的需要却是刻不容緩的，所以政府就採取了火急的措施去搜刮必需的經費。為了這個目的，清政府在1899年五月派軍機大臣剛毅往南方各省去搜刮經費以彌補國庫的虧空<sup>⑥</sup>。剛毅的使命在名義上是這樣的，但實際上其意義是遠為廣泛的。他的任務是在於榨盡各省的經費，以加強慈禧集團的軍事實力，求對付國內正在醞釀着的反滿、反封建和反外國的鬥爭。外國報刊給剛毅起了一個“搜刮大臣”的綽號，這個綽號對他是極其相稱的。他善於搜刮巨款。各省當局不得不交出已搜刮所得的一部分，他們就進一步搜刮人民來彌補這個損失。當時李秉衡在滿洲也完成了同樣的任務。

摩爾斯（Morse）在評價這些事實的社會後果時曾寫道：“中國的民憤已極，由於稅吏的費上加費，今後將更加激動了。”<sup>⑦</sup>搜刮來的經費，名義上是供國防之用，實際上是用來加強那些保護搖搖欲墜的清朝寶座與反對人民運動的武裝力量。

當時資產階級報刊界和資產階級歷史家們，喜歡大事渲染地說慶親王、剛毅、榮祿這批人是如何敵視外國人。這原是無可爭辯的，但他們到底是更仇視自己的人民和害怕他們的。剛毅就曾說過，我家之產業，寧可以贈之於朋友，而必不畀諸“家奴”這句話，始終是統治集團的政治信條。正如1900年事變所證明的，所謂關心國防只是欺騙人民的一種手段罷了。

清政府在1898—1899年的一切措施，是與國家的社會、政治、經濟組織的根本改革完全沒有關係的，不能使國家真正有所加強。它們基本上是帶着徒有其名的性質，而且首先是考慮對內的效果，因為在人民群眾反外國、反對政府的鬥爭日益加強的情勢下，清政府要大事宣傳自己的抵抗外敵的決心并借此避免人民對自己的憎恨。

清廷曾企圖偽裝自己，但實質上仍然是反人民和反國家的匪幫，他們把國家推向滅亡的深淵。

（鄭之光譯自“列寧格勒大學學報”1957年第二期）

① “清季外交史料”，第141卷，第3—4頁。

② Ch. Beresford, *The Break-up of China, L.*, 1899, p. 116.

③ 同上，第163頁。

④ 范文瀾：“中國近代史”第一分冊，第345頁，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

⑤ 同上。

⑥ 同上。

⑦ H. B. Morse,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L.*, 1918, V Ⅲ, p. 172.



## “沙基惨案”始末

余 炎 光

1925年的广州“沙基惨案”，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重大事件之一，这是繼“五卅惨案”之后，帝国主义为了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帝运动而进行的另一次疯狂屠杀的暴行。但是，和帝国主义者于这次暴行时所希望的结果相反，这次惨案进一步促进了中国人民，特别是广东人民的觉醒，推动了省港大罢工的长期坚持和深入发展。正如邓中夏同志所说：沙基惨案“促起广州人民愤怒，励行抵抗香港，省港大罢工延續到二年多之久”<sup>①</sup>。“沙基惨案是延續排英之根本动力，省港罢工是实行排英之具体表现。”<sup>②</sup>不仅这样，由于惨案教育了群众，广东的反軍閥战争也得到了广泛的支援。

广东是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最早的地区，广东人民在近代中国反帝斗争中一直是先锋力量；特别是1924年国共合作实现、广东成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根据地以后，广东人民和帝国主义展开了更激烈的斗争。帝国主义三番五次地企图推翻广东的革命政府：1923年借口“关余问题”而举行了武装示威；1924年又组织了商团叛乱……但都不能达到目的，却进一步地激发了中国人民的反帝运动。帝国主义与中国人民的矛盾越发深刻尖锐起来。当广东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以实际行动支援“五卅惨案”时，英、法帝国主义者又制造了屠杀中国人民的“沙基惨案”。

上海“五卅惨案”消息传到广东后，广州工人在六月二日就举行了示威大会。其时正值广东人民协助革命政府讨伐刘震寰、杨希閔的叛乱，六月十二日刘、杨叛乱削平。六月十七日，經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发起，召开了全省工农商学兵各界一百二十余团体的代表会议。会议决定了抵制英日货、实行经济绝交，在帝国主义企业中工作的工人一律罢工，广州各界休業一天、示威游行等十五条切实援助沪案的办法，并成立了“广东各界对外协会”。六月十九日，香港和沙面的工人为了抗議“五卅惨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罢工，这就是著名的“省港大罢工”的开始。六月二十二日，“对外协

会”决议由广州工农商学兵各界协同回到广州的香港罢工工人，在二十三日举行示威游行，并函請政府通告所属在是日停業一天参加游行，自当天起下半旗及臂纏黑紗七日，以示哀悼。“对外协会”还向全国发出通电，指出当前的问题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生存的问题”，广东人民准备“与帝国主义决死战斗，宁为断头鬼，不做亡国奴”，願全国一致奋起，共同对外<sup>③</sup>。

“省港大罢工”开始以后，英帝国主义对广东人民的反帝斗争采取了蛮横的强硬态度，它一方面在香港宣布戒严对付工人罢工，一方面对广东革命政府实行封锁，禁止香港粮食出口以圖給广州造成粮荒，同时还增加广州沙面的驻军和白鵝潭的軍艦，在沙面周圍高筑防御工事，决意对反帝的广东人民进行屠杀。为了制造借口，英国驻广州总領事在二十二日致函广东革命政府外交部长伍朝樞（該函在二十三日下午才收到），声称：“頃从可信为可恃方面得悉学界于明日举行爱国游行时，拟攻击通入沙面之桥，以遂其为国牺牲之願，聞抽簽决定首先为国牺牲者为何团体，聞广东大学已抽得此簽。上說当然或为想像之詞，但若果屬确实而竟实现，則余謹向为广州政府担任外交之閣下庄严警告广州政府曰：凡穿行沙面英租界之任何举动，定遭武力之抵抗，所有后果，由广州政府个人及全体政府負其責。”<sup>④</sup>可見，帝国主义对那次屠杀已是早作准备了。

六月二十三日中午，广东各界援助沪案示威大会于广州东较場举行，到会者約十万人，提出了“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約”等口号。大会下午一时半結束，开始游行，队伍由东较場出发，經惠爱东路、永汉路，出南堤、西濠口至沙基。三时二十分，当工农队伍都已經过沙基，轉入內街后，学界队伍适抵西桥口，即遭埋伏在西桥附近英租界的英兵开枪扫射，行抵东

①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簡史”，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91頁。

② 邓中夏：“省港罢工中之中英談判”，第13—14頁。

③ “沙基痛史”，1925年八月版，第7頁。

④ “國聞周報”第二卷，第二十四期，第13頁。

桥口附近的学生军队同时遭法和界法軍开枪射击；停泊在白鵝潭的英、法、葡軍艦，亦放机关炮及大炮助击。一时彈如雨下，英法軍隊开枪屠杀竟达一小时之久，以致沙基道上伏屍遍地，血流成渠。統計當場和事后在医院致死者約八十人，伤者約二百余人，其慘狀尤甚于当时上海“五卅”屠杀和汉口“六、十一”屠杀。帝国主义的暴行，更激起了广东人民的愤怒反抗。

## 二

“沙基慘案”的消息傳出后，广东各界人民异常憤慨，紛紛以实际行动來回答帝国主义的兽行。“对外协会”，即于当日下午八时召开紧急會議，通过了通电全国及全世界、組織演講团分头宣傳帝国主义凶狀……等十五件決議。二十七日又召开了各界代表大会，決議对香港实行經濟封鎖。七月二日，又决定以廢除不平等条約为此次对外斗争的唯一目的。这些決議，就成为各阶级各阶层在事件后的斗争方針。

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表现了反帝的英勇气概，成为这次反帝斗争中的领导力量。二十四日，党领导下的罢工委员会即通电全国，表示：“吾省港工友經此次慘杀之后，宁願与之偕亡，不願偷生屈伏。現正糾合同人，封鎖沙面及香港，以制彼帝国主义之死命。”<sup>①</sup>并决定：英帝不完滿答复香港沙面罢工工人提出之条件和沙基慘案后广东革命政府提出之要求，誓不复工。工人在罢工委员会的领导之下，封鎖了广东所有的港口，断絕了与香港的一切联系。省港大罢工坚持了一年又四月之久，在經濟上和政治上沉重地打击了英帝国主义。在斗争中，广东沿海各县农民成了工人的有力助手，起了重大作用。

除工人以外，一部分先进的青年学生及市民，也在中国共产党的組織领导和影响之下积极投进了斗争。慘案发生后，广州各校进步学生組織了演講队一百队，在市区各街道进行演講宣傳，先后听者不下数十万人。在学生講演队的影响下，市民也紛紛起来組織演講团，参与宣傳工作。据当时报載，市民演講团曾在“財厅前南越酒店側空地演講，高豎白旗二面，一为市民演講，一为不平則鳴。駐足听者凡数百人。講至协力一致对外时，鼓掌之声不絕。而听者以市民資格临时加入演講者甚众，有背負白鉄箱卖南乳花生之小販，亦登高演講，几至声泪俱下”<sup>②</sup>。在这基础上，学生組織了大規模的宣傳队，分赴广东各县宣傳“沙基慘案”真相，并筹款援助罢工工人。学生下乡宣傳，其效显著，全粵各县社团都通电到省表示誓为外交后盾。

在苏联帮助和中国共产党推动下而創立起来的黄埔陸軍軍官学校及其学生軍，在这次斗争中也起了积极的作用。他們知道帝国主义之間“無論意見如何不同，但对付被压迫民族却是一致的”<sup>③</sup>。并且，他們还尖锐地揭露了当时不少人对美帝存在幻想的錯誤：“有人主張現在我們應該專向英国（或英法日等）帝国主义进攻，甚至求美帝国主义帮助……这主張有兩点錯誤：（1）囿于感情的复仇主义，（2）不明瞭帝国主义的性質。”<sup>④</sup>这对当时群众認清帝国主义本質，清除群众中受美帝欺騙而对美帝的幻想，起了相当作用。

代表资产阶级的广州各商界团体，在省港罢工委员会倡議“工商联合”的号召下，它們基于經濟的原因，也都投入了这次反帝斗争，他們表示“一致反抗，实行与英国經濟絕交，不买英貨，不售原料与英国，不乘英国輪船……”<sup>⑤</sup>，并成立“广东商界对外經濟絕交会”，决定了拒用外幣及檢查外貨的具体办法。

此外，广东全省各县市群众，聞沙基慘案消息后，对帝国主义的暴行均表示非常痛恨，东莞县城、肇庆、石龙等城鎮群众，先后举行了游行示威，并发出通电。全国各地的群众团体和軍政要人，也都急电广东，表示支援。

由此可见帝国主义的屠杀，更加激起了广东以至全国人民群众的公憤，使群众性的反帝运动，进一步的高漲起来。

## 三

慘案发生后，广东人民群众反帝情緒的高漲，使帝国主义深为震动和不安。各帝国主义立即增强了沙面的作战設備，調遣兵艦，增加駐軍，日夜戒严。

与此同时，各帝国主义在一致与中国人民为敌的共同立場上，采取了不同策略，以应付中国人民的反抗。

事件的主凶英帝采取了兩方面的手段来达到要中国人民屈服的目的。一方面是采取高压的办法，企圖以其雄厚的軍事、經濟力量來恐嚇和压服中国人民。所以，当广东政府提出要求条件时，它即对慘杀事件

① “沙基痛史”，1925年八月版，第123頁。

② 同上，第112頁。

③ 黄埔軍校政治部編：“沙基屠杀中党立軍校死难者”，第48頁。

④ “中国軍人”第六号，1925年八月十七日版，第38頁。

⑤ “沙基痛史”，第131頁。



的解决采取拖延的态度。为了支持它这种蛮横无理의 交涉,除增派兵艦军队來粵外,还以对华宣战为恐嚇,并唆使香港英侨,先后于七月二十七日和八月二十五日召开兩次香港英籍市民大会,通过了挑畔性的決議,摘录于下:

二十七日大会決議:“……(3)沙面案認為英領处置得当,此后解决,須征港政府同意;(4)英政府对中国应采行强有力之計劃,調派兵艦,以便有事在香港或华南有正当之防衛;(5)如粵政府仍援助对英罢工,請英政府認為蓄意宣战。”①

八月二十五日大会決議“……拟电致英首相要求英政府以哀的美敦書致广州当道,令彼等……(2)驅逐广州及广东之布尔什維克党;(3)解除黄埔軍官学校学生之武装而遣散之……;(4)停止抵制英貨;(5)停止排英宣傳。如不照允,則英海軍当完全封鎖广州及附近海面,并施行英政府所視為必要之其他行动。”②

事实非常明显,英帝国主义者就是企圖以战争叫囂來恐嚇中国人民。它并且利用在中国夺得的特权威胁中国人民,例如它通过其在中国所掌握的邮电机构,断絕了广东与外地的邮电往来,以蒙蔽事件真相,并且,“竟將事实任意顛倒,遍地宣傳,希圖一手掩人耳目”③,以致造成广东政府和人民很多不便,国内外各权威报刊,也无法及时明了事件真相。上海“东方杂志”就曾指出:“香港政府檢查邮电,極為严密,从广州发出的电报信件,均被港政府扣留,所得消息,都从外人方面轉來,所以明白真相,頗为困难。”④这足以說明:英帝的高压手段,是无所不施其極的。

但是事实并不如英帝所想像一样,中国人民不仅沒有在压力下屈服,反帝情緒却更高漲。因而,英帝在繼續施以压力的同时,又采用了离間和收买手段來破坏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它一方面公开以金錢、軍火收买軍閥來与革命政府对抗,“香港政府公开的送三百万子彈到汕头;港商資助陈炯明百多万現金”⑤,“又复勾結北洋四艦南來,帮助陈邓反攻”⑥。另方面,它拉攏广东政府內的右派势力,以“反共产”为名,离間革命队伍的团結。当时,买办商人周殿邦成了英帝的代理人,为英帝拉攏右派出力;香港政府“又以金錢接济赵士觀、胡毅生、林直勉创办反对革命派以反共产为口号的国民新聞,專門与政府为难”⑦;还勾結右派对罢工工人进攻,“伍朝樞万事不管,專門在国民政府委员会上,替外国商人告发罢工糾察队的‘不法’”⑧。这一系列的事实,說明英帝企圖利用軍閥和从反帝陣綫內部來打击反帝斗争。

正如中国国民党“沙基惨案宣傳大綱”指出:“他們觉得中国民族不会屈服于高压手段之下,愈高压愈反抗……。因此,他們便改用离間和收买的手段,他們一方面用‘赤化’、‘过激’、‘共产’等謠言,离間中国民众及本党团結。一方面用金錢收买軍閥、官僚、买办、劣紳作所謂‘反赤’运动,以圖破坏本党及民众的势力,压倒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⑨由于这样的破坏活动,广东政府內部便醞釀着严重危机。

在事变后各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态度中,最狡猾的是美帝。美帝虽然没有直接充当此次屠杀的刽子手,但对付中国人民則与英帝并无二致。当时,它一方面利用部分人对美帝存在幻想的机会,伪装出同情并支援中国人民的面孔,当“沙基惨案”发生的第二天广东省公署召开各团体联席会议討論成立“沙基惨案調查委员会”时,美領事即参与會議,还正式加入該委员会;而在另一方面,它与英帝国主义一起共謀迫使中国人民屈服,在“沙基惨案发生后,革命政府聘俄、德、美等国領事为調查員,当要签名証实英国先开枪射击中国巡行群众之报告时,而美領事又拒絕不肯”⑩。不仅如此,当香港英侨要英政府以最后通牒致广东政府时,美帝的上海大陆报竟然发表了实质上是贊同发动对付中国人民的战争的社論,非常露骨地鼓吹侵略中国的战争。

虽然英、美、法等帝国主义决意与中国人民为敌,但中国人民的斗争却得到了社会主义的苏联以及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支援。

苏联是真正同情并支援中国人民的唯一国家,惨案后的翌日,苏联領事不但参加了調查委员会,并致函广东政府表示支援:“逕啓者,聞悉貴国国民,作爱国的和平巡行,无辜慘被沙面外兵屠杀。仆仅代表敝国政府及苏俄人民,对于貴革命政府及人民,尤其是对于和平徒手巡行之慘受杀戮危险的群众,表示深厚的同情。敝国对于貴国反抗帝国主义,以圖独立,引为愉快。并希望上海、汉口及新近广州所发生之惨

① “国聞周報”第二卷,第二十九期,第34頁。

② “响导”第一二七期,第1164頁。

③ “东方雜誌”第二十二卷,第十四期,第4頁。

④ 同上,第二十二卷,五卅事件临时增刊,第31頁。

⑤ “响导”第一三三期,第1216頁。

⑥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簡史”,第242頁。

⑦ “响导”第一三〇期,第1194頁。

⑧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簡史”第244頁。

⑨ “沙基惨案宣傳大綱”,載“广东青年”第四期,第3頁。

⑩ “新学生”第一期,第11頁。

# 希腊化时期的文化

吳 于 塵

从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死于巴比伦，直到公元前30年屋大维并吞埃及，前后共约三个世纪。在近代西方史学上，这三个世纪被称为希腊化时期。所谓“希腊化”（Hellenism），其字义本是不大明确的。它可以泛指全部古代希腊的文化，也可以专指从亚历山大东侵以后，希腊文化传播到东部地中海、北非和西亚等地的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自从十九世纪德罗森发表他的“希腊化史”以来<sup>①</sup>，西方资产阶级史学对于“希腊化”一词的使用，才相沿采取后一种的意义。因此从亚历山大帝国分裂而成的国家就被称为希腊化国家，这个时期的历史也被称为希腊化的历史。西方资产阶级史学之所以用“希腊化”这个名词来标明一个时代，显然是为了强调希腊的因素在这段历史时期的作用，把这段历史看作希腊历史的延长。罗斯托夫策夫在他的晚年著作里曾经这样说过：“希腊化世界是由亚历山大征服东方而造成的世界，只要由它分裂而成的各国保持政治的独立，希腊人在这些国家的一切生活中还在起着主导的作用，那么希腊化世界也就始终存在。”<sup>②</sup>罗斯托夫策夫的这一片

面性的论点，在西方资产阶级史学中是典型的论点。但是历史的真实却绝不如此。任何一个不为成见所蔽的历史家，都可看出在这一段历史时期里，虽然像罗德斯这样的国家还保持希腊城邦共和国的特色，但是在多数的希腊化各国，不论是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方面，东方的因素都起了不可估计的和具有决定意义的作用。举其浅显的、然而也是很根本的一点来说，如果没有东方社会所创造的巨大财富，就不会出现这一时期的东地中海的经济繁荣；没有这一时期的经济繁荣，希腊征服者在东方国家所建立的强盛的王朝以及在这些王朝羽翼之下的诗人、学者和规模庞大的学术机构，也就一无所托。在这个时期里，虽然希腊的语言、文化有了广泛的传播，然而构成这个时期文化的背景和特征的，不仅有希腊方面的因素，也有东方的因素；属于这个时期的某些杰出的成就，不仅

① J. G. 德罗森（1808—1884），德国的历史学家。所著“希腊化史”于1836—1843年间陆续发表。德罗森接受黑格尔的思想，推崇“权力”和“功业”。他强调希腊征服者在希腊化时期历史中的作用。

② M. 罗斯托夫策夫：“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卷一，序言，第V页。此书共三卷，其论点在西方资产阶级史学中有很大的代表性。

剧，致使贵国全体人民，联合一致，共同奋斗，得着最后的胜利。”<sup>①</sup>苏联外交部也一直站在反帝斗争的立场，驳斥帝国主义的侵略谬论。

“沙基惨案”消息传到法国后，法国共产党也急电驻广州的法国水兵，要其拒绝射击中国工人，并应结为良友。

此外，留粵的印度、朝鲜、越南侨民都对帝国主义屠杀表示非常愤恨，召开大会并发表声讨帝国主义的宣言。

这些正义的支援，与英、法、美的侵略行为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 四

以省港罢工工人为主力的广东人民的反帝运动虽然在惨案后空前高涨起来，且有了全国革命群众的支

援，形成了一支反帝的雄伟大力量，但是，广东政府中的国民党右派，始终是反对罢工的，他们站在帝国主义方面阻挠、打击群众的反帝运动。

广东政府自孙中山逝世后，地主、买办阶级的代表胡汉民、许崇智操纵了政权。所以，在这次斗争中虽然提出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目的等外交方针，但右派却高唱单独对付英、法的论调，要求只赔偿惨案损失。胡汉民曾别有用心地说：“德奥两国自欧战后，对于中国已取消不平等条约，我们应该以平等相待，美葡荷等国虽然没有取消不平等条约，但于此次沙面惨杀事件，并无直接参加，我们应该分别清楚，……”<sup>②</sup>并且，胡汉民在各种会议、报告、文件上都强调美、德对广东政府的帮助。这些足以证明操纵政权的右

① “沙基惨案”第161页。

② 同上，第55页。



是由于希腊文化的陶养，同时也是由于东方文化的陶养。在有些方面，虽然希腊的因素比较突出，但是由于经济和政治的环境不同，文化服务的对象不同，它已经不能单纯地看做是古典希腊文化的延续。因此，我们虽然沿用“希腊化时期”和“希腊化文化”这类公认的名词，但却不默然这类名词所暗示的片面性的涵义<sup>①</sup>。希腊化时期的历史应该看做是希腊因素和东方因素多样性地互相融合的历史。撇去任何一方所起的作用，都将是对于真实历史的歪曲。

为了说明希腊化文化的特点，我们将首先说明这个文化所处的经济和政治的环境。了解了这些环境，就可以更好地了解这个文化的某些得到突出发展的方面和它虽然因承希腊，但又不同于希腊古典文化的方面。

从公元前四世纪的末叶起，地中海东部的经济就开始发生重大的变化。雅典的经济地位降落了，代之而起的是繁荣远远超过雅典的北非、西亚，以及罗底斯等岛上的城市。这些城市有宽阔的道路，宏伟的建筑<sup>②</sup>。士麦那有最先出现的铺设路面的通衢，安提犹有盖着列柱长廊的街市。古老的推罗城，在这时是楼宇连云；新建不久的亚历山大港，筑起了高达四百英尺的塔灯。亚、非、欧、三洲之间的多边国际贸易，是以这些城市为枢纽来进行的；长途的海陆交通，成为当时国际贸易的动脉。尤其是海运方面，希腊化时期的发展，已经远非希腊的古典时期可比。当公元前第五世纪，雅典的海运可算盛极一时了，然而冬季不下海，还几乎是当时每一个船主的戒律。到了希腊化时期，海上的冬季航行已经习以为常，商业高涨的要求，终于消除了传统航海业的淡季<sup>③</sup>。在城市商业发

展的同时，手工业和农业也都有长足的发展。托勒密埃及、帕加马、塞留西等国，各个有其特种的工艺，这些工艺产品往往远近驰名。埃及和帕加马还经历农业方面的繁荣：前者是东地中海的谷仓，后者有仅次于埃及的谷物输出。这种全面性的经济发展，我们认为希腊式奴隶制经济和东方所固有的经济互相融合发展的结果。特别是在东方的国家，这种东西融合的现象尤其显著。以托勒密埃及而论，由于希腊殖民者的影响，这个时期的奴隶制当然是有所发展的。纸草文书中有不少关于奴隶问题的材料<sup>④</sup>。在托勒密宫廷诗人狄奥克里特所描述的日常对话里，也反映埃及有操外籍语言的奴隶<sup>⑤</sup>。虽然这类材料还不很具体，但我们可以相信，至少在希腊殖民者所聚居的少数城市

① 参看B.C.塞尔格叶夫：“古希腊史”，高等教育出版社版，第434页，对资产阶级史学著作中“希腊化”定义的批评。

② 亚历山大城的街宽一百呎，帕加马城街道的宽度为三十三呎，连马格奈西亚这样的城市，街道的宽度也有二十六呎半，见W.W.托恩：“希腊化的文明”，第276页。雅典当伯里克利的时代，街道还是通常不到十五呎宽。见W.S.台维斯：“古雅典的一日”，第12页。关于希腊化城市建设，参看托恩，前揭书，第276—281页。

③ J.B.布莱：“希腊化时期与文化史”，载题为“希腊化时期”的诸家论文集，第5页。

④ A.S.亨特及C.C.艾德加尔：“纸草选集”，卷一，第97页；卷二，第7，41，137页。关于托勒密埃及奴隶所有制的一般情况，参看苏联科学院编：“世界通史”，第二卷，第238—239页。W.L.威士特曼著有“托勒密埃及的奴隶制”，但我手头无此书。

⑤ H.I.贝尔：“从亚历山大至阿拉伯征服期间的埃及”，第52—53页，引狄奥克里特所叙街头运客与两个妇人的对话。

派，实充当了帝国主义破坏中国人民反帝民族统一战线工具。

右派的反动行为，还表现在他们与英、法的交涉活动中，他们把交涉仅仅限于外交文件的来往。正如当时东方杂志评论说：“广州当局虽然以外交强硬著名，但接到了英领事‘五项要求不必考虑’的照会，也有无可如何的样子。”<sup>①</sup>更无耻的是胡汉民在事变后居然公开地说：“一方面注意于勉抑人民痛愤之气，严戒辗转仇杀，始终以保护外国人生命财产为己任。”<sup>②</sup>这种奴颜婢膝的态度，清楚地表明了他是帝国主义的走狗。

尽管省港罢工工人还在罢工委员会领导下继续坚持罢工和封锁香港，群众的反帝斗争还在激烈展开；但是，在右派的策划下，廖仲愷先生被刺，八月二十九日，广东各界乃发起了一个“北上外交代表团”，

由林森、邹鲁等右派率领北上，实行所谓“全国统一对外交涉”，将沙基惨案“移京办理”。可以想见，完全投靠帝国主义的段祺瑞政权，当然不可能希望其在与帝国主义交涉中得到对中国人民有利的结果。事实证明，沙基惨案移京办理后，就不了了之。而国民党右派则借此而推卸了对外交涉的责任，避免了与帝国主义的正面冲突，因而有利的仅是右派及其代表的地主、买办、资产阶级。

沙基惨案移京办理后，省港罢工中的中英谈判虽还在进行，罢工委员会也坚持要与沙基惨案一并解决。但是到了1926年十月，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省港罢工工人为了支援北伐战争，自动结束了罢工，因此，关于沙基惨案的交涉也就同时结束了。

① “东方杂志”第二十二卷，第十五期，第4页。

② “沙基痛史”第65页。

里，古典的奴隶制经济应该占有一定的地位。然而从另外一些材料来看，除了奴隶制经济的发展而外，我們也可看到埃及传统的古代东方经济制度的顽强存在。根据托勒密二世（公元前285—246）的“国课法令”，王室油坊的榨油工人就是一种属于埃及传统的、受官方的严格管理、但却具有半自由身分的劳动者<sup>①</sup>。当时的土地制度以及在这个制度之下从事耕作的“王田农夫”，其地位和以前的也几乎没有区别<sup>②</sup>。关于埃及以外的东方希腊化国家，我們所知不多。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不论塞留西王国或帕加馬王国，它们的经济制度都和托勒密埃及是属于同一的类型<sup>③</sup>。可见希腊化时期的经济繁荣，虽然离不开希腊奴隶制向外扩张的刺激，但同时也是在东方旧有制度之下得来的发展<sup>④</sup>。这就是希腊化文化所借以建立起来的经济基础方面的特色。

正因为东方原有的经济制度在这个时期的顽固的存在，所以基于这种制度的专制政体，也就被在东方各国建立起来的希腊征服者的王朝承袭了下来。亚历山大的繼承者，不过是一些說希腊話的东方皇帝。托勒密是新的法老，塞留西是新的阿开墨尼。这些东方式的王朝，与馬其頓等并世而立。托勒密、塞留西和帕加馬的阿托立諸王，像过去的东方皇帝一样，都是全国土地的最高所有者；他們壟斷海陆貿易和手工業，斂聚巨大的財富。这些財富除了用于扩张权力和豪华享受而外，也有一部份用于宏獎学术，召致人才，支持对軍事和经济有利的技术创造。于是在这些王国的都城，出现了依附宫廷的詩人、学者以及王家圖書館、博物館等等。亚历山大、帕加馬和安提阿等城的圖書館，在王室的支持之下，都有丰富的藏書，館内还进行各种学术活动。帕加馬城的圖書館，藏書約达二十万卷。亚历山大城的圖書館还过于此，有的估計为七十万卷，有的估計外館为四万二千八百卷，內館为四十九万卷<sup>⑤</sup>。这种受王室庇蔭的圖書館，可以說是东方亞述帝国的傳統。古典希腊是既沒有国家圖書館，也沒有受官方豢养的学者。亞里士多德的藏書虽富，但那是属于私人的；阿加得米和萊西厄模也都是私家講学的場所。所以在希腊的古典城邦里，学术是出于私門；在东方的希腊化国家，学术却受庇于强大而富有的王室。这个区别的意义是不可忽視的，它說明希腊化时期的文化虽然在許多方面受古典希腊的影响，但是由于政治环境的不同，已經沒有古典希腊时代的奴隶制民主的性質。只有在日趋沒落的雅典，还殘存着私家講学的風气。

在希腊化时期的东方国家里，还有許多希腊人移殖的城市。亚历山大和塞留西諸王，都曾热心于希腊

式城市的建立。这些城市不仅模拟希腊城邦的机构和制度，而且也有希腊式的劇場、运动場，以及傳授希腊文化的学校。从表面来看，这些城市应该是道地的希腊式了。然而在东方建立起来的希腊式城市和古典的希腊城邦毕竟是貌合神离的。它們不是独立的共和国，它們只是在大王国領域里面的具有某些自治权利的城市。在这些城市里，虽然也有所謂“公民”，然而这种“公民”已經远不能和古典希腊城邦的公民相比。对于古代东方，“公民”这个概念本来就是很陌生的。所有希腊式自治城市的“公民”权，也只限于極少数的希腊征服者以及能操希腊語并与希腊人合流的本地上层份子。占居民大多数的本地人民，虽然并非奴隶，但却不属于“公民”之列。于是傳播于这些城市的希腊文化，成为只属于少数人的貴族文化；对于大多数本地的人民它完全是漠不相关的外来品。我們回顧公元前五世紀的雅典，凡本籍自由民都有公民权，当时的文化也是在公民範圍內的群众性和民主性的文化<sup>⑥</sup>。然而这种情况却不見于东方各国的所謂希腊式的城市。尽管这种城市也有希腊式的劇場，也上演希腊的戏剧，但这一切都不会像在雅典那样和广大公民群众的思想感情联成一片，也不会像那样触发广大群众所迫切感受的属于时代的问题。所以即使这些城市的殖民者原封不动地从希腊搬来了古典的文化一点一滴都保持希腊的面貌，然而它的社会意义已經不同，不能和古典的希腊相提并論了。

① A. S. 亨特及 C. C. 艾德加尔：“紙草选集”，卷二，第19頁，參看 B. C. 塞爾格叶夫：“古希臘史”第447頁；M. 羅斯托夫策夫：“希臘化世界社会經濟史”，卷一，第303頁。

② 參看苏联科学院編：“世界通史”，第二卷，第239—240頁；又塞爾格叶夫，前揭書，第439—443頁。

③ 參看塞爾格叶夫，前揭書，第464、467頁。

④ 希臘化世界是亞歷山大東侵以後由東西文化經濟交流而联系起來的一个包括不同地区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各个地区的情况是不平衡的。爱琴海岸和海內諸島以及西西里的原有希腊諸邦，其社会經濟制度当然是属于希腊式的。然而希腊化的时代已經是大王国并立爭雄的时代，希腊式的城邦共和国虽然在罗底斯等地还繼續繁榮，但它已不是这个时代的历史重心。下文将要論及这些地区的文化，但在討論希腊化国家的經濟制度时，对于它們就只有略而不論了。

⑤ 安东尼將帕加馬藏書移贈埃及女王时，共二十万卷。亚历山大城内外館藏書，系根据拜占廷学者的估計，“劍橋古代史”，卷七，第252—253頁。

⑥ 參看 B. C. 塞爾格叶夫：“古希臘史”，古典时代的希腊文化一章中的某些說明，第315—318頁。



所以經濟和政治的環境不同，社會的階級結構不同，文化的性質，文化為誰服務的問題，也就跟着不同。除了像羅底斯這些繼續存在的希臘式國家，幾個主要希臘化國家都面臨上文所述的情景。我們之所以要分析希臘化國家經濟和政治的環境，目的就在於指出希臘化文化和這些還保持着古代東方特點的經濟和政治環境之間的關係，指出它不是希臘古典文化單純的延續。

**編者注：**作者在闡明希臘化時期文化的特徵時，在這一節着重分析了希臘化諸國的經濟和政治環境，這是必要的；但是，作者強調了這些東方國家舊有制度的“頑強存在”，並舉出某些例證說明這些國家勞動者的“自由”，似乎“傳統的古代東方經濟制度”和希臘的奴隸制經濟處於迥乎不同的狀態，這就和主要的史實有分歧。我們認為古代東方諸國的所有制是有它一定的特色的，但這種特色不能否定古代東方國家的所有制是奴隸制這一基本的事實。遠在亞歷山大東征以前，地中海東部乃至中亞諸國，奴隸制便存在着；正是由於奴隸制的發展使國內主要矛盾尖銳化，因而促成這些國家採取專制集權的政治形態。希臘化的結果使發展類型的奴隸經濟擴大到東方，更加强了這些國家的內部矛盾，此外，還加上了希臘人統治所引起的民族矛盾，因而東方國家的專制政制非但沒有衰落，反而有了發展和鞏固。不指明古代東方經濟關係的奴隸制性質，不僅不符合當時的基本事實，並且也不能說明專制政制發展的真正原因。這是我們與作者不同的看法，特在此處注明。

## 二

現在要看看希臘化文化的幾個主要方面。

希臘化時期的第一個文化中心是亞歷山大城。它是希臘化世界的國際商港、強盛的托勒密王朝的國都、在有悠久文化傳統的埃及領土上發展起來的一個城市。托勒密最初幾代的國王，在這裡建立當時第一流的圖書館和博物館。他們以優厚的待遇，羅致來自希臘化世界各個地區的人才。在亞歷山大享有學術聲望的歷任圖書館館長，幾乎都是出身埃及域外的人物。澤諾多特斯來自以弗所，阿波羅尼厄斯來自羅底斯，埃拉托色尼和卡利馬克斯來自舒壽尼，亞里斯多芬來自拜占廷<sup>①</sup>，阿里士托克斯來自塞模斯，等等。連一生受知於叙拉古僭主的阿基米得，也曾到過埃及，並且在那裡作過重要的發明<sup>②</sup>。因此，繁盛的物質基礎，統治者的庇蔭和支持，各方人才的薈萃，以及希臘和東方文化的合糅，替亞歷山大城在希臘化文化史上造成無可與京的地位。

亞歷山大城文化成就的特色之一是技術和科學的發達。托勒密王朝從經濟和軍事的要求出發，大力鼓

勵機械技術的進步。克特普比阿斯發明以空氣制動的弩炮和計時的水鐘，其他的人發明水車，阿基米得在旅居埃及期間發明了螺旋揚水器。在托勒密二世的時期（公元前285—246），受雇於王室的技師曾經建造一艘巨大的戰艦，艦長二百八十呎，寬三十八呎，船頭高四十八呎，可容櫓手四千人，工役四百人，海員三千人<sup>③</sup>。這隻戰艦的規模，充分說明當時航海事業和造船技術的發達。和技術方面的發達相適應，各種理論科學也有重大的成就。埃及人自古以來，就在測量土地和興建帝王陵寢的實踐之中，累積了許多幾何學的知識<sup>④</sup>。希臘人也是一向重視幾何學的；畢達哥拉斯輝映於前，柏拉圖學派又以研究哲學必須精通幾何標榜於其後。到了公元前四世紀末，逍遙學派的攸底模斯已經寫了四卷幾何學史<sup>⑤</sup>。接着歐几里得就寫出著名的“幾何原理”<sup>⑥</sup>。歐几里得是亞歷山大城數學學派的奠基者。他的主要貢獻是集幾何學的大成，並且加以發展，將各種定理、命題、論證按邏輯排列，使之形成一個完整的體系。歐几里得之後，亞歷山大城的數學學派代有才人：阿里士托克斯運用完密的幾何方法，寫成“論日月的體積和距離”的論文；出身波伽的阿波羅尼厄斯<sup>⑦</sup>，著有論圓錐曲線學八卷；到了第二世紀，創立平面和球面三角學的尼西亞人希帕克斯也到了亞歷山大。在數學史上，他們都是有卓越地位的人物。

天文學與數學同時發展，有些數學家也是著名的天文學家。對於希臘化時期的天文學，古代東方的成就顯然起了更大的作用。埃及人早就有了精細的星象觀察。公元前十二世紀拉美西斯六世的墓里，就有全年以內每隔兩周的夜間每一小時星辰經過中子午線的

① 此人和雅典喜劇家亞里斯多芬同名，但非一人。

② “劍橋古代史”，卷七，第363頁。

③ B.C. 塞爾格叶夫：“古希臘史”，第491—493頁。

④ 相傳泰利士在旅行埃及之後，因受埃及測量土地的若干規則的啓發，曾經設想可以成立一門有關空間和形式的科學。參看W·丹庇爾：“科學史”，第44頁。關於埃及人在建築中運用幾何原理的準確，參看F·貝特里：“埃及人的智慧”，“英國埃及考古學院叢刊”，卷六十三，第26—31頁。

⑤ 攸底模斯為羅底斯人，約在公元前320年著“幾何學史”，已佚，僅有斷片殘存於他家著述之中。

⑥ 歐几里得的身世不詳，據公元後五世紀普洛克勒斯的記載，他生當托勒密一世（公元前323—285）之際。所著“幾何原理”共十三卷，另兩卷系後人增益。

⑦ 與出身羅底斯的阿波羅尼厄斯同名，但年齡稍長，約生當公元前三世紀後半。羅底斯的阿波羅尼厄斯是詩人及文法學家，波伽的阿波羅尼厄斯則是幾何學家。

長表①。巴比倫的天文學也有悠久的历史，从迦勒底帝国到波斯帝国，它的天文纪录曾一直保持不断②。这些长期累积起来的知識宝藏，到了希腊化时期，就轉成为天文学家的重要凭借。希帕克斯在天文方面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利用巴比倫天文知識的結果。他对岁差的发现，可能是从夕帕尔的天文学家克得納斯轉手而来③。巴比倫的星象纪录，大概也影响到当时天文学家关于天体运行的理論。公元前四至三世紀之間的阿里士托克斯，曾經預見到太陽中心說。他認為太陽和其它的恒星都是不動的，而包括地球在內的所有行星，都依圓形的軌道繞日而行。但是根据觀測和紀錄下來的現象，太陽不可能处于阿里士托克斯所設想的行星軌道的圓心。因此波伽的阿波羅尼厄斯主張行星繞日，而太陽又環繞地球；希帕克斯則利用幾何的推理，解釋太陽表象運動，斷定太陽和行星都是繞地球而行。和希帕克斯同時代的迦勒底人塞留古，曾經力圖為阿里士托克斯的理論辯護。但是他沒有能够发现地球繞日的軌道是橢圓而非正圓，因而也不能証明太陽中心說的正確④。于是希帕克斯的謬論占了上風，一向為希臘人所相信的地球中心說，又繼續在天文學中統治了十幾個世紀⑤。

希腊化时期也是地理知識增長和扩大的时代。特别是航海業的发展，使人們約略看到大陆与海洋的关系。壟斷海上商業的托勒密王朝，对航海活动抱有很大的兴趣。它遣人探航过紅海、阿拉伯海以及非洲沿岸。到了公元前二世紀，由于季候風的发现，埃及船可以一直航行到印度。塞留西王朝的商業，虽然是以陆路为主，但它向南利用波斯灣，向北探索过里海。它在里海南岸探索的結果，以为那是北方大洋伸入大陆的港湾。塞留西又曾派过使节常駐印度孔雀王朝的首都，这位使节还写了一部印度聞見录，扩大了当时关于印度的知識⑥。基于这些知識的累积，地理学家才有可能形成关于已知世界的概念。公元前三世紀，埃拉托色尼繪成了世界地圖。他認為所有的海洋都連成一片，非、亞、歐三洲是被海洋圍繞着的一个大島。他相信地圓說，在地理學史上第一次指出由現在的西班牙沿同一緯度航行，最后可以到达印度。他又精嫻数学，曾經根据夏至日在悉尼和亞歷山大兩地日晷儀上所觀察到的太陽陰影的差距，計算地球的圓周为252,000斯台得，約合39,690公里，和近代科学所測得的数字几乎相等⑦。在埃拉托色尼之后約半个世紀，希帕克斯批判了他的世界地圖，提出用經緯綫确定地理方位的原則。这就又为科学的地理學开辟了新的途徑。

希腊化时期的科学技术中心，当然不限于亞歷山

大。經濟繁盛的叙拉古、罗底斯和帕加馬也在不同程度上有过科学方面的創造和活动。希帕克斯在来到亞歷山大以前，曾在罗底斯进行过天文觀察。出身于叙里亞的博学家波塞杜尼厄斯（公元前135—51），也曾在罗底斯享有盛譽。他第一个按气候把地球分为五帶，又認為潮汐的不同，应当归因于月亮的圓缺。至于帕加馬，也曾吸引数学家阿波羅尼厄斯的訪問⑧。然而在亞歷山大以外的几个城市里，叙拉古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地位是最杰出的。阿基米得（公元前287—212）在叙拉古一峰獨峙，在数学家中，他是稀有的傳說最廣的人物。他發明槓桿、滑輪、无穷螺旋和各种攻守武器。他曾替叙拉古僭主希厄罗二世（公元前692—216）設計建造裝有八个礮堡和投弩炮的巨型战艦。此外，他是著名的比重原理的发现者，建立了流体靜力学这一完整的学科。但是他認為机械发明不过是一些几何学的游戏，他所引以自負的是在于数学方面的成就。在数学方面，他有不少的論著，其中最为世所知的是“論量圓”和“論球体与圆柱体”。他計算圓周率的上限是 $3\frac{1}{4}$ ，下限是 $3\frac{1}{7}$ ；他証明一个圆柱体对它所外切的球体，不論在容量和面积方面，其比例都是三比二。他把后者看做是一生最大的貢獻，当西塞祿发现他的墓碑的时候，上面就刻着一个圆柱体外切球体的几何圖⑨。他和亞歷山大城的关系，前文已經提到一点了。他写的“論方法”一文，就是一篇寄給埃拉托色尼的作品。

亞歷山大城圖書館事業的发达，又引起几种有关学科的研究和建立。圖書編目学和抄本校勘学都在这时兴起了，不少有才能的博学家把精力投入这一繁瑣

① F·貝特里：“埃及人的智慧”，第11—12頁。

② B.И.阿甫基耶夫：“古代东方史”，三联書店1957年版，第144—145頁；L·德拉波特：“美索不达米亚——巴比倫和亞述的文明”，第234頁。

③ 夕帕尔是巴比倫天文学的三大中心之一，克得納斯是公元前四世紀末至三世紀中的天文学家。W.W.托恩：“希腊化的文明”，第262、264頁。

④ W.W.托恩：“希腊化的文明”，第262—263頁。

⑤ 希帕克斯的錯誤理論为以后的托勒密所接受，托勒密的地球中心說又支配了欧洲中世紀的思想。

⑥ 塞留西派駐印度华氏城的使节是迈格塞尼，其所著聞見录已佚。

⑦ M.C.波德納爾斯基：埃拉托色尼，載地理發現与地理學史譯文集，第35—36頁。

⑧ 阿波羅尼厄斯曾經把他的圓錐曲綫學后五卷獻給帕加馬王阿托勒斯一世（公元前241—197）。參看“劍橋古代史”，卷七，第397頁。

⑨ “劍橋古代史”，卷七，第303頁。



而又艰难的工作。卡利馬克斯（公元前三世紀中叶）所編定的目录，共一百二十卷。他把希腊古典作家分为八类，每家附有傳記，实际上是为希腊文学史奠下了基础。澤諾多特斯（公元前三世紀，与托勒密第一、二兩代国王同时）由抄本的比較研究而最先創立校勘学。他整理荷馬史詩的抄本，芟除后人掺入的部分。亞里斯多芬和阿里士托克斯繼承其業；現在通行本的荷馬史詩，即大体是出于阿里士托克斯之手。在其它的古典抄本上，他們也下了同样的功夫。他們一面校勘，一面注疏，以浩博的征引，解釋冷僻的字义。因此他們又是文字学、文法学和辞書編纂学的前驅。这类工作虽不如科学发明之为世所知，但却为后代留下了重要的遺產。

在文学方面，亞历山大城的成就，也可以說，包括希腊化各个地区的成就，却远不如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光彩。亞历山大城的詩人是学究式的詩人，他們写的詩是为在同道之中彼此傳閱而作的。他們在詩中炫学，堆砌字句，缺少詩人真实的感情。卡利馬克斯最重要的一首哀歌体的詩是“爱提亞”，这首詩就几乎是一堆不相联属的关于历史、地理、神話学和民俗的杂俎<sup>①</sup>。牧歌詩人狄奥克里特是以善写西西里的自然風物和漁夫村女知名的。但他的牧歌进过托勒密的宫廷，不免沾上宫廷气，在牧歌之中，也有歌颂帝王和后妃的作品<sup>②</sup>。在古典希腊的时代，悲剧在詩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是向人民群众演唱的詩。抒情詩本来也是和琴而歌的，它也直接訴之于人們的听觉<sup>③</sup>。这样的詩显然还存有一些口头創作的特色。它是給人听的，而不是給人閱讀玩索的；是生活在人們记忆之中的，而不是存在于書本之上的。然而希腊化时代的詩却不是这样，它沒有这些特点。古典的悲剧衰落了，抒情詩也和音乐脫节了<sup>④</sup>。詩成为少数宫廷学者評量吟味的东西，它在文字上可以写得很工巧，但是內容貧弱，缺少直接震撼人心的力量。希腊化时期的科学技术很燦爛，而文学却这样地黯然无色，这的确是一个很不易解釋的疑問。有人認為古典希腊的大師們太偉大了，他們使得希腊化时代的后繼者无法追踪<sup>⑤</sup>。我們不能同意这样的說法。

要說明希腊化文学不振的原因，我覺得必須求之于本文第一节所分析的当时社会、經濟和政治的环境。在古典希腊时期，文学是和自由公民范围以內的人民群众密切相連的。以悲剧而論，它取材于人民所熟悉的神話和故事，它在公民群众广泛参加的庆典节日里上演，表达当时社会所能理解的思想感情的冲突。它的語言不是雕琢的語言，而是公民群众所能直接感受的語言。它的成敗優劣須受公民群众的評論。所

以它是古典奴隶制公民民主之下的产儿，它和当时的公民的社会生活結成了一片。到了希腊化时期，这些社会条件已經不存在了。托勒密埃及沒有发展成为古典奴隶制的社会經濟，沒有雅典式的公民民主，沒有可以接受观剧津贴的公民。一般人民是被征服者和被統治者，他們不理解以希腊語写成的文学，也不需要这种文学。外来的希腊文人学者以及受希腊語教育的本地上层分子，都是一些浮在社会表層的裝飾。他們和一般人民沒有共同的东西，因而也不能从人民的生活感情中吸取精神的营养。他們托足于宫廷，偏促于王家圖書館的廊廡之下。他們的語言、思想是少数上层分子的語言、思想。于是他們的詩只能是学究式的詩，献媚于宫廷权貴的詩，既难获得人民性的內容，也无从訴之于人民群众的觀賞。一个失去和人民大众生活感情联系的文学，必然是干瘪和枯燥的文学。以阿里士托克斯、卡利馬克斯这类人物的才能，未必不能追踪古典时代的巨匠。但是在他們所处的社会里，作为研究自然、研究抄本的学問家，他們可以起很大的作用；作为詩人和作者，就不可能在历史上留下影响。他們的悲剧是在于把生長在一个特定社会的東西移植于条件不相同的社会，結果就只有枯萎。因之，这不是什么不能追踪古典大師的問題，而是社会經濟和政治环境不同的問題。如果不从这一点来看希腊化时期的文学，也就不能触到历史的实际。

在雅典，米南德（公元前343—293）的新喜剧曾以刻画世态而風行一时。然而这种喜剧也正在失去古典城邦时代的風貌。米南德的世界觀已經不是城邦的世界觀。他說：“我不叫任何一个君子是外邦人，我

① 參看B.C.塞尔格叶夫：“古希腊史”，第509—510頁。

② 这不仅宫廷詩人如此，即天文学家也不免此态。据傳托勒密三世之后曾向神默禱：如其夫由战争中安全归来，願截髮献神。不久王果归，后割髮完願，献于神庙，倏忽不見。于是宫廷天文学家出而献媚，說皇后的髮髻已經上了天，成为一个星座。至今西方还称这个星座为后髮星座，宫廷習气对于人的思想感情所起的腐蝕作用，从这个例子上可以略見一二。托勒密宫廷詩人之所以沒有偉大的作品，应与此有关。

③ 抒情詩按原文的字义來說，就是琴詩，說明那时詩和音乐的密切关系。

④ 參看“劍橋古代史”，卷七，第268頁。亞历山大城的抒情詩已經离开音乐伴奏，当时詩人看不起通俗歌唱的酒神贊歌。

⑤ W.W.托恩即作此說。見所著“希腊化时期的文明”，第238頁。

們都有共同的本性。”<sup>①</sup>这和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的看法已經全不相同。1905年，开罗附近发现米南德喜剧紙草共約一千四百行，其中有六百五十行是属于同一剧本的。在这些材料中，沒有像亞里斯多芬喜剧那样对城邦公共生活的关切，沒有議論城邦对外的問題。古典时代雅典公民把城邦的是非当做分內事的那分心情，在米南德的喜剧里已經找不到踪影。充實篇章的是一种生命受制于不可捉摸的偶然机遇的思想，完全失去了古典时代的自由意志与命运相冲击的撼人神魂的魄力。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当时的雅典已經是沒落的雅典，城邦的公民也已經淪为无業的游民。一个多世紀以前在薩拉米斯英勇衛國的雅典公民，这时已經是墳墓里的枯骨；时代已經喚不回他們那种为自己階級創造前途的意志。于是暮景沉沉的雅典市儉和游民，只能欣賞“老人家暴躁、僮僕撒謊、女人微笑”的喜剧<sup>②</sup>。而米南德所供給的正是这样的东西。拜占廷的亞里斯多芬曾經盛贊米南德的现实主义。的确，他反映的現實是雅典奴隶制城邦在下坡路上打滾的現實。

雕刻艺术的中心，这时也不在雅典。罗底斯和帕加馬在这时出现了新的雕刻学派。罗底斯派承襲盧西普斯的特点<sup>③</sup>，以矯健有力的男性人体和長衣垂复的女像知名。柏林所藏“在祈禱中的男童”可以作为罗底斯派修長的男性人体像的代表<sup>④</sup>。薩模斯特雷斯的胜利之神虽已不知出于誰何之手，但是看她奋举的双翼和当風吹拂的長衣，显然是罗底斯的風格<sup>⑤</sup>。帕加馬学派擅長刻画强烈掙扎的感情：如縛树临刑的馬斯亞斯和相对磨刀的奴隶，在战敗之后杀死其妻又举劍自戕的高盧战士，皆是这一方面的典型作品<sup>⑥</sup>。宙斯神壇的大幅浮雕，也强烈地表现了神与巨人的搏斗<sup>⑦</sup>。此外，在其它城市出現的雕刻里面，也可看到一些風格柔婉和描写世态的作品，例如伯尔德維尔的亞波罗神、米罗斯的美神、士麦那抱着空瓶的老妇等等<sup>⑧</sup>，这些雕刻的题材和風格，已經和古典时代的很不相同了。希腊古典雕刻的靜穆、庄严、平衡和有节制的美，已經演变为上述的种种。由于商業发展而引致的社会生活世俗化的加深、城邦解体后世界观念的扩大、旧的文明世界和落后“蛮族”的接触和冲突，都影响了希腊化时期雕刻的题材和風格。

沒落中的雅典，只有在哲学的自由講学方面还保持一些旧日的傳統。犬儒学派依旧在流傳，柏拉圖学派和亞里士多德学派也繼續存在。但在当时占重要地位的，是伊壁鳩魯学派和斯多葛学派。这两个学派虽和希腊的古典哲学不无关系，然而面目全非；它們所討論的人生已經不再是局限于城邦的人生，而是处身

于新的世界中的人生了。伊壁鳩魯（公元前342？—270）接受德模克里圖的原子論，認為宇宙、包括人的灵魂在內，都是由原子構成的，人的灵魂在死后又分解为原子。他以为人生在这个物質宇宙中的目的是为了幸福，幸福意即快乐，而快乐也就是至善。但他所說的快乐并不是指感官的享受，而是指心神的謐靜。这种快乐是靜态的，不是动态的，它是一种排除情欲和免于苦惱的不动心的境界。伊壁鳩魯和他的随从者曾經形成与世隔絕的小社团，把它作为容身的孤島，以为只要不受痛苦就是得到人生的至乐。因此他的学說在实际上是一种避世論，表现为对他所处的希腊化世界沒有信心，想替沒落的城邦奴隶主在新的世界里寻找个人的安身立命的方法。斯多葛派不同于此。它的創始者芝諾（公元前336？—264？）虽然也受希腊古典哲学的影响，接受赫拉克利圖万物原于火的学說，但在很多、也是最根本的方面，芝諾的思想帶有明显的东方色彩。在东方，包括多民族的專制大帝国已經有了悠久的历史，为大帝国統治服务的一神論或宇宙最高神的思想，早已出現于埃及和西亞。在希腊化时期，巴比倫的泛命运論及占星学中的天人相应論，也正在广泛流行。芝諾是出身于塞浦路斯島的东方人，可以設想他必然受到东方思想的濡染<sup>⑨</sup>。他所說的構成宇宙的原火，其实和他所習称的自然法則、理性、命运、神等等，在意义上是相通的。他認為任何事物都和自然一体，人的理性是宇宙理性的派生；而人生的終極幸福也就在于以理性指导生活，刻苦自勵，使自己的行为符合宇宙的理性。芝諾在这个思想的基础上，形成在一个最高权力之下的宇宙国家的观

① 米南德：“断片”，620。引自“劍橋古代史”，卷七，第225頁。

② 引文系羅馬詩人奧維德論米南德語。引自“劍橋古代史”，卷七，第228頁。

③ 盧西普斯为馬其頓王腓力二世与亞历山大期間的亞哥斯和西庫昂学派的大師，善雕男性人体名家。他是希腊化新雕刻的前驅。

④ 參看“劍橋古代史圖片”，卷三，第133頁，b。

⑤ “劍橋古代史圖片”，卷三，第127頁。此像为紀念公元前258年可斯之戰而作。

⑥ “劍橋古代史圖片”，卷三，第135頁，b；第137頁，a, b。

⑦ “劍橋古代史圖片”，卷三，第149頁。浮雕高七呎，長四百呎以上，为希腊化时期的巨制。

⑧ “劍橋古代史圖片”，卷三，第145頁，b；第157頁，c。

⑨ 不但芝諾来自东方，公元二世紀中叶斯多葛派的首領狄奧吉尼斯也来自东方，受东方思想的影响。



念。他认为宇宙国家应当是不分种族和阶级界限的国家，人人都应当平等；他的人生哲理也就是置身在这一政治环境之中的哲理。所以总的说来，以芝诺为首的斯多葛派，是为希腊化时期按东方形式建立起来的专制王国，以及不论奴隶和自由人，不论是什么种族，都受其专制统治的这一现实的世界寻求理论的基础。伊壁鸠鲁派和斯多葛派的不同，并不如通常所说的一个主享乐、一个主苦行，而是在一个在新的世界面前惶惑退隐、一个却积极地肯定和巩固新的世界。这就是为什么当这两个学派传到罗马以后，堕落腐化的奴隶主则曲解伊壁鸠鲁的理论为追求物质享受的张本；而奴隶主中的正面人物，如辛尼加、马克·奥理略，则服膺斯多葛学派，以体现自然的理性自命，借以巩固大帝国的统治。

从希腊化文化的几个主要方面来看，如本文在第一节中所已指出的，它是一个东西汇合的、缺乏人民性和群众性的文化。斯多葛派虽然主张人人平等，但这个平等在实际上是人人都在一个权力之下同受专制奴役的平等；对于人民群众的生活，它没有真实的意义。科学和技术的繁荣，或则始终局限于受王室庇荫的学院之内，或则服务于专制王权的内外扩张，它也没有为人民群众的精神和物质生活带来任何的解放。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依旧受传统宗教思想的统治。支配一切的命运观念、占星学的迷信、各地的神秘教派，都得到广泛的流传。希腊神话的某些神秘部分也和东方的教派相结合，形成这个时期的混合主义的信仰。托勒密一世在萨拉庇斯大庙里所尊的神，就是埃及冥神和希腊冥神的混合<sup>①</sup>。在希腊本土，城邦的富于人性的诸神，已经随着城邦制的崩溃而被冷落在一旁。过去自由公民所直接参与的奴隶制民主政权，已经大部被他们所不能攀附的大王国专制政权所扼杀。在旧有的城邦里，旧的全权公民已经没落到和奴隶相去不远的地步。所谓自由人，也开始和奴隶一样，不能通过自己阶级的政权来支配本阶级的命运。这些社会政治环境的变化，使东方宗教信仰的移植获得大片的沃土。东方被奴役的人民借以忍受现实并把期望托之于来世的种种信仰，都在古典希腊城邦的旧壤里找到了它们的虔信者。于是各种东方教派都在这时流入欧洲；在罗马兼并希腊化世界以后，罗马的统治者也逐渐树立了专制政体，其自由公民又都趋于没落，因之这一东方宗教向西传播的趋势就更其不可遏阻了。后来基督教之所以席卷西方，从历史的背景看，早在希腊化时期就已经设下了伏笔。

由于希腊化文化是东西因素的汇合和发展，它的内容的丰富并不次于古典的希腊文化。不论对于当时

或后代的世界，这个丰富的文化都有它不可磨灭的影响。在当时，东部地中海是它全盛的中心；黑海沿岸、安息、大夏以及印度河流域，则是它影响所及的边缘。安息和大夏虽然在公元前三世纪的中叶脱离了塞留西王国，但是希腊化文化的影响并没有因此而中断。在大夏建立起来的新王朝是希腊人的王朝，它不仅在大夏铸造希腊式的货币，用希腊的语言，而且随着这个王朝向外的侵略，还使希腊化的影响深入到印度的西北。印度接受希腊化的影响，远在孔雀王朝的时期就已经开始。阿育王的某些石刻，很明显地有希腊影响的痕迹<sup>②</sup>。但是自从印度河流域比较长期地受来自大夏的希腊人的统治，这个影响就更加直接了。希腊统治者在这里铸造希腊式的货币，把希腊的造型艺术和建筑艺术更多地介绍到印度。后来在贵霜王朝统治时期发展起来的犍陀罗派的雕塑，早在这时就已奠下了基础<sup>③</sup>。在安息建立统治王朝的虽然不是希腊人，但他们并不排斥希腊化文化。大夏的希腊统治者被大月氏灭亡以后，安息人的势力也曾进入印度河流域。他们在那里也起了传播希腊化文化的作用。在安息本土，宫廷已经成为希腊化文化的庇护者。从阿托巴纳斯一世（公元前128或127—123）起，安息所铸的货币总在国王的称号上附加“爱希腊者”的字样。直到公元前一世纪中叶，罗马将领克拉苏为安息所杀之时，王宫里还有希腊的伶人演唱幼里底底斯的悲剧<sup>④</sup>。很显然，希腊化文化在安息已经是一种宫廷的贵族文化。

对于后代的世界，希腊化文化的影响尤其深远。特别是在科学方面，它一直影响到现代。欧几里得的几何学，至今在全世界的学校里传授。阿基米得的原理，也是今日每一个学童所必须知道的物理知识。阿里斯托克斯远在哥白尼之前就预见到太阳中心说。埃拉托色尼关于由西班牙直航印度的想法，启发了哥伦布。在哥伦布的一生之中，他一直相信他所发现的大陆，就是埃拉托色尼所说的印度<sup>⑤</sup>。（下转第34页）

① “大英百科全书”，“Serapis”条。

② 如阿育王在Sarnath所立华表的柱头石刻。参看“剑桥印度史”，卷一，图片XII。

③ 关于希腊对印度影响的大小，争论不一。印度学者所编写的“印度人民的历史和文化”第二卷，有R.C. 马朱姆达所写印度与西方世界一章，其中对希腊和印度的关系有简要叙述，可参看。

④ 波德塔克：“传记集”近代丛刊本，第674页。

⑤ J.B. 布莱：“希腊化时代与文明史”，或“希腊化时代”论文集，第21—22页。但埃拉托色尼认为还有别的可能，即在西班牙与印度之间，可能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大陆。

# 伊斯蘭哲学对于中世紀时期 欧洲經院哲学的影响

馬 堅

伊斯蘭哲学就是阿拉伯哲学。这些哲学家是在伊斯蘭教政权之下成長起来的，而且絕大多数是信仰伊斯蘭教的，因此，有人把他們叫做伊斯蘭哲学家，把他們的哲学叫做伊斯蘭哲学。这些哲学家都是阿拉伯帝国的人民，而且他們的哲学論文都是用阿拉伯文写作的，因此，有人又把他們叫做阿拉伯哲学家，把他們的哲学叫做阿拉伯哲学。伊斯蘭哲学和阿拉伯哲学是异名同实的。

伊斯蘭哲学是希腊哲学——主要是亞里士多德哲学——的繼續和发展。伊斯蘭哲学究竟有什么价值？伊斯蘭哲学对于世界哲学究竟有什么关系？現代科学家对这两个問題有种种不同的看法。

勒南說：“塞姆族能使自己所发明的各种宗教（他指的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具有最高級力量的色彩，却不能产生最低級的、特殊的哲学研究，这是命运的奇迹之一。塞姆族的哲学（他指的是以色列哲学和阿拉伯哲学）只是希腊哲学單純的、无結果的抄襲和摹仿。”<sup>①</sup>

勒南把伊斯蘭哲学的价值一笔抹煞，这是一种主观片面的看法，是十分武断的，一般公正的科学家都反对这种說法。

雷翁·哥提埃說：“伊斯蘭哲学家在調和哲学与宗教方面，不遺余力地尽了他們所应尽的义务，他們在从事哲学研究中表現了无比的細致和認真，也表現了深入和远見。他們关于教义与哲学的見解，是伊斯蘭化希腊哲学的关键。”<sup>②</sup>

自十九世紀末叶以来，宗教的偏見和种族的偏見几乎銷声匿迹了，到了二十世紀，西方哲学家几乎一致認為伊斯蘭哲学对于可能性的理論解釋得十分透徹，从而弥补了亞里士多德哲学里的一大缺陷。德国哲学家荷尔丁(M. Horten)就是这样說的<sup>③</sup>。

伊斯蘭哲学的功績不仅是把希腊哲学保存下来，而且加以发揚光大。西欧人在中世紀时代关于希腊文献的知識大半是从阿拉伯文譯本重譯为拉丁文后才获得的。伊斯蘭哲学傳入欧洲后，黑暗时代的欧洲人才

听到亞里士多德的名字，才接触到希腊哲学，对于研究哲学才发生了濃厚的兴趣。蒙古人征服中亞細亞各国的时候，到处屠杀科学家和哲学家，到处毁灭圖書和文物，他們扑灭了阿拉伯文化的火炬。假若阿拉伯人征服波斯、埃及和叙利亞的时候采用了这种野蛮的办法，那末，欧洲的文艺复兴可能推迟几百年。伊斯蘭哲学对于中世紀欧洲的經院哲学曾发生过重大的影响。因此，伊斯蘭哲学史是世界哲学史的一个重要环节，这是无可爭辯的事实。

下面扼要地談一談伊斯蘭哲学对于欧洲哲学的影响。

穆尔太及賴派是伊斯蘭哲学中一个重要的学派。这个学派的哲学，借精誠同志社的論文集而获得了更生。这部論文集包括論文五十二篇，于公元 970 年前后出版。这部百科全書的宗旨是調和科学和宗教，折衷伊斯蘭哲学与希腊哲学。这部巨著是取材于伊斯蘭哲学家法拉比和伊本·西那的著作的，这部書傳入欧洲后，成为中世紀基督教經院哲学中兩大派系——唯名論和唯实論——的泉源。

法拉比关于邏輯的論文，对于中世紀經院哲学的邏輯发生了永久的影响。

伊本·西那的著作譯成拉丁文后，对于西方的学术思想发生了強烈的影响，西方人曾采用他的許多术语和思想。大亞尔伯圖曾傳述了伊本·西那关于邏輯学的主張。伊本·西那說，邏輯的要旨是从已知推求未知，这个理論成为中世紀哲学遗产的一部分。

安薩里的著作对于西方的哲学曾有过重大的影响。他关于邏輯学、自然哲学和形而上学的著作在十二世紀中叶以前被譯成拉丁文后，曾流行于欧洲。雷

① E. Renan, Averroès et l'Averroïsme, Paris, 1866.

② Leon Gauthier, La Théorie d'Ibn Rochd Sur les Rapports de la Religion et de la Philosophie, Paris, 1909.

③ 埃及大学哲学教授穆斯特法·拉齐格講演集。



蒙·马丁 (Raymund Martin) 曾認識到安薩里所著“哲学家的矛盾” (Tahāfut al-Falā Sifah) 一書的重要性，他在自己所著“保衛信仰” (Pugio Fidei) 一書中會大量采用安薩里的主張，那些主張是對伊斯蘭哲学家和科学家提出的論戰。自那个时候起，基督教的学者在許多学术研究中常常利用安薩里的學說。基督教的学者接触到安薩里的著作的时候，他們對於他所采取的理智的和宗教的立場表示敬佩。他們仔細研究他的種種理論。安薩里的著作中有一篇論文是討論理智在天啓和信仰問題中的地位。阿奎那·多馬在自己所著“哲學概要” (Summa Theologica) 一書中會大量采用了安薩里的論據和結論。阿奎那·多馬在很多重大問題上的意見與安薩里的意見往往是一致的，他們兩人的著作有好幾章的內容是很相似的。這就說明他曾受到安薩里很大的影響。

伊本·魯世德是最晚出的、偉大的伊斯蘭哲学家，但丁稱他為大注釋家阿威羅伊 (Averroës)①，但是他在伊斯蘭世界，無論在亞洲和非洲都沒有人繼承他的學派。他的著作譯成拉丁文後曾鼓動了中世紀歐洲的經院哲学家和一般學者。他對西方的影響是任何哲学家所不能及的。自十二世紀到十六世紀，四百年間，伊本·魯世德的學說 (Averroism) 成為占優勢的學說，儘管伊斯蘭教、猶太教和基督教的正統派曾先後詆毀他，把他的學說當做異端邪說。其實，他是一位唯理派的哲学家，他認為除天啓的信條外，任何事物都應該受理智的檢查和判斷，然而他並不是自由思想派的祖師，他並不反對宗教信仰，這是許多人對於他的誤解。

早期的伊斯蘭哲学家把新柏拉圖派的許多偽書當做亞里士多德的真實著作，伊本·魯世德的哲學只承認比較純潔的、比較科學的亞里士多德哲學。他的著作經過教會當局的審定，並且把他們認為討厭的那些材料刪掉以後，被指定為巴黎大學和其他歐洲大學的教材。伊本·魯世德的學說，在歐洲思想界占領導地位，直到十六世紀現代實驗科學誕生以後。

伊本·魯世德的思想方法深入基督教思想，以致成為基督教教義的嚴重威脅。卡拉·迭·孚 (Carra de Vaux) 評論伊本·魯世德說：“歐洲的學者對於伊本·魯世德的注釋十分敬佩，連宗教家也不例外，儘管他們認為他的學說對於宗教信仰是一種威脅。”②

勒南說：“大亞勒伯圖是師承伊本·西那的，阿奎那·多馬是師承伊本·魯世德的。”阿奎那·多馬是集經院哲學之大成的哲学家，他編寫亞里士多德哲學解義的時候，採取伊本·西那的方法；他注釋亞里士多德哲學的時候，採伊本·魯世德的方法③。

伊本·魯世德的哲學秘密地傳入意大利、德意志和英格蘭，受到了方濟各派的热烈歡迎，在巴黎大學中找到了一個焦點。許多權威學者接受了這種學說。但是方濟各派的勁敵度明哥派對這種學說敲起了警鐘，他們說，這種學說毀滅一切人性，引人於宿命論，使個人理智的差別性成為不可解釋的現象。這種學說宣稱人類只有一個共同的智性，這是一大錯誤，這個大錯誤使聖徒們的功績勢必毀滅，這是斷言與人之間毫無差別。難道說彼得的神聖的靈魂與猶大的應受天罰的靈魂二者之間毫無差別么？難道說兩個靈魂是絕對相同的么？伊本·魯世德在他的這種衰頹神靈的學說中否認創造、天佑、天啓、三位一體，以及亂拜、施濟、祈禱等的效果；他不信復活和永生，他把至善只當做逸樂④。

伊本·魯世德的學說，在十四世紀前半期，曾在意大利巴杜亞大學建立了一個基地，在十五世紀和十六世紀，繼續繁榮。在公元1517年任樞機主教的那位赫赫有名的托馬斯 (Thomas de Vio) 曾採用伊本·魯世德的著作作為教材。發揚這種學說的人，最著名的是齊馬拉 (Zimara 1532年死) 和蔡巴萊拉 (Zabarella 1589年死)，直到克里摩尼尼 (Cremonini) 於1637年死後，這種學說才衰微了⑤。

教會生怕科學和哲學借伊本·魯世德的弟子和再傳弟子在法蘭西和意大利南部的努力而傳布於歐洲，所以設立宗教裁判所。這個古怪的裁判所是由於僧侶托爾克馬達 (Torquemada) 的請求而設立的。

宗教裁判所是非常盡職的，自公元1481年到1499年，十八年之間，把一萬零二百二十人判處徒刑，這些人統統被活活地燒死了。又把六千八百六十人判處絞刑，這些人游街示眾之後，都被絞死了。又把九萬七千三百二十一人判處各種不同的刑罰，一概都依判執行了。

這個宗教裁判所當日所用的審訊的方法是把嫌疑犯監禁起來，用種種刑具，施以各種酷刑，直到招供，然後判決執行⑥。

① 但丁：“神曲”，第四篇。

② Ibn Rushd, Encyclopedia of Islam.

③ Sandys, A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 Vol. I, p. 564, Cambridge, 1908.

④ Draper, History of the Conflict between Religion and Science, p. 119, 120, London, 1927.

⑤ Sandys, A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 Vol. II, P. 109.

⑥ Draper, History of the Conflict between Religion and Science, P. 122.

公元1502年，拉特蘭宗教大會議決，凡研究伊本·魯世德哲學的人都應被詛咒。於是度明哥派的基督教人以詛咒伊本·魯世德及研究伊本·魯世德哲學者為一種職業和功德。但是這種詛咒並未能吓倒一般王公大人和各階層中好學之士，他們仍然想方設法去搜求伊本·魯世德的著作，企圖用他的進步的思想來裝飾自己的理性。

宗教裁判所竭力查究求學的罪犯，以盡其撲滅異端的職責；異端無論藏得怎樣秘密，無論是藏在城市里，藏在私宅里，藏在厨房里，藏在山洞里，藏在森林中，藏在田地里，統統都要搜索出來。宗教裁判所的官員們都是熱心宗教的人物，所以能勝任愉快地執行他們干涉人民思想自由的任务。

無論在寺院里的僧侶，在教堂里的神父，在宮殿里的貴族，在商店里的商人，在工場里的工人，在田園里的農民，一經告發，立刻被捕，送到宗教裁判所去加以審訊。

這個裁判所，自公元1481年到1808年，曾判決三十四萬人，其中有兩萬人是活活地用火燒死的<sup>①</sup>。

哥倫布說，他讀了伊本·魯世德的著作後才立下發見新大陸的壯志。薩拉曼加宗教大會却判斷他的這種企圖是離經叛道的行為。由此可見，教會為什麼要說伊本·魯世德的學說是異端的根源<sup>②</sup>。

伊斯蘭哲學到了伊本·魯世德已經登峰造極，他的學說可以稱為哲學的伊斯蘭主義，這種主義公然與中世紀時代在歐洲占統治地位的教會挑戰，所以是一種進步的哲學思想。自十三世紀初葉起，伊本·魯世德在歐洲各大學中成為哲學的權威。公元1743年，法王路易十一整頓法國教育的時候，下令在巴黎大學中同時講授亞里士多德的哲學和伊本·魯世德的哲學<sup>③</sup>。

歐洲的學者與阿拉伯思想接觸之後，對於研究哲學才感到濃厚的興趣。如果我們不承認阿拉伯思想是主要的動力，我們就無法解釋，為什麼在好幾百年內，亞里士多德的名字與伊本·魯世德的名字會聯繫在一起<sup>④</sup>。由此可見，伊斯蘭哲學對於西方哲學曾起過承先啓後，繼往開來的作用。伊斯蘭哲學史是西方哲學史的一個重要環節，研究世界哲學史者，對於此點應該加以注意。

伊斯蘭哲學不僅傳入歐洲，而且在宋元時代傳入我國，但是到了清朝康熙時候，南京的回族學者劉智才用典雅的漢文編譯天方性理本經五章（計一萬八千餘字）和天方性理圖傳五卷（計四萬四千餘字），附圖六十九幅。劉智介紹伊斯蘭哲學，曾博得當時部分

漢族學者的稱贊。王弘在序文中說：

有是哉！天方之知性固如是哉！大易、尚書之言性也，渾而確；太極、通書之言性也，正而嚴；今天方之言性也，詳而核：其言先天也，則天地之節文莫不條分而縷析之；其言后天也，則性之品第莫不伐毛而洗髓焉。

徐元正在序文中說：

余于天方家之言性理蓋有深感也。天方去中國數萬里，衣冠異制，語言文字不同形聲，而言性理恰與吾儒合。其言先天、后天、大世界、小世界之源流、次第，皆發前人之所未發，而微言妙義，視吾儒為詳，不得于理者見于圖，不得于圖者見于文，兩又發明，而天人之秘密，性學之根底，燦如指掌焉。

劉智編譯的這部哲學名著未被收入四庫全書，所以一般學者不知道遠在二百五十年前早就有人用漢文編譯伊斯蘭哲學了。我相信回族的這部重要文獻，在新的中國哲學史上一定會有適當的地位的。

① Draper, History of the Conflict between Religion and Science, P.173.

② 同上書, P.134.

③ Le Bon, La Civilisation de Arabes, Paris, 1888.

④ Arnold and Guillaume, The Legacy of Islam, Oxford, 1931.

#### （上接第31頁）

希臘化時期的科學著作，也對中世紀阿拉伯的科學起過推動的作用。不少的抄本曾經被譯為阿拉伯文<sup>①</sup>。後來阿拉伯的譯本又輾轉傳入西歐，啓發了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者，使人類的科學躍進到新的階段。所以，把希臘化時期看做是希臘古典文化的衰落，已經是一個陳腐了的論點。不論對於當時或後世，這一時期的文化成就都有巨大的意義，它的局限性並不能掩蔽它在歷史上的光輝。

① 如阿波羅尼厄斯圓錐曲線學五至七卷的希臘文本已佚，只有阿拉伯文譯本。“劍橋古代史”，卷七，第307頁。



# 世界中世紀史原始資料選輯 (六)

## 关于伊斯蘭教和大食帝国的兴起

耿淡如 譯注

下引文件，說明穆罕默德創立伊斯蘭教時的情況以及阿拉伯人對征服地的措施。

文件Ⅰ和Ⅱ記述穆罕默德早期傳教的活動。文件Ⅰ指出：穆罕默德經過三年秘密傳教之後，才公布他是阿拉所派的先知。他的公開傳教引起了麥加的科里希特貴族的反對。他們起初想以財富和權力為餌，誘他放棄他的主張，繼而他們要求他做出“奇蹟”來證明他確是受阿拉所委派的。在辯論中，貴族代表所提出的問題雖然幼稚天真，但是可以反映出穆罕默德和科里希特貴族間的矛盾，也表明了穆罕默德所以出奔到麥地那的原因。文件Ⅱ描述穆罕默德進軍麥加的經過。穆罕默德在麥地那的傳教，發展很快，獲得了各部落的信仰；他把信徒組成強大的武裝部隊，所以能浩浩蕩蕩進駐麥加城。穆罕默德的這種雄厚的武裝力量，奠定了創立大食帝國基礎。

文件Ⅲ—Ⅴ說明穆斯林占領者對征服地居民所採取的寬大政策，因而受到當地居民的歡迎。為說明大食帝國為什麼能夠這樣迅速地成長這一問題，穆斯林征服者和當地居民間的關係這一環節，應予注意。文件Ⅲ說明穆罕默德對猶太居民區的寬大措施，特別是關於確定賦稅率 and 保護基督教徒。文件Ⅳ和文件Ⅴ的第一節，證明當地教會的高級人員曾協助阿拉伯人征服各城市。安提阿的教長曾勸告守城軍隊投降阿拉伯人，大馬士革的正教主教也曾協助阿拉伯人占領該城。文件Ⅴ的第二節說明拜占庭軍隊的沒有鬥志，為了要防止逃亡，兵士們竟至互相用鏈子連在一起；另一方面，穆斯林軍隊士氣高昂，奮勇作戰，不僅有男人而且還有婦女參加；當地居民包括基督徒和猶太人在內，也樂於贊助。文件Ⅴ的第三節描寫哈里發奧瑪爾在敘利亞的措施，按照納稅人的經濟能力徵稅，是一項比較公平的做法。——譯者

### Ⅰ 穆罕默德

節錄伊布·伊斯哈克，“使徒傳”。伊布·伊斯哈克生長於麥地那城，在那里他搜集了有關阿拉伯先知的生活與活動的傳說。後在巴格達，他整理其收集

的材料，著成半故事性的穆罕默德傳。768年他死於巴格達。

#### (1) 使徒向民眾傳布伊斯蘭教

後來，民眾中有大批男女皈依伊斯蘭教，這樣，伊斯蘭教在麥加城的聲名傳布開來，而大家對它議論紛紛。後來，阿拉指示穆罕默德：要他宣布他所遭遇的事情，向民眾傳達他的先知地位，並召喚他們歸向他。穆罕默德掩藏他的先知地位已閱三年，他保守秘密，直至阿拉命令他宣布出來時為止。

穆罕默德的教友時常到峽谷去禱告，他們為禱告而隱藏起來。有一次，當薩德·伊布·阿布·巴卡斯同一群穆罕默德的教友在麥加的一個峽谷里禱告時，一批多神教徒阻擾他們，而他們繼續禱告。當他們置諸不理的時候，那些人竟責罵侮辱他們。那時，薩德用駱駝頸骨猛擊一個多神教徒，並重創他。那是伊斯蘭教史上第一次流血的事件。

#### (2) 穆罕默德與科里希特族的首領間的交涉

伊斯蘭教在麥加的科里希特族的男女間傳布開來。科里希特貴族把那批屬於自己管轄權的伊斯蘭教徒關在牢監里，並盡量引誘他們脫離伊斯蘭教。

後來，科里希特各氏族的貴族，在黃昏時間，會集於卡巴廟<sup>①</sup>的後面。他們互相說道：“讓我們去找穆罕默德吧，我們將盡我們所有的力量和他辯論。”他們派人去告訴他說：你的部族代表集會，要和你談話；為此，他們來找他的。穆罕默德趕快走去，边走边想：他們要聽他的講道，但願能使他們轉變到正確信仰，同時，也為他們走入迷途而痛心。當他和他們坐下來後，他們向他說：“穆罕默德，我們找你，為了要和你談話。我們不知道阿拉伯人中還有誰，給他的部族帶來了這種情況，像你給你的部族所帶來的那樣：你謗毀了我們的祖先，污辱了我們的信仰，誣蔑了我們的神明，稱我們的恩惠是笨拙的，給我們的公社帶來了分裂狀態。你對我們，沒有一件卑鄙醜惡的事情，未曾干過。如果你提倡新教只是為了要獲得

① 麥加的古神廟。

财富，那末我們将从我們的财产里筹集这样多财产給你，使你成为我們中間的最大富翁；如果你还要获得在我們中間的榮譽的話，我們將推举你為我們的‘老翁’；如果你还要有政权的話，我們將推举你為我們的統治者。倘使你要克服那个你所看見的出現在你面前的鬼怪东西<sup>①</sup>，那末我們將花費我們的财富，為你搜求藥品，并用全副精力来治好你的病症。”

穆罕默德向他們說：“我不要你們所說的东西，我帶給你們我應帶給的东西，不是为了获得你們的财产，你們中間的榮譽，或者統治你們的权力。但阿拉派遣了我做使徒，送給了我聖經<sup>②</sup>并命令我为了你們担任福音传达者和訓誡者。我向你們传达我主宰的訓諭，并規劝你們：倘使你們接受我所帶給你們的东西，那末，你們在今生与来世將永远享福；万一拒絕我，那末，为了阿拉的事業，我將忍耐，直到阿拉就我和你們之間的事情，作出判断为止。”

他們說：“穆罕默德！倘使你不接受我們向你提出的任何一項，那末，你应知道：世間再沒有一种人民比我們生活在更穷苦、更干燥、更多生活艰难的国家里了。所以，你該用你使徒的名义，請求那委派你的主宰迁移这些圍繞我們的山嶺，推广我們的国土，引入像在叙利亞、伊拉克那样的河流，送回我們已过世的祖先，在須送回来的人中，应包括有科薩·伊布·基尔雅布，他是一个誠实的老翁；我們將就下列一点，詢問他們：即你所說的，是真实的还是虛偽的。如果他們承認你，而你做了我們所請求你做的事情，那末，我們也將承認你及你从阿拉得來的职位——他派遣了你做使徒，像你所說的那样。”

他向他們說：“不是为了这一事，我被派到你們这里來的。我从阿拉帶給你們的，就是，他委派了我。我已向你們傳達这事：我是被派到你們这里來的。如果你們接受这个，那末，那將使你們于今生与来世永远享福；万一拒絕我，那末，为了阿拉的事業，我將忍耐，直到阿拉就我和你們之間的事情，作出判断为止。”

他們說：“如果你不願为了我們做上面所說的事情，那末，請你設法：要求你的主宰派遣天使下凡，來証明你所說事情的真实性，來替你和我們辯論；請求他為你建造花園、城堡以及金銀寶庫，使你避免那穷得要死的情況，我們看到你怎样奔走市場，以求糊口，和我們一樣。如果阿拉使你發財，那末我們將承認你从你的主宰得來的資格与职位，承認你真的是个使徒，像你所說的那样。”

穆罕默德向他們說：“我不做这个事情，我不是这样的人，要向主宰請求这些东西，而且，我不是

帶着这些东西被派而來的。但阿拉派我做福音传达者和訓誡者。如果接受我給你們帶來的东西，那末，你們于今生与来世將永远享福；万一拒絕我，那末，为了阿拉的事業，我將忍耐，直到阿拉就我和你們之間的事情，作出判断为止。”

他們說：“讓天空一塊一塊地倒下来，因为你說过，你的主宰如果願意的話，会做这个。我們不会相信你，除非你做了这个。”

穆罕默德說：“这是在阿拉的权力范围之内，——如果願意做的話，那末，他会做的。”

他們說：“穆罕默德！你的主宰不会知道：我們正在和你談話，向你請求我們所請求的那些东西，以及向你要求我們所要求的那些东西。要不然的話，他會出現在你的面前，教導你怎样和我們爭辯，并會告訴你怎样来对付我們，因為我們还未接受了你所帶來的东西。我們知道，有一个也門人，名叫拉赫曼者，教導了你这个。我們向阿拉宣誓：我們永远不会相信拉赫曼的。穆罕默德，我們在你面前老实地說明，并向阿拉宣誓：我們不会把你和你的侮辱，置諸度外，直到我們毀灭你，或者你毀灭我們为止。”

他們中間有一個人說：“我們崇拜天使，而她們是阿拉的女兒。”另一個人說：“我們不相信你，直到你引出阿拉和天使來作証人。”

當他們向穆罕默德說這話時，他站起來；和他同時站起來的，有他的姑母的兒子即阿達拉赫·伊布·阿布·奧瑪亞，向他說：“穆罕默德！你的族人向你建議，而你不接受這個建議。于是，他們要求你提出証據，為要知道你的职位是从阿拉得來的，為要承認你，追隨你，而你也不理。于是，他們請求你自己說明：依據什麼，他們會知道你站在比他們优越的地位以及你从阿拉得來的职位；而你也不理。后来，他們請求你把那个会使他們恐怖的灾难降臨，而你也不理。我向阿拉宣誓：我永远不会相信你，除非你在天空中建造梯子，并沿着这梯子上升，而我將看着你怎样沿着梯子上升；然后，你帶回免証，以及四位天使下凡，來証明你究竟冒充了什么人。我向阿拉宣誓，倘使你不这样做，我不会承認你的。”此后，他就离开穆罕默德而走了。

（譯自格拉青斯基，“中世紀史文獻”卷I，頁261-264。）

## II 占領麥加

穆罕默德命令他的信徒配备起来，并准备为出征所需的一切东西。后来，他告訴他們，要进军麦加，

① 依傳說，科里希特人認為穆罕默德被惡魔所圍繞。

② 古蘭經。



并命令他们认真准备。他祷告：“阿拉！消灭科里希特族的密探，并剥夺他们其他一切消息来源，使我们能突然在他们地方，捉住他们呀！”当时信徒已装备了。

穆罕默德在九月（伊斯兰教历）十日后，即离开麦地那。他斋戒，全体信徒和他一起斋戒，直到他们抵达基提德（在奥萨那与阿马基之间）时为止。

穆罕默德率领一万信徒，向前推进，到达马尔·阿萨赫兰。其中文尼——苏里姆族，有七百人，摩塞那族，有一千人；依据另一消息，前者也有一千人；从所有的部落里，他都获得了若干数目的信徒同行；但穆罕默德西尔族与安萨尔族全体和他一起出发，没有一个人留在家里。穆罕默德虽已驻在马尔·阿萨赫兰，但还没有关于他的任何消息，传到科里希特族去。他们完全不知道他所进行的事情。在这些夜里，阿布·苏斐亚<sup>①</sup>，哈基·伊布·基萨及布达尔·伊布·瓦拉卡出来搜集情报，探听关于穆罕默德的任何消息。当时，阿拔斯也离开了麦加城，在路上碰到穆罕默德。

“当穆罕默德驻在马尔·阿萨赫兰时，我想——阿拔斯这样地叙述着——科里希特族该死了！如果穆罕默德在他们去求宽赦之前，用武力进入麦加，那末，他们随时会复亡的。我乃乘着属于穆罕默德的驢馬，走向阿拉伯克，边走边想：也许会碰到一些往麦加去的樵夫，或挤乳人，或商人，我要他们告诉科里希特族关于穆罕默德的所在地，——使他们在穆罕默德用武力进城之前，来迎接他，并请求安全保护。我向阿拉祷告：我能亲自碰到这些人，使可实现我这次走出的目的。正是在这里，我听到阿布·苏斐亚和布达尔·伊布·瓦拉卡两人间的谈话声。前者说：‘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像今夜所看见的那样多的灯火与那样多的兵士。’布达尔回答说：‘这是被战争激动起来的胡萨部落。’阿布·苏斐亚反对说：‘胡萨部落太微弱，人数也太少，决不会有这样多的灯火与兵士的。’我惊喊起来：‘你该死了，阿布·苏斐亚！这是穆罕默德所统率的军队。科里希特族该死了！但有什么办法呢？如果他抓住了你，那末，你的头颅将要滚蛋了。还是乘上这驢馬，坐在我的后面，我带领你到他那边去，并为你恳求他的宽赦。’他和我同坐上驢馬，而他的同伴却离开了。当我走过穆斯林的前哨燎火时，他们问道：‘那里是谁？’但看见我所乘的穆罕默德的驢馬时，他们就說：‘这是先知的叔叔。’最后，我走到奥玛尔的燎火地方。‘那里是谁？’——他大声喊着，并站起来向我这边走。当看到阿布·苏斐亚乘着大驢馬时，他說：‘这是阿布·苏斐亚——上帝的敌人。赞颂阿拉，把他无条件地孤單地放在我们的手掌之中。’他即走向穆罕默德那边去，但我鞭

策驢馬，要先于奥玛尔赶到。果然，我先到了，从驢馬躍下，走到穆罕默德面前。奥玛尔也来了，并說：

‘先知！这里是阿布·苏斐亚，阿拉把他无条件地放在我们的手掌之中。請准許我們把他的头颅砍去吧！’我說：‘先知！在我的保护之下，我带领他来的。’穆罕默德說：‘你帶他出去，明天早晨再引他来吧。’”

“于是，我帶他走出，并在我家里过了一夜。次晨，我再領他到穆罕默德面前。穆罕默德看見他时，即惊喊道：‘你該死，阿布·苏斐亚！难道你还不知道，除阿拉以外，沒有神嗎？’他回答道：‘我对你敬爱，像对我的父母一样；因为你对你的族人，仁慈、寬大、和善的！我对阿拉立誓，我想，倘使除阿拉以外还有别的神，他们有时也会有用的。’穆罕默德說：‘你該死，阿布·苏斐亚，难道你还不承認我是先知嗎？’他回答道：‘我对你敬爱，完全像对我的父母一样，因为你对你的族人，仁慈、寬大、和善的；但就这一点而論，我有些不同的意見。’阿拔斯說：‘你該死！請即成为穆斯林吧！如果要保全你的头颅，承認除阿拉以外，沒有神，并承認穆罕默德是阿拉的使徒。’于是，他表示悔过，就成为穆斯林了。我告訴穆罕默德說：‘阿布·苏斐亚是个有野心的人，应使他高兴吧！’‘好！——穆罕默德說——誰进入他的家里，一定可得安全，完全像他們留在自己家里或走入神庙里一样。’”

“当阿布·苏斐亚要想离开的时候，穆罕默德向阿拔斯說：‘留他站在山路旁边，使他看看正在移动着的阿拉的軍力。’‘我遵命照办’，阿拔斯叙述說：当时，各部落举起它们的旗帜走过我們面前。有一个部落走过我們旁边时，阿布·苏斐亚問道：‘这些是誰？’当我說出这部落的名字——文尼、苏里姆时，他說：‘苏里姆部落我看有什么了不起呢？’关于摩塞那部落，关于他所詢問的其他一切走过的部落名字，他都說了同样的話。最后，走过了穆罕默德率领的黑軍’。”〔称为“黑軍”因为有很多铁武器。〕

“在队伍里，有穿着铁甲的穆罕默德西尔族与安萨尔族。阿布·苏斐亚問道：‘这些是誰？’我回答說，‘这是先知所率领的穆罕默德西尔族及安萨尔族。’他說，‘我向阿拉立誓，要抵抗这些部队是不可能的：你侄兒的威力，真是偉大。’我反对說：‘他是先知。’‘好吧，再做什么？’他問道。我回答：‘赶快回到你自己家里去吧。’”

他回到家里时，大声叫喊：“噢，你們科里希特人呀！穆罕默德帶了这样的兵力前来，任何抗拒是不

① 阿布·苏斐亚是奥玛尔之弟的科里希特贵族代表。

可能的：誰進入阿希·蘇斐亞的家里，誰就安全。”那時，烏特費的女兒基德，拉着他的鬍子，說道：“殺死那已遭受敵軍先頭部隊痛打的骯髒卑鄙的流氓吧。”阿希·蘇斐亞說，“你們該死！你們不能逃避它。你們無力抵抗它。誰開入阿希·蘇斐亞的家里，誰就安全。”他們說道：“願阿拉使你驚訝吧！為什麼我們需要你的家？”他補充說：“誰關閉了自己的門戶，將和進入廟宇的人同樣地安全。”那時群眾四散，有些人留在自己家里，有些人走入廟宇里。

（同上書，頁264—266。）

### Ⅲ 关于穆罕默德对征服地居民的态度

节录伊布·薩德著的“傳記”。他生于第八世紀，845年死于巴格達。他曾搜集关于穆罕默德及其信徒的遺聞逸事，編成了他們的傳記。

“神使”寫了一封信給巴那·根布部落；它是住在馬克那的猶太人的部落；信中說，正在回到你們村里的你們的使者，曾在我處停留過。這封信達到你們時，你們就可安全。我賜給你們神的保护和神使的保护。

你們不會受到侮辱，也不會受到壓迫，因為神使完全像保护自己一樣地保護你們，因為你們的衣服、你們所有的奴隸、你們的馬匹、你們的武器，除了神使親自或神使的使者留給你們的以外，概屬於神使。另外，你們必須繳付你們的棕櫚收穫的四分之一，你們捕魚所得數量的四分之一，你們的婦女所紡織東西的四分之一；今後，豁免你們繳付一切人頭稅，或者實物稅。如果你們擔任職務或從事勞役，對你們中的有成績者，神使將賞給榮譽；對你們中的不稱職者，也將予以寬恕。

其次，神使對正教徒發給如下的通告：

“任何人應好好地對待馬克那的居民，——這是有好處的；如果有人惡劣地對待他們，他將自己招致禍害。而且，你們的總督，除了從你們中間或者從神使的家族中選拔出來的以外，再沒有別人來擔任。再會！”

（同上書，頁266—267。）

### Ⅳ 安提阿教長站在征服者方面

节录伊夫提赫（876—939年）的著作。他原是埃及的基督教医生，后来成为亚历山大城的教長，著有“通史”。

阿希·穆塔塞姆出发进攻羅馬人〔拜占庭人〕的地方；他隨身帶着安提阿城教長約夫去圍攻昂古拉城。在圍攻的時期，教長約夫用希臘語和羅馬人談話，告訴他們說：“你們還是投降我們的國王吧，付人頭稅

給他，总比殺頭和做俘虜好些。”羅馬人從城頭上責罵他，并用石塊投擲他。後來，穆塔塞姆占領了昂古拉城，并把它燒毀；此後，他移師至阿穆里亞城，在好幾個月里，繼續圍攻該城。安提阿教長約夫每天單獨走近羅馬人的堡壘，用希臘語向羅馬人講話，一面嚇唬他們，一面勸告他們繳付人頭稅，使阿希·穆塔塞姆開拔到別處去。他們責罵他，并用石塊投擲他。這樣地繼續下去，直到阿希·穆塔塞姆占領阿穆里亞城為止（838年八月）。他屠殺了城內很多居民，并俘走了很多婦女和兒童。

（同上書，頁267。）

### Ⅴ 阿拉伯的征服

节录貝拉士里的“征服地志”。該書被認為是關於阿拉伯征服史的一種最好的資料。作者波斯人，出生巴格達，死于892年。

（1）占領大馬士革城和大馬士革領土

據說，穆斯林人在結束對阿希·米爾哲的敵人的戰役之後，休息了十五天。此後，他們轉向大馬士革城，時在公元635年三月十一日。他們占領了阿希一胡都①和那里的教會。大馬士革城內居民進行設防，并關閉城門。哈里德·伊布·阿希·瓦里德統率五千人猛攻巴希·阿希·沙爾基城門②。這一支部隊，是由阿希·烏比達撥給他的。哈里德駐在寺院里，這所寺院就叫哈里德寺院……主教在軍事行動開始的時候，就供應了軍糧給哈里德；他常常站在城頭上；有人替他叫來了哈里德；當哈里德走近的時候，他歡迎他，并和他談話。有一次，主教告訴他說，“噢，阿希·蘇里曼！你的勝利近在目前了。我給你保證；所以請同我締結關於本城的和約吧。”哈里德請他拿出墨水紙張來，寫着如下的一段話：

“最慈悲的，最有慈悲心的上帝其鑒諸！下面就是哈里德·伊布·阿希·瓦里德，給大馬士革居民的約言：在進城以後，他決不侵犯他們的生命、他們的財產、他們的教會以及他們的城垣。他們的住宅沒有一所，將被破壞，將被占據。他代表他的先知和他的代表以及一切信徒在上帝前宣誓保證，履行諾言。如果他們付訖人頭稅的話，對他們〔敘利亞人〕，除動產以外，將秋毫無犯。”

後來，有一次一個和這主教接近的人走到哈里德那邊，通知他說：在這一天夜里，城里居民將舉行節日慶祝，他們將忙得不得了，巴希·阿希·沙爾基城

① 大馬士革郊外的堡壘。

② 就是，大馬士革的東城門。



門將用石塊來堵塞，沒有衛兵防守；并願替他弄到梯子。有些住在他的營盤附近寺院內的人替他運來了兩張梯子。大批穆斯林人就利用這些梯子，先攀登到城頭上，然後下降到城門口，那里只有一兩個人守衛着。穆斯林人用全副力量把城門打開；這是在旭日初升的時候……

## （2）雅爾穆克戰役

據說，伊拉克里會集結大軍二十萬人，其中包括有羅馬人、敘利亞人、阿爾—澤人和阿美尼亞人。他派一個近臣統率它，又派將官杰貝魯·伊布·阿爾·奧哈姆率領它的由混血阿拉伯人<sup>①</sup>組成的先鋒隊，這批阿拉伯人，是住在敘利亞，屬於拉赫姆、裘薩姆及其他部落的。伊拉克里打算進攻穆斯林人；如果能打敗他們，那是最好不過了，如果情況是相反的話，他決意逃入羅馬人的地區，到君士坦丁堡作寓公。穆斯林人也集結起來，慢慢地向羅馬人推進；到了雅爾穆克（雅爾穆克是一條河），他們開始最殘酷又最可怖的戰鬥。這一天穆斯林人約有二萬四千人。羅馬人及他們的徒黨這一天相互用鏈子連在一起，為的使他們不再想到逃亡。上帝歼灭了他們七萬人；他們的敗兵殘卒逃奔，躲避在巴勒斯坦、安提阿、阿勒頗、阿爾及塞爾和阿美尼亞各地。在雅爾穆克的戰役里，穆斯林婦女也參加，奮勇作戰。在戰鬥中，亨德，即烏特布的女兒，穆亞微·伊布·阿布·蘇斐亞的母亲，大聲喊着：“拔出你們腋下的寶劍，來刺死這批不信上帝的傢伙吧！”他的丈夫，阿布·蘇斐亞·伊布·哈爾布在義勇兵的地位，趕到敘利亞來，來迎接她，同時也願意看看他的兩個兒子<sup>②</sup>。

阿布·烏比達指派哈比布·伊布·馬斯拉穆·阿爾·斐克里亞擔任騎兵隊長；後者奮勇追逐敵人，遇敵即殺。據說，伊拉克里聽到關於雅爾穆克戰役以及關於穆斯林人和他的軍隊激戰消息後，即從安提阿逃入君士坦丁堡；當經過邊境峽谷時，他感慨地說，“噢，敘利亞，再會吧，如此錦繡河山歸于我們的敵人手里了！”——意指敘利亞和它的美好的牧場。雅爾穆克戰役發生在公元636年八月十九日至九月七日。

阿布·哈佛斯·阿德曾經轉告我關於薩伊德·伊布·阿布德·阿爾·阿塞薩的下面一段話：有人告訴我：當伊拉克里召集他的兵士進攻穆斯林人的時候，當穆斯林人在雅爾穆克戰役前聽到敵人要來攻的時候，他們把從赫姆斯人征收了的人頭稅發還，并說道：“現在我們沒有時間來幫助你們，來保護你們了；你們可隨便想什麼辦法吧。”赫姆斯人說：“我們喜歡你們的行政，你們的公平；我們不願再遭受那些不公平和凌辱了；我們真的要和你們的長官一起來

扞衛我們的城市，不使伊拉克里軍隊進入。”猶太人也起來說道：“我們，對摩西五經<sup>③</sup>發誓：伊拉克里的行政官，除非在我們被打敗，被弄得精疲力竭的情況下，決不得入城。”他們把城門鎖上，從自己中間招集守衛兵。基督徒和猶太人，以及所有同穆斯林人簽訂過和約的城市居民同樣地行動起來。他們說：“如果羅馬人和他們的徒黨占着穆斯林人的上風，我們將倒退到先前的地位；在相反的情況下，我們還是處於目前的狀態中，即使有很多的穆斯林人。”當上帝驅逐了不信神者并贊賞穆斯林人的時候，他們（城市居民）開放城門，叫來音樂隊，奏演羯鼓，尽情娛樂，并繳付了人頭稅。

## （3）哈里發奧瑪爾在敘利亞

赫沙姆·伊布·阿馬爾告訴我……奧瑪爾·伊布·阿爾—哈塔布來到阿爾·泉比亞，要想把這塊土地<sup>④</sup>分給穆斯林人，因為那是用戰鬥得來的。於是，穆阿士·伊布·杰貝爾向他進言說：“神呀！如果您分配這塊土地，對我們來說，那是不需要的事情；因為將有很多土地落在这批人的手里。後來，他們死去，這塊土地還是留在個人手里。後來，在他們之後，又有一批扞衛伊斯蘭教的勇士出現，而他們將一无所得了。請仔細考慮決定，要使決定能兼顧到前一批和後一批人的利益。”奧瑪爾對穆阿士的意見，表示同意。有一個波斯爾的統治者向奧瑪爾申說，似乎他是在提供谷物、橄欖油和醋這一項條件下向穆斯林人投降的，因而請求奧瑪爾給他寫一張載明這点的文書；於是阿布·烏比達拆穿了他的撒謊，并証明說：“我們和他簽訂和約的條件，是收取某些東西，而這些東西穆斯林人可以攜帶到冬營里去的。”<sup>⑤</sup>於是，奧瑪爾按照波斯爾人的不同等級，課以人頭稅，并按照他們的土地，征收了田賦。

奧瑪爾對人頭稅的管理員發出命令，規定：征收人頭稅只應從成年男人起。又規定人頭稅應從那些領有約合四個地那（貨幣名——譯者）黃金的財產的人們起征；還確定：在敘利亞和在阿爾·杰塞爾所征收的人頭稅，作為穆斯林人的食糧經費，應按照每人繳納二摩提的小麥，以及三庫斯特的橄欖油的标准征收。此外，他命令納稅人對那些停留在他們地方上的穆斯林人，應供應三天的住宿。

（同上書，頁266—270。）

① 這些部落住在阿拉伯人中間，說阿拉伯語言，摹仿阿拉伯人的外表。

② 就是，雅塞達和穆亞微。

③ “舊約聖經”的開首五卷。——譯者

④ 就是，敘利亞的領土。

⑤ 就是，現款。

# 教 学 问 题

## 加强历史教学的思想性与战斗性

刘 輝

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所做“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扼要而明确地指出：

“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为了深入贯彻主席所指示的这一方针，将中学教育推向一个新的阶段，有必要进一步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劳动教育与文化科学知识教育，使这几种教育紧密地结合起来，并以政治思想教育为核心，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的教育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政治教育为自己的灵魂，离开了它，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性质的教育了。

加强政治思想教育需要采取多方面的措施，如按中央教育部所指示的普遍增设社会主义教育课程、定期组织学生参加劳动实践等等。除此之外，最主要的途径之一，就是加强各科教学的思想性与政治性，尤其是阶级性与党性很强的历史学科，在这方面负有特别重要的任务。

近几年来，我们历史教师和其他学科的教师一样，在教学改革上作了很大的努力，所以不论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方面，都有显著的提高和改进。但是，如果严格按照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身体健康的劳动者这一方针对历史课的要求来检查，那么历史教学现有的改进还是很不够的。根据个人肤浅的了解，这种不够主要表现在目前的历史课教学中，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单纯传授历史知识、忽视政治思想教育的倾向。这种倾向之所以存在和产生，从我们历史教师这方面来看，首先是由于我们对政治思想教育是学校全盘教育工作的核心认识不足，对历史课贯彻政治思想教育的必要性及有利条件认识不够；其次是由于我们对在历史课中如何贯彻思想教育也还缺乏经验。

对于加强政治思想教育的必要性，在我们教师中

间还存在着一些不正确的看法，例如，有些教师认为中学生年龄很小，思想也很单纯，他们基本上都是在新社会里成长起来的，没有受到什么旧的影响，何必特别强调政治思想教育呢？只有学点业务才是“真玩艺”，“真本事”。这种看法就是促使我们走向堆积史料忽视政治思想教育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不正确的和有害的。

首先，从当前的阶级斗争形势来看，我们目前正处在社会主义大革命时代，我们国家虽然已经在经济战线上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但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特别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当前广泛深入的反右派斗争，就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关系社会主义事业和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斗争，是关系国家前途向什么方向发展的斗争，是关系每一个人切身利益的斗争。我们的青年学生就是生活在这种阶级斗争之中，而不是生活在阶级斗争之外，并且他们当中很多人又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不可能设想，社会生活中的阶级斗争，不在青年学生身上有所影响和反应；也不可能设想，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之间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展开了激烈斗争的时候，学生的政治思想不受到任何影响。有的教师只看到中学生年龄小，政治上思想上较比单纯，容易接受正确的教育这一方面，而没有看到正是由于他们年龄小，政治上尚不成熟，缺乏政治锻炼和政治生活经验，因而也就容易是非不明，容易受到坏的影响。看不到问题的这一方面，做出错误的估计，因而放松政治思想教育，这是十分有害的。至于说中学生基本上都是在新社会中成长起来，这确是事实；但我们也不能因此就断定他们不会受到什么旧的影响，就可以放松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社会意识的改变往往是落后于



社会存在的，旧的社会制度虽然被推翻了，但是旧势力、旧习惯、旧传统、旧观点是不可能一下子扫清的，因此，虽然青年学生基本上是在新社会中成长起来的，也难于避免要受到旧的影响。党一再指示我们，在民主革命胜利以后，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这是整个过渡时期内的主要矛盾。两条道路的斗争包括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无产阶级立场和资产阶级立场的斗争在内，在这种斗争面前，青年学生的思想不会是真空，无产阶级思想不去占领，资产阶级思想必去占领；何况我们在这样的大革命时代里办学校，也决不应该使学校教育脱离社会生活，脱离政治，脱离当前的阶级斗争，这就是我们历史教师为什么要把政治思想教育看作是学校全盘教育工作的核心与灵魂的基本原因。

其次，从学生当前的实际思想状况来看，他们几年来在党、团组织和我们教师的教育下，思想觉悟确实有很大提高，他们绝大多数热爱党，热爱新社会，这是基本的一面。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中间不少人还存在着一定的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在这次右派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时候，有些学生认识不清，立场动摇，特别是有些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学生，对我国的基本制度和政策（如农业合作化、统购统销、对资本主义的改造等），还存在着不少的模糊认识，个别的还有抵触情绪；图安逸、怕艰苦、追求享受、轻视劳动特别是轻视体力劳动的剥削阶级思想影响，尽管程度有所不同，但是相当普遍；计较个人名利和个人得失、忽视集体利益的个人主义思想，强调民主、忽视集中、只要自由、忽视纪律的无政府主义和绝对平均主义等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也还在不少学生中间存在；埋头文化业务、不问政治的倾向，也相当普遍。从学生的实际思想状况来看，强调进一步加强政治思想教育也是非常必要的。

从当前的阶级斗争形势、学生的实际思想状况以及党和政府对我們学校教育的要求联系在一起看，我们就会深深体会到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的指示是多么正确，多么必要，那种认为只有文化业务才是“真本事”的忽视政治思想教育的倾向，是多么急需迅速地扭转与克服。

也有的历史教师认为，当前学校中的政治思想教育虽然很重要，但这个任务主要应由党、团组织和政治课教师来负担。他们所持的理由是，历史课并非政治课，它有其独具的特点，如果说应该担当政治思想教育任务的话，也只能理解为讲清了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就是正确进行了思想教育，否则就是违反了历

史教学的特点，就是又犯了“外加政治尾巴”的毛病。在这种看法的影响下，使得历史课中的思想教育狭窄而不全面，零星而不系统，就事论事而忽略了联系现实社会生活与阶级斗争实际。显然，对历史课中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这种看法和做法是不正确的。

根据我个人的肤浅了解，政治思想教育的内容至少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培养学生无产阶级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共产主义的革命人生观，无产阶级立场和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培养学生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特别是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自觉遵守纪律的品德；培养他们的社会主义劳动观点与习惯，热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并立志作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如果在历史课思想教育中忽略和排除了以上的大部内容，而只抓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教育，岂不是狭窄而不全面吗？况且，如果忽略了历史规律知识所包含的广泛的政治思想内容，又怎能正确地讲清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呢？历史课中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从已有的先进经验看来，应以立场教育和阶级斗争观点的教育，作为理解教材精神实质和进行思想教育的基本线索，离开了这个基本线索而只在教材中的个别词句上顺便联系几句思想教育，岂不是零星而不系统吗？理论联系实际是我们进行思想教育的基本方针，让学生学习历史科学也不是为学历史而学历史，而是为了改变历史、即是为了革命而学习历史。忽略了这个基本方针和基本目的，不根据教材中心内容恰当地联系社会现实，岂不是就限于就事论事而削弱了战斗性吗？总之，因强调历史科的特点而将知识教育作为主导的，将思想教育作为附带的，是不正确的，这不仅与教育方针不合，而且也违反了教养教育的统一性。诚然，各科教学都有各自的特点，抹煞这一点是错误的，但各科教学任务也有共同之点，这就是任何一科都负有政治思想教育任务，特别是历史学科是一门阶级性与党性很强的学科，通过历史课进行思想教育，有着更丰富的内容，更有利的条件，如果强调历史学科的特点的话，那么这就是最突出的特点之一。

通过以上粗浅的分析，可以看出，加强历史教学的思想性与战斗性，首先要求我们历史教师从思想上重视起来，扭转不正确和不全面的认识，克服忽视政治思想教育的倾向。

加强历史教学的思想性与战斗性，除了解决认识问题而外，另一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要通过我们的教学实践，创造与总结贯彻政治思想教育的经验，以便通过互相交流，逐步摸索出较完整的贯彻政治思想教育的原则、途径与做法。现仅就个人的认识，提出

几点不成熟的意見，作为抛磚引玉。

历史課中貫徹政治思想教育需要注意的問題很多，但最基本的原則还是理論联系实际。中央教育部董純才副部長在“人民教育”1954年八月号所載“为培养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成員而努力”一文中曾指出：“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方法，主要通过課內各科教学和課外各种活动来进行。第一、要結合现实生活进行教育。过去我們曾結合革命斗争，結合各种社会改革运动，抗美援朝运动等对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这种教育，深入人心，收效很大。今后应吸取这种經驗，結合社会主义的建設和社会主义的改造事業来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反对脫离现实生活的教育，反对閉門讀書的偏向。第二、要結合学生生活和思想实际并根据青年特点，来有的放矢地进行教育，那种不顧学生思想实际的空洞說教的方法是会失败的。”这个理論联系实际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总原則，同样适用于历史教学。在历史教学中貫徹这一原則，最主要的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反对材料堆积，同时防止專搞抽象的理論概念，使理論与实际正确地結合起来。为什么要反对材料堆积？因为只客观主义地罗列历史現象，堆积历史材料，而不以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場观点去加以分析說明，就会使学生脑子里充滿五花八門的材料，却不明是非，不知解决什么问题，这样就不可能加强教学的思想性与战斗性。反之，如果不以具体的历史事实做基础，只是空談政治思想理論，必然弄成抽象的公式，会使活生生的历史变成抽象干巴的骨头，形成空洞的說教。正确的办法就是在講授历史事实的同时，予以馬克思主义的解釋与分析，即理論与实际紧密联系。（二）講授历史恰当地联系社会现实。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在于使学生更深刻地理解历史事实本身，更好地認識历史发展規律；另一方面可以使历史教学为当前的政治斗争和生产建設服务，讓学生受到更为深刻有力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所謂联系社会现实，主要的是指联系社会现实生活，即当前的政治斗争与生产建設实际以及学生的思想認識实际。联系时要从教材的中心內容出发，从教材的內在教育因素出发，不宜脫离教材另起炉灶或随兴之所至泛泛联系。联系的方法可以采取对比法，將不同性質的事件，孰优孰劣，鮮明地摆在学生面前，对学生的教育意义很大。例如，講到资产阶級革命时，就可以联系我国的現时革命，并比較說明两种革命不同的實質；講到資本主义的工業革命时，就可以联系我国的社会主义工業化，并比較出二者在发展工業的目的与对工人农民的利益上，有着本質的区别。此外，同类性質的事件，也可以联系，如講近代史时，把蔣

介石比做袁世凱是很合适的，因为他們反人民的本質相同，卖国的罪行相似。

在历史教学中貫徹政治思想教育的内容重点在前面簡單談了一下，至于如何抓住这些重点进行教育，限于个人水平，沒有可能全面发表意見，現只就历史課中如何突出共产主义世界觀的教育、階級斗争观点的教育和劳动教育提点意見。

第一，通过历史教学培养学生的共产主义世界觀。共产主义世界觀对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來說，有如望远镜之于天文学家、显微镜之于实验室的研究員那样，是極为重要和絕不可少的。完成这一任务的基本途徑，就是要以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的历史唯物观点深刻地揭示社会发展規律，使学生清楚地了解各个社会阶段是如何按照其客观規律发展变化的，現代人类社会是从哪里来，怎样来的，要往哪里去，怎样去；使学生認識我們所处的时代是条条道路通向共产主义的时代，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資本主义必然灭亡，从而培养他們的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拥护建設社会主义的各项根本政策，拥护党的領導，拥护无产阶级專政。要做到这一点，我們必須严格地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解釋具体的历史事件，肃清资产阶級唯心主义学說的各种影响。比如我們講資本主义国家的經濟危机时，除了講明經濟危机的事实与現象以外，还必须深刻地揭示其发生經濟危机的根源是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資料的資本家个人占有之間的矛盾，指出这种危机的永远不能克服，要消灭危机就必须消灭資本主义。这个例子說明，我們講解历史，不能客观主义地罗列史料和現象，史料的运用，只須選擇最典型的能說明問題就够了，更重要的是給以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釋与分析。又如有的教师講中国史上“唐初經濟发展”时，沒有明确指出推动唐朝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农民大起义的力量，反而过分夸大唐太宗的才能，強調他个人的作用，这样就使学生无从了解階級斗争对階級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无从了解社会历史的发展規律，不可能通过历史教学逐步培养学生的共产主义世界觀。这个例子說明资产阶級反动社会学者的謬論和历史唯心主义对我们的影响，必須徹底肃清。

第二，进行階級斗争观点的教育与无产阶级立場的教育。我們向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立場問題是最根本的問題。政治立場問題不解决，一切革命道理就不易接受，或者只是口头接受而感情上还是格格不入，所以階級斗争观点教育和立場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从哪些方面去探討着进行这一教育呢？（一）以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階級分析方法去講解政治、經濟



和文化的历史。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全部生活的中心，一切历史现象都围绕它而活动，把握住阶级斗争这个理解历史的基本线索，才能正确地阐明阶级斗争对阶级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我们知道，从旧的生产关系转变到新的生产关系，通常是需要通过革命来进行的，因此我们讲到历史上各种性质的革命时，就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分析革命的根源，阐明阶级与阶级斗争的实质。比如我们讲汉初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就应着重去分析农民起义对生产恢复与发展的决定性的影响，而不能统统归功于汉朝统治阶级对农民的让步政策。（二）讲授历史时要敌我分明，爱憎分明，克服客观主义态度，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历史既然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因此，讲解教材时，必然要讲被统治阶级的事情，同时也讲统治阶级的事情，对于这两个敌对阶级的事情，教师要有充沛的爱与憎、喜与怒的情感，要把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大众以及为人民谋福利的人都看作是自己的人，对那些剥削人民与背叛人民的人，看作是自己的敌人。敌我分明、爱憎分明的讲授情感，能强烈地教育和感染学生，培养他们的无产阶级立场。

第三，进行劳动教育。进行热爱劳动与热爱劳动人民的教育，是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突出重点之一，也是历史教学中所可能进行的。对于历史课中如何进行劳动教育，我个人觉得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探讨：（一）要把握人民群众是历史主人的历史观点。人类社会的基础是生产，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首先是从生产开始，才引起社会制度、政治法律、文学艺术、思想理论的改变。所以说人类历史又是生产者本身的历史。劳动人民才是社会的主体，历史的正统。劳动创造了世界，创造了物质财富，创造了人类本身。本着这一思路去钻研，可以找到结合劳动教育的历史事实是很多的，如中国和世界古代史，就有人类从辛勤劳动中，改造了生产工具，改进了生产技术，发展了生产力，推进了社会等等很多史实。不仅如此，讲到历史上每一时代的生产力得到发展时，都应当通过

具体史实，指出发展生产的主要力量是广大人民辛勤劳动的结果。（二）抓住历史上许多次的劳动人民的革命，阐明它是如何地影响和推动了社会的进展。

（三）人民不但是创造物质财富的力量，同时也是创造精神财富的无穷的源泉。在讲到历史上某些科学家、文学家、哲学家的成就时，要指出这是从劳动人民的实践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四）以对比的方法，说明劳动人民的真诚、忠实与热心爱国的品质；同时也根据史实指出剥削阶级怎样残忍地剥削劳动人民，过着腐化堕落的生活，怎样当国家民族处于危亡之际，他们就作出媚敌卖国的勾当，揭发他们的卑鄙可耻的行为与生活，使学生划清劳动与剥削的界限，热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并立志做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

以上几种教育，是互相紧密结合而不是各自孤立的。因为培养学生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主要是通过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解释具体的历史事件来实现；而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中，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的历史观点、阶级斗争的历史观点和革命的历史观点都是主要的方面，这样就使得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教育、劳动教育和阶级斗争观点与无产阶级立场的教育结合在一起。此外，爱国主义教育，国际主义教育等等，本文虽未详细讨论，但也非常重要，决不可忽略。

为了加强历史教学的思想性与战斗性，我们必须经常地阅读报纸杂志，经常地了解学生思想状况，以便能在讲课中联系实际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此外，对我们尤其重要的一点是必须掌握正确的立场、观点与方法，这就是无产阶级立场、唯物主义的观点和辩证的方法。这一点对我们所以特别重要，就是因为这是理解历史的基本武器。我们过去所学的历史，所阅读的史书，其中往往充满着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反动的历史观点，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也迫切需要用科学的历史观点去破除旧的观点，因此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思想水平，学会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去观察与解释历史。

# 在历史課中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初步体会

山东鄆城一中 馮伯端

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的报告中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針，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对这个方針，我們虽然学习了，但对其最本質的东西認識还是十分不足，体会也不深。后来学习了“人民教育”1957年九月号的兩篇社論和省教育厅有关向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指示，才对方針和貫徹方針的途徑有了較明确的認識，知道“‘我国普通教育的目的，主要的是培养忠实于社会主义事業的、有相当文化水平的、身体健康的体力劳动者，其次才是为培养專門人材打好普通知識的基础。’（見薄一波付总理“关于1956年度国民經济計劃的执行結果和1957年度国民經济計劃草案的报告”）……要从各科教学上貫徹新的教育方針，首先要在教学中貫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觀點方法”；“学校教育不能脫离社会生活、脫离政治、脫离当前的階級斗争。……我們必須向中等学校学生大力地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目前必須向学生进行反右派斗争的思想教育。……同时学校还要向学生进行劳动教育、集体主义教育、紀律教育”（“人民教育”1957年九月号社論）。历史課是一門階級性和党性很强的課程，在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中担负着非常重要的任务。半年来，我根据自己的这一些粗淺的認識，曾在历史教学工作中試做了一些努力。現在就把我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初步体会和一些具体作法略述于下。

## 一 进行反右派斗争的思想教育

“人民教育”的社論說得很对，“我国目前正处在社会主义大革命时代。……中等学校的学生是在这样的大革命时代里生活的青年人。我們是在这样的大革命时代里办学校的。……不可能設想，当革命形式发生了重大变化，资产階級右派和人民之間在政治战綫上和思想战綫上展开了激烈斗争的时候，学生的政治思想不会受到任何波动，资产階級右派分子的思想不会給学生任何影响”（1957年九月号社論之二，“必須向中等学校学生大力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我校学生思想的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当资

产階級右派分子从各方面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論的时候，学生的思想是相当混乱的，有些学生不能分清大是大非，站稳无产階級的革命立場，个别学生甚至对右派分子的言論表示同情和支持。在1957年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反击右派的社論发表以后，有一个学生竟公然說出“葛佩琦发言发的不是地方嘍”的怪話。这种情况說明向学生进行反右派斗争的思想教育是刻不容緩的。我在高中中国历史第一冊的教学中，曾結合教材和学生思想情况对右派言論做了一些反击，举例如下：

（1）講“战国时期的社会变化和商鞅变法”一課时，在講完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的目和新法的主要内容之后，为了把教材所提“商鞅变法，遭遇秦貴族的激烈反抗。秦孝公处罚了这些貴族，这样，新法才得順利推行”这一点突出，联系实际向学生进行教育，我組織了一些思考問題来提問学生。我問：“秦国貴族为什么激烈反对商鞅变法？”答：“对他們不利。”“哪些地方对他們不利？”待学生思考片刻，就叫一个程度較好的学生回答。这个学生就根据剛講过的变法內容回答了这一問題。又問：“秦孝公为什么要处罚那些貴族？甚至太子犯了法，也要处罚他的老师？为什么說这样做在当时是必要的和正确的？”答：“因为貴族反对变法，不处罚，新法就不能实行。”限于水平，学生只能这样膚淺地回答。学生回答后，我就結合实际作了进一步的闡述和总结。

我說道：“从变法的内容可以清楚地看出，变法使貴族的經濟基础垮台了（地主階級的土地所有制代替了奴隶主貴族世襲的土地所有制），政治特权也廢除了。貴族們为了保持他們的經濟利益和政治特权，就必然要坚决维护旧制度和坚决反对新法。秦孝公頗有魄力地处罚了反对变法的貴族，在当时来講，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和正确的。因为这是当时新旧兩种势力生死存亡的斗争，是关系着秦国富强和衰弱的斗争；对旧势力的任何讓步，就是新势力的削弱，甚或就是灭亡。今天我們和资产階級右派分子进行斗争，也是新旧兩种势力生死存亡的斗争，是一场非常激烈和复杂的階級斗争。它关系着国家的发展前途，关系着每一个人的命运。我們对资产階級右派分子就必须



給予堅決的和無情的反擊，保衛社會主義事業。”接着又說：“新事物的產生和發展不會是一帆風順的，必然會遇到舊勢力的阻撓，往往需要經過一個複雜曲折的鬥爭過程。但新事物一旦成長起來，就會成為不可遏止的力量。商鞅變法就是如此，商鞅變法勝利了，封建經濟發展了，秦國日益富強了，建立空前統一的大帝國的基础奠定了。我們的社會主義革命也是如此，只有在這場嚴重的激烈的政治戰綫上和思想戰綫上的社會主義大革命勝利以後，我們在經濟戰綫上已經取得的社會主義革命勝利成果才會更加鞏固，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才會更加迅速地發展。”

(2) 講“戰國的文化”中“諸子”一節課時，為了說明戰國時期學術思想上“百家爭鳴”的社會歷史背景，首先從鐵工具的出現、生產力的提高、生產關係的改變和政治上的一些變化等方面來說明戰國時期我國歷史正是處在一個社會發生巨大變革的時期，這樣一個社會經濟、政治的急劇變革反映在思想上就產生了各家學說。“許多人從自身的利益出發，企圖阻止或推動這種變化，就展開了思想上的鬥爭。這樣，戰國時期就出現了學術思想上‘百家爭鳴’的局面。”

(高中中國歷史第一冊，第62頁)並指出“百家爭鳴”就是戰國時期學術思想上最突出的特點。

為了向學生進行政策教育，避免學生把今天黨對學術思想的“百家爭鳴”方針和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混淆起來，就需要特別強調指出兩者的根本區別。第一，戰國時期的社會是動亂的，學術方面的“百家爭鳴”是自發的，沒有有意識的統一領導。今天是社會主義革命已經取得決定性勝利，人民政權空前鞏固，黨為了促進學術的發展和科學的進步，促進社會主義文化繁榮，更好地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而自覺地提出了“百家爭鳴”的方針。第二，我們所提倡的“百家爭鳴”是人民內部的一種自由權利。在人民內部，有獨立思考的自由，有辯論的自由，有創作和批評的自由，有發表自己的意見、堅持自己的意見和保留自己的意見的自由。但這種權利只屬於人民，對反革命分子和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等一切反動派，則絕不能給予這種自由。右派分子乘黨整風的機會，利用這個口號向黨和社會主義發動進攻是絕不能容許的。對他們必須進行堅決的鬥爭和無情的打擊。我們在政治上要嚴格地劃清敵我界限。

(3) 挑撥我國的民族關係，是右派分子向黨向社會主義進攻的一個重要方面，我們必須結合具體教材在教學中給予有力的反駁，向學生進行民族團結的政策教育。我在講“東漢時期的邊境各族”一課中的西南邊境的瑤人、滇人、哀牢人和冉駝人時，除介紹

他們的一般情況，指出他們具有悠久的歷史和文化以及他們與漢族人民的友好關係外，對居住在湖南西部和貴州一帶的瑤人的現在生活情況作了一些聯繫。先根據教材說明兩漢統治者怎樣壓迫和剝削他們，以及他們怎樣反抗，然後就指出解放以來貴州各兄弟民族的經濟文化生活已經空前提高了，並引証了“人民日報”的材料，“現在貴州少數民族地區文教事業欣欣向榮，廣播站、收音站已經普遍建立，並且縣縣有中學，鄉鄉有小學。貴州省各少數民族地區，隨着經濟的發展，學校年年有增加。現在全省已經有民族師範，民族中學和小學792所，比1953年增加239所，少數民族中、小學生已經有三十四萬多人，比1950年增加了十五倍”來加以說明。最後指出這些成果都是和黨的領導和黨的正確的民族政策分不開的，只有在社會主義民族大家庭中，各族人民才有可能過着如此幸福的生活。在講到住在瀾滄江流域的哀牢人時，正好“人民日報”報道了關於“慶祝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成立”的消息，我就結合教材向學生作了如下的介紹：為了慶祝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成立，滇南邊疆哀牢山下五萬各族人民集會。自治州首府蒙自街頭巷尾到處張燈結彩，人群熙攘。五萬各族人民從四面八方湧到舉行大會的廣場。有這麼多人集會，在蒙自歷史上還是第一次。大會上各族人民把精心製作的著名建水陶器，象徵幸福的孔雀等許多自治州境內特產獻給毛主席和國務院，表達紅河邊疆一百四十多萬各族人民熱愛祖國熱愛毛主席的心意（見“人民日報”）。這時，我又引導學生回憶一下我國民族政策的兩個基本原則（初中政治課里學過），最後就強調指出這是黨的民族政策的又一重大勝利；喪心病狂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却故意挑撥我國各民族的親密關係，這是我們必須堅決反對和高度警惕的。

## 二 進行合作化優越性的教育

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反動言論，以及農村中少數壞分子和富裕農民的落後言論對青年很有影響，特別是對出身地主富農家庭和富裕中農家庭的学生影響更大。他們在遇到農村工作中某些暫存的缺點時，往往就歸之于合作化“不好”，隨聲附和那些錯誤言論。如有的學生說：“單干走社會主義道路不行嗎？”“不合作化能吃這樣的饅（小米饅）嗎？”這說明一部分學生對走合作化道路及其制度的優越性，不論是在理論上或在思想上都還沒有接受下來。這也就向教師提出了一個迫切的任務，我們不但需要講清合作化優越性的根本道理，更重要的是要通過具體生動的历史科學知識，結合現實材料，特別是當地的具體事

例向学生进行有力的正面说服教育。试举两例如下：

(1) 讲“西汉前期的经济”时，首先强调指出，由于秦末农民大起义狠狠地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西汉初期的统治者认识了农民的伟大力量，就接受教训，为巩固新建立的政权和发展经济，而被迫地对农民实行了让步政策。在让步政策下，经过劳动人民几十年的辛勤劳动，到汉武帝初年，国家就出现了繁荣富裕的景象。然后就把课本上引用的“汉书食货志”上的一段材料“都鄙廩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念给学生听。当我把农民虽然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他们的生活却从勉强能够维持降到贫困破产的事实加以具体描述后，就向学生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西汉前期剥削较轻，农村经济向前发展的情况下，小农户仍不免贫困破产的这一事实说明了什么？”有些学生能回答出这是地主阶级剥削的结果，但还不够深入。此时我就作了如下的简短结论：这个事实充分说明了使用简单工具的、土地很少的单个农户，能生产出来的东西不多，统治阶级又多方面地剥削他们，再加上其他意外事故，农民的贫困破产是必然的。许多铁的事实，特别是今天讲的事实，都有力地告诉我们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剥削阶级的统治，消灭了一切剥削阶级以后，把农民组织起来，实行农业合作化，走社会主义道路，使用先进的农具进行生产，才有可能使农民永远摆脱贫困，走上大家共同富裕的道路。河北省遵化县能平均亩产达四百斤，提前十年实现农业发展纲要规定，全部农业社都赶上了当地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见1957年十一月一日“人民日报”），就是合作化好得很的有力证明。

(2) 讲战国水利工程时，结合了党和政府关于今冬明春大规模开展兴修农田水利的指示。特别在讲秦帝国统一国家出现的重大历史意义时，曾联系了本县已经兴修和利用起来的小型水利工程——虹吸管。

我县夏季大雨之后，紧接着就是三四个月的旱灾，很多地方麦子不能下种。为此，我县群众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曾经充分利用了仅有的虹吸管。为了开辟新的支渠，我校师生曾参加过挖渠的义务劳动。挖渠以后，距离约四十里路的黄河水就汨汨地灌满了学校小南门外面的城壕。在那样的大旱天里，当学生争先恐后地看到有自己一分劳动的沟渠里灌满了水的时候，他们是多么高兴啊！有的说：“真了不起，过去连做梦也没想到！”“群众的力量真大呀！”也有的说：“这里面还有咱的一分劳动哩！”

讲到统一国家对管理水利事业的好处时，就充分

利用了这一点。特别在初中一年级的课里，我先问学生几个问题：“小南门外的水是从哪里来的？”（黄河里）“黄河离这里有多远？”（有的说三四十里，有的说四五十里）“引水干什么？”（种麦子）“过去为什么没有水渠？”（国民党不为人民打算）“合作化以前有吗？”（没有）接着我说：“这倒奇怪，过去国民党不为人民打算，没有挖，为什么合作化以前也没有挖呢？”学生思索片刻说：“农民的地不叫挖。”我就紧紧抓住这一点指出：同学们说得很对，假使不合作化，挖谁“一指”地也是不行的，不组织起来，少数人也没有这种力量。现在完全不同了，那天你们不是亲眼看到吗，农民的地不但叫挖，而且都干得那样起劲，就是妇女也不例外。有了水还怕麦子种不上？谁说合作化不好？这仅仅是一方面，合作化的好处还多着呢。

### 三 进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

“人民教育”在其“认真学习，大力贯彻毛主席提出的教育方针”的社论中指出：“过去在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封建地主阶级就是通过各种教育形式，把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讲得家喻户晓，并且把天命等神秘的抽象的观念，都活灵活现地印刻在人们心里。为什么我们不能通过具体事例，把可以耳闻目见的实实在在的辩证唯物、历史唯物、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基本道理，给中学生教懂呢！”不错，只要我们有耐心、有毅力、能反复讲解的话，这些基本道理是完全能够通过具体事例把学生教懂的。历史课在进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方面是担负着极其重要的任务的。当然历史唯物主义教育包括的内容是相当广泛的，我在讲课中曾在下面几个事例中作了些尝试。

(1) 讲“西汉的建立”时，是要通过刘邦和项羽的斗争来讲述的，这个问题在整堂课中比较起来，虽然不是那么重要，但在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方面却有相当重要作用，因此也没放松这个有利的机会。

这段教材是用对比的方法叙述的，如叙述了刘邦、项羽力量的消长，他们为了争夺帝位所采用的一些措施，他们能否得到人民的拥护等（见高中中国历史第一册第80页）。讲述时，我根据教材的系统，把这段教材略加具体化和故事化。当讲到，“……最后该下一战，项羽的军队全部溃散了。项羽在乌江自杀。……”一段时，我曾这样作了一点补充说明：项羽被围垓下时，在别处姬歌里说：“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姬虞姬奈若何！”最后突围逃到乌江自杀前又说：“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紧接着就问学生：“项羽把自己



的战败和灭亡归结到‘天’和‘时运’，你们认为对吗？他失败、灭亡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学生根据所讲的史实齐声回答是“失掉了人民的拥护，违反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此时我就指出学生回答得很对，并作出以下结论：虽然项羽认为他的失败是由“时运”和“天命”，但是实际上是因为他违反了当时的社会趋势和人民的愿望。一个人违反了社会趋势和人民的愿望，即使有“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本领，也不能不为历史前进的车轮所碾毙。过去是如此，今天同样是如此，若脱离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不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不但必将一事无成，而且前途也是不堪设想的。

(2) 讲“两汉的文化”一章中“唯物论者王充”时，先在引导学生回忆汉武帝“独尊儒术”的基础上，简单说明董仲舒关于“天有意志”和“天人合一”的学说以及他的学说怎样被统治阶级采用等（这部分教材属精简的范围，但有必要简单提一下）。然后就通过具体史料着重阐述王充的进步思想，特别指出王充能根据客观事物的真实情况和当时自然科学研究的成果，唯物地解释各种自然现象，揭穿统治阶级“天人合一”的欺骗性，剥下统治阶级“受天之命”的神权外衣，具有政治斗争的现实意义。同时他又警告统治阶级不要再用迷信欺骗人民，而要正视人民的饥寒问题。因此他的思想是唯物主义的，是进步的，是带有鲜明的人民性的。他的哲学思想就是人民的思想。而董仲舒的哲学思想则是唯心主义的。他的哲学思想就是统治阶级的思想。统治阶级所以要把董仲舒的哲学思想和道德说教当作政治措施的指导原则，王充表达自己思想的名著“论衡”所以被统治阶级长期秘藏而不让传播，这是不难理解的。接着就提出以下问题让学生思考：“到底什么是唯物主义的方法和唯心主义的方法？思想有无阶级性？”为了进一步向学生进行唯物主义教育，我结合着实际从三方面作了分析：第一，根据自然和社会的客观规律来分析、解释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的方法，是唯物主义的方法；相反的，不是根据自然界和社会发展的规律，而是用主观想像来解释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方法，就是唯心主义的方法。第二，思想是有阶级性的，思想斗争就是阶级斗争的反映。目前的很多事实都说明了这一问题。例如我们要建成社会主义，就必须要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有着旧思想的人假使不认真改造思想，是很难过这个社会主义关的。不能过这一关，那是很危险的。第三，在阶级社会里，统治的思想是剥削阶级的思想，统治阶级害怕自己欺骗人民的思想被揭穿，就竭力阻止唯物思想的

传播。正如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中所指出的“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人民民主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在各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广大群众中唤起了越来越深刻的同情。社会主义思想正在掌握着越来越多的成千成万的人们的意识。在这种情况下，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竭力从思想上腐蚀群众，歪曲社会主义和诬蔑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群众中制造迷惑和混乱”。他们所以这样作，就是想阻止共产主义思想在群众中传播，因此我们必须大力揭穿这种造谣诬蔑，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分子进行坚决斗争。尽管他们千方百计地造谣诬蔑，但共产主义运动已经成长壮大了，马克思主义已经深入人心了，未来的世界是肯定属于社会主义的了。

#### 四 进行劳动教育

毛主席提出的教育方针“既合乎我们远大理想，又切合当前实际需要。我们现在需要大批的大、中、小学毕业生参加生产，只有大、中、小学毕业生在生产上贡献出力量，才能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而我们远大的理想，是：没有阶级，不分富贵贫贱，大家都在共产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努力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大家都成为有共产主义品德的、有高度文化的劳动者。今后的世界只能是劳动人民的世界。因而今后的教育方针只能是培养新的劳动人民”（“人民教育”1957年九月号社论）。但是目前学生的思想情况与教育方针的要求是有距离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的剥削阶级思想，对他们还是有影响的，因而轻视体力劳动，轻视工农劳动人民，毕业后不愿意参加农业生产等不健康现象还是相当普遍的。认不清自己的广阔前途，单纯升学的观点还是比较严重的。有个学生在“丁玲刘绍棠是怎样变成右派分子的”主题班会上这样说：“我整天埋头读书，赶作业，连报纸都很少看，忽视政治，单纯学习，其目的是只想考大学，当专家；而且要选择最容易和离名利最近的去干，至于毕业后回乡生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问题，根本没想过，同时也是不敢想的。”不针对这种思想进行教育，不改造这种思想，又怎能达到教育目的，完成祖国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的任务呢？

根据新的教育方针和学生的现存思想情况，在讲“两汉的文化”中科学技术方面的伟大成就时，一开头我就向学生指出：人类的知識不外乎生产斗争的知識和阶级斗争的知識。科学技术知識就是生产斗争知識，它是人們直接在劳动实践里积累和丰富起来的知識。兩汉时期，在劳动人民生产斗争的基础上，科学

技术方面有了巨大的发展和卓越的成就，而且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然后就遵照教材的系统具体讲述了祖国两汉时期在数学和天文学等方面的发明创造，并特别着重分析了科学技术发展的经济基础和知识与劳动实践的关系。最后，为了巩固新知识和进一步起到教育作用，就提出几个综合性的问题让学生考虑：“两汉时期在科学技术上有哪些光辉的成就？这些成就是怎样得来的？”“有哪些发明家、科学家？他们为什么会成为科学家和发明家？”“为什么会有这些发明和创造？这些发明和创造对生产会起什么作用？”待学生思考片刻，就又进一步指出：两汉时期的发明和创造都是与生产斗争分不开的，都是在劳动实践里逐渐积累和丰富起来的。科学家的发明创造都是劳动人民长期生产斗争的经验总结，当然也与他们自己的实践经验和辛勤劳动分不开。科学技术在生产实践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以后，就又进一步推动了生产的发展；在推动生产发展的同时却又进一步丰富和提高了科学技术。这就是知识与劳动实践的关系。这就说明了劳动者的贡献是很大的，因此我们也应该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劳动者。知识分子，不经过劳动锻炼和实际斗争的考验也是不能成为劳动者和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现在全国各地正在下放干部，今后大学毕业生，也必须首先分配到适当的生产单位中去，从事一年到几年的劳动以后，再根据专长和劳动中的表现分配工作。这一切都说明做一个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是我们最光明的前途。

另外，在初中一年级讲“两汉的文化”中“皇家图书馆和太学”部分时，也根据学生年龄特征和接受能力，正面地进行了做一个劳动者的前途教育。讲完教材后，就叫学生回忆已学过的历史，问他们：“汉代以前有皇家图书馆和太学吗？”都说没有。接着我说：皇家图书馆和太学在汉代以前是没有的，到汉代才有了，这在文化发展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你们都会亲身体会到，我们学校有了图书馆，你们就能经常看到很多新书；能上中学，就能在这里学到比较系统的知识。这是多么幸福啊！你们想想看，全班五、六十个同学，在解放前能够上中学的有几个？自己的亲友在过去能够上中学的有几个？这是什么原因呢？学生说穷得上不起。我指出他们说得很对，在阶级社会里，学校是为统治阶级培养人材的，汉代的太学和郡国学等就是为了把地主阶级子弟培养成为官僚而设的，一般人民很少有受教育的机会。今天的学校是劳动人民的学校，劳动人民及其子弟广泛地获得了受教育的机会。那么，这样的学校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材呢？学生回答说建设社会主义的人材。我于是对学生说，什么

样的人材才适合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呢？就是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身体健康的劳动者。你们将来毕业后，可以做一个有文化的新式农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也可以当理发员，服务员……，出路是非常宽广的，前途是非常光明的。在我们的国家里，劳动是最光荣的事情，工人和农民是最有前途的人，青年学生应把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看作最大的光荣。

## 五 进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

“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是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所提出的识别香花和毒草的六项政治标准之一。而国际主义又是与爱国主义密切连系在一起的，只有具有高度爱国情感和国际主义精神的人，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保卫世界和平事业中不遗余力地贡献自己的力量。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是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下面试举例说明我是怎样做的。

(1) 讲秦始皇打败匈奴、为了防止匈奴再度南侵建筑万里长城时，首先根据教材讲述工程的伟大和坚固，劳动人民在修筑长城的过程中所表现的坚强毅力，以及这个古代伟大的国防工程在长时期里阻遏敌人和保卫劳动人民生活、生产方面的重要作用。最后强调指出这是劳动人民在国防上的重大贡献。万里长城经过明朝的重修，直到今天仍然在祖国北方辽阔的原野上巍然地屹立着。我国劳动人民这种惊人的毅力和巨大成就，驰名中外，引起后代人的无限景仰。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和培养学 生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情感，我曾引用了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同志游览长城所作的赞扬诗：“听说长城万里长，头连东海尾西疆，几千百万劳动者，建筑兹城镇一方。”同时也介绍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罗夫同志“健步游长城”的故事：“……伏老一上城墙，他就让他的儿子量一量城墙的高低和宽度。……站在旁边陪伏老参观的王冶秋同志告诉他：‘这里的城墙是明代重修的砖城，平均高约三丈，宽约一丈五尺。传说城墙上可容五马并驰，如果把修城墙的砖石用来修筑一座高一丈五尺、厚三尺的大墙，可以环绕地球一周。’……这时，伏老看着城墙上完整无缺的城堞，用手抚摸着砖墙，……他认为经过五百年来，还能够保存原样，这真是建筑学上的奇迹……走下城墙时，他抚摸着石砖，拾起一块砖缝里的白灰土，想让他儿子拿回去研究中国的古代建筑；有人插进去说，可以拿一块砖回去。他摇了摇头，表示不能拿，然后他又很有风趣地说：‘如果来延长城的



人，每一个人都拿走一块砖，不是就拿光了吗？’陪同他的人还是赠给他了一块砖。当他把砖交给自己的儿子时说：‘要像保护你的心脏一样，保护这块砖，把它带回去，送给历史博物馆。’”（见1957年五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讲述这段故事时，学生的精神很集中，流露出喜悦兴奋的神情。

（2）讲战国的文学和科学时，关于“文学”部分，课本重点叙述了屈原爱祖国爱人民的高贵品质及其在文学上的卓越成就。讲课前我曾和学生谈话并看了文学课本，了解到学生对屈原的作品和经历在文学课里已较详细地学习过，比较熟悉。因此只就“屈原为什么是一个爱祖国爱人民的诗人”这一问题，作了重点分析，指出同情人民、热爱人民是屈原的思想情感的基本特征。他热爱祖国的风土，对祖国的山河，甚至一草一木，都寄以深厚的感情，在他的诗歌里不止一次地描写了洞庭湖的微波、长江的巨浪、江岸的花草、深山的雨雪。特别在他的不朽著作“离骚”里更表示要把自己的力量贡献给祖国。正因为他具有强烈的爱祖国爱人民的情感，他宁愿过着痛苦穷困的生活，也不愿离开祖国。他看到祖国的败坏，秦兵践踏祖国的土地，蹂躏着祖国的人民，感到悲痛、愤懑和绝望。他不愿看到祖国的最终毁灭，跳到汨罗江里自杀了。接着就指出屈原的时代和今天完全不同了，当时的屈原想为祖国贡献力量找不到机会，我们生活在幸福的新中国里是随时随地都有为祖国效忠的机会的。同时又指出屈原在文学方面所以有很高的成就，除了由于他具有丰富无比的想像力和美丽的辞藻外，主要的还是由于他有强烈的爱国爱人民的情感。屈原的诗歌现在已经翻译成许多种外国文字，全世界的人民都敬爱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1953年纪念世界四大文化名人的名单中就有屈原。他的成就已经被全世界人民看作人类的宝贵财富，这是中国人民的光荣。

（3）“两汉的文化”一章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课题。高中中国历史教学大纲（草案）说明部分中指出：“学生学习了高级中学中国历史，会更深刻地理解到：我国人民对世界历史的发展，特别是对亚洲国家的历史发展曾经发生过很大的影响；我国的科学文化在长时期里站在世界的最前列，对世界文化的发展有了巨大的贡献；我国人民从世界各国学习了许多优秀的文化成果，丰富了自己的文化生活。”因此在讲两汉的数学、天文学、医学、造纸术等方面的伟大成就时，我就强调指出我国两汉时期在科学技术方面，有很多成就都达到了当时世界科学的最高水平。如“九章算术”第一个发现了负数，得出了它的演算方法；开平方和开立方的方法，联立一次方程的解

法，都是最先在世界上提出来的。这部书反映出代数学和代数学在几何学上的应用的高度发展。讲到这儿，我就向学生说，现在举出该书卷九勾股章里的一个例子，看你们在“代数”里学过没有？“今有邑方不知大小，各中开门，出北门二十步有木，出南门十四步折而西行，1775步见木，问邑方几何？”学生异常兴奋地齐声回答“有”（见高中代数第一册第二章二次方程式部分）。我国古代的天文学家辛勤地仔细地观察天象，在我国的古代文献里，保存着十分丰富的世界上最早的天象记录，公元前43年我国人民观察日斑情况的记录是世界上最早的。张衡是我国古代伟大的科学家，他在天文学上有着很大的成就。他制造了非常精确灵巧的浑天仪，发明了世界上第一个候风地动仪，现在的地震仪，也还是应用与候风地动仪相同的原理来制造的。我们人民在几千年以前就有了自己的医学，东汉时候的张仲景和华佗，是我国卓越的医学家。张仲景的名著“伤寒论”是祖国医学的经典著作，到现在还是医师必读之书。蔡伦发明的造纸术是我国人民对世界文化的伟大贡献。原来朝鲜和日本也跟中国一样用简和帛写字，印度用白桦树皮写字，欧洲用羊皮纸作书写材料，写一部“圣经”要用三百只以上的羊皮，其昂贵可想而知。十二世纪，欧洲第一个造纸作坊在西班牙建立起来，1494年传到资本主义最先发达的英国。造纸术的发明对世界文化的传播和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待讲完全章后，就作出以下结论：第一，在劳动人民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两汉文化有了很大发展；国家的统一，为两汉文化的蓬勃发展提供了条件。这就说明知识与劳动实践的关系，文化发展的经济基础和历史条件。第二，两汉时期，我国是当时世界上文化先进的国家，有各方面的优秀学者，有科学技术上的伟大发明和创造，有丰富的文化典籍。两汉时期高度发展的文化，丰富了人类文化的宝库，给予亚洲许多国家以深远的影响。只是由于封建制度的长期束缚，特别是由于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大敌人的联合统治和严重压抑，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才落在西欧各国的后面。但在今天劳动人民掌握政权的新中国，劳动人民已有了充分发展智慧的条件，因此我国的科学技术又高速度地发展起来，无数的事实都有力地说明，在党的领导下，十二年内，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肯定能达到世界的先进水平。

总之，在历史课中可以向学生进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的地方是很多的，以上仅仅谈了几个例子，当然还是很不够的。

## 六 几点体会

通过多半学期的学习和教学实践，感到有以下几点认识和体会：

首先，深刻体会到加强自我思想改造的极端重要性。向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是一个新课题。尤其是对一个出身旧社会、世界观和人生观还没有彻底改造的知识分子，要想对学生进行好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确是有相当困难的。因此，这就向教师提出了一个严重的任务：积极进行思想改造，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使自己具有无产阶级的观点、立场和方法，成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不具有社会主义觉悟和坚定的无产阶级的立场，就不能以充沛的阶级情感去感染学生，就不能以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爱憎分明、生动活泼、心情舒畅的精神和情绪去影响和教育学生。因此，抓紧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参加实际斗争，彻底改造思想，坚决要做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成为具有马克思列宁主义人生观的无产阶级战士，应视为做好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重要前提，也是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进行得好

坏的决定关键。

其次，认识到向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就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阶级教育，它关系着整个青年一代的培养，也关系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它是贯彻毛主席提出的新的教育方针的中心环节。因此进行思想教育，必须遵照着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特别是教育方针政策，必须紧密结合当前复杂尖锐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以及祖国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实际。

再次，体会到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是各科教学共同任务，但各科必须根据各科的特点，通过具体科学知识和具体事例自然生动有力地去进行，有目的有计划有系统地去进行，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

最后，体会到向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还必须把学生当前政治思想上所存在的主要问题找准、摸清、摸透，针对学生比较普遍存在的问题，通过具体科学知识和具体事例进行正面教育，才能起到较好的教育作用。因为这是一个非常细致和复杂的工作，不深入、没耐心、简单从事是做不好的。

# 世界古代史课程中进行无神论教育的经验

苏联莫斯科市第六〇九中学女教师 X·M·沙比罗

对学生进行科学无神论教育是中等学校实施共产主义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对學生进行无神论教育中，历史课起着巨大的作用。

历史教师们在历史教学过程中积累了许多科学无神论教育的经验。但是这些经验尚未系统化，并未成为所有教师的财产。

在本文里我想介绍自己在世界古代史课程中对五、六年级学生进行无神论教育的一些经验。

按照我的看法，科学地、正确地解释当作社会意识形态的宗教问题，乃是使五、六年级学生形成无神论世界观的主要方法。

在解释宗教起源问题（见柯瓦辽夫：“古代世界史”第七节，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的时候，我力求达到使我的学生了解宗教并不是永远存在的；当人类意识到自己在恐怖的破坏性的自然力面前无能为力的时候，才出现了宗教。同时，我是以列宁的这一指示为指导的：“……野蛮人在跟大自然斗争时的软弱无力会产生对上帝、魔鬼、奇迹的信仰……”（列宁：“社

会主义与宗教”，三联书店1954年版第1—2页）

我对学生说，使用自造石器的原始人是依赖于强大的自然界的。他们因饥寒而受苦，往往成为狮、虎、穴居熊等凶猛野兽的牺牲品，这些野兽比起装备不好的人类来说是大为有力的。人们惧怕那些对于他们看来是可怕和不可理解的自然现象，如暴风雨、飓风、地震、日蚀、洪水、晝夜的更替等等现象。

由于不了解自然现象，不能解释自然现象和惧怕这些自然现象，人们就认为，这些现象是由什么最高的，超自然力——神所引起的。为了不“触怒”神灵，并讨好、供奉他们，人们便崇拜他们，奉献牺牲（礼物）给他们。

原始人最常看见暴风雨和伴随而来的雷与闪电。因此，古代欧洲许多民族里最主要的神就是雷神与闪电神。太阳神是最古老的一个神。人们惧怕黑夜，而喜欢白天的到来。他们就认为，“太阳突然发怒了，永长黑夜就会开始的”；他们怕亵渎太阳神，因此就供奉它。



当古代人們开始从事农業的时候，他們就愈来愈加礼拜太陽，因为沒有太陽，沒有太陽的光和温暖，就將沒有收获，而在旱灾时，灼热的太陽光会燒掉禾苗。

原始人既礼拜大地，又礼拜水、月亮和風。辽阔的世界对于他們說来，是不可理解的与可怕的，而且是住滿了許多誰也不知道的神灵，为了不触怒神灵，他們必須供奉神并献以牺牲。

这样，由于原始人不能解釋自然現象，由于惧怕和在这些現象面前的无能为力而产生了宗教——信神与礼拜神灵。

其次，我使五年級学生注意到宗教大約是在十万年以前出現，在这以前是沒有宗教的。

孩子們必然会发生这样的問題：“宗教大約是在十万年以前出現的。但是，为什么更早的时候就沒有宗教呢？要知道，更早的时候人們豈不是更加依賴于自然界嗎？”

在回答这个問題时，我是从恩格斯所指示的下列原理出发的：“但是，一切宗教，不是别的，正是在人們日常生活中支配着人們的那种外界力量在人們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反映中，人間的力量，采取了非人間力量的形式。”（恩格斯：“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33頁）

我对学生說，从五年級历史的第一課里我們就已經知道，生活并不是停滯不前的。逐漸地，人們随着劳动的发展和改善而发展和改善了劳动工具，同时人們自己也发展着，人們的思維与語言也在发展着。

有过这样的时候，当人們像动物一样地依賴于自然力，但是由于人們的思維还不够发展，就不能意識到这种依賴的狀況。需要經過許多世紀，人們的头脑才发展到能够观察自然現象，即使是歪曲地把自然現象想像成某种超自然力（神力）。仅仅在十万年以前，人們思維才达到了这样的发展水平。那时候，宗教便发生了，它是自然力在原始人意識中被歪曲了的、幻想的反映。

在“古代埃及的宗教”（見柯瓦辽夫：“古代世界史”，第十七节，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这一課題的課堂教学里，我对当作社会意識形态之一的宗教的发生原因与本質这一問題，作了进一步的解釋。

在这个課題里，我是按照下列大綱进行講述的：

（一）埃及宗教产生的原因

（二）奥西里斯和爱西斯的神話是关于神的死亡与复活的神話中的一个。

（三）相信陰間生活的产生。

在解釋埃及宗教发生之前，我問学生：“什么是宗教？最初，宗教是怎样并且为什么产生的？”我概

括了学生的回答說，像所有一切民族一样，埃及人在远古的时候是沒有任何宗教的。只有意識到自己在自然界面前是无能为力的时候，埃及人才开始礼拜自然現象。

古代埃及宗教像在曲鏡里一样，歪曲地反映了埃及国家的自然条件、埃及人生活与劳动的条件。埃及人之所以礼拜动物，是因为在远古时期他們主要的職業是狩猎。随着向农業的过渡，就出現了礼拜土地、太陽和水（尼罗河）。

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公元前五世紀时曾留居过埃及，他曾这样写道，在埃及每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叫淡海时期。这一时期，尼罗河泛滥着，尼罗河沿岸長而狹的埃及国家就淹沒在水中；埃及几乎是沒有雨的，尼罗河灌溉着大地，并使土地肥沃。因此埃及人就把尼罗河神化了，对它施以礼拜。

希罗多德把第二个时期叫做繁野时期。这是大地变綠，遍地开花的时期。古埃及人是农耕者，他們以奥西里斯神来作为本国植物繁盛的象征。植物生長不仅依賴于尼罗河泛滥，而且也依賴于太陽，就他們看来，太陽是活的，是尊严的。埃及人称太陽为賴神，而且供奉着它以祈求丰收。

按照希罗多德的說法，埃及一年中的第三个时期是塵海时期。埃及人居住在沙漠中的綠洲，从沙漠吹来的热風把大地变成灰塵。五十天一連不斷地从沙漠吹来热風——五旬風。这时植物枯萎了，塵海淹沒了全国。埃及人在这种酷热的和折磨人的热風面前是无能为力的。他們把这个可憎恨的沙漠想像成殘酷的、奸險的、随帶着五十个仆人的神——賽特（五十个仆人是与五十天風期相适应的）。

在講述的时候，我引导学生注意到埃及人礼拜太陽、尼罗河、風，但不礼拜雷、閃电和雨；他們礼拜鱷魚，但是不礼拜白熊，也不礼拜海象。于是我問：

“这是为什么呢？”学生經常回答說，埃及人仅仅礼拜他們在埃及曾經遇到的、以及与他們生活劳动相联系的那些自然現象和动物。

我詳盡地講述奥西里斯与爱西斯的神話。（把教科書原文作为講述的依据）孩子們总是非常有兴趣地听着講述，并且牢牢地記住这个神話。从講述这个神話中我提出了两个結論，并囑咐学生把結論記下。

第一个結論：这个有趣的神話是反映着在埃及一年的时序更替中植物的繁荣与凋謝。植物在五十天不断地从沙漠吹来的热風淫威之下枯萎而又复苏繁荣，埃及人就把奥西里斯作为这繁荣的植物的象征。

第二个結論：奥西里斯和爱西斯的神話，是我們第一次遇到的关于死了而又复活的神的神話，这样神

話在古代許多民族中都曾經有過。

“相信神會死，又會復活，這是怎樣發生的呢？”提出這個問題之後，我解釋說，埃及人長期看到埃及植物年復一年地在羅尼河泛濫後繁榮，而在熱風之時就枯萎。從這樣的觀察中他們得出結論：每年隨着熱風的到來，奧西里斯神便死去，而隨着泛濫之來臨重又“復活”。

在其他國家里，在不同的自然條件下，人們也看到秋冬之時植物宛如死去，而春夏之季則又復活了。他們和埃及人一樣地不懂得自然界的規律，不理解一年時序更替的原因，並且以為這是與他們之神之死和復活相聯系的。對於死了而又復活的神的信仰之所以產生也與人們從事農業和觀察種子有關。扔在土里的種子是“死去”了，但種子又長成谷穗，因此人們就認為種子是“復活”了。埃及人有時也不把奧西里斯當作一切植物的神來描述，只是把它描述為出了芽的種子之神。

回答了對於死了而又復活的神的信仰是怎樣發生的這個問題之後，我作出結論：“總之，相信死了而又復活的神不僅在埃及有，而且在其他國家里也有。它是由人們試圖解釋不能理解的自然現象（一年的時序更替，隨着時序更替而發生植物的“死亡”與“復活”）。奧西里斯和愛西斯的神話乃是關於死了而又“復活”的神的許多神話中的一個。

其次，我講述對陰間生活的信仰之產生。但這些材料並不是非要不可，可由教師自行處理，加以利用。

講述時，我以恩格斯在他的著作“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一書第二章開頭中所闡述的指示作指南：“……人們還沒有關於人體構造的任何概念，還不會解釋夢里的現象，所以就有了這樣一種想法，以為他們的思維與感覺並不是他們身體的活動，而是一種什麼獨特的東西——靈魂的活動，這種靈魂居住在人體之內，在人死後就離開肉體了，……。”（恩格斯：“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8頁）

我說道：當古代人們開始對生與死的現象加以思索時，他們才發現，人類除了肉體以外還有什麼靈魂。我問學生：“你們自己能不能夠判斷活的生物（人，動物）與死的生物之間有怎樣的區別嗎？”學生們幾乎總是正確地回答說：“活的生物會呼吸，死的則呼吸停止了。”

“總之，”——我繼續說——“活的生物、活的人會呼吸，但是僅僅在死到來時，呼吸才停止了。古代人們不懂得人體構造，不理解死為什麼以及怎樣到來的。他們僅僅看到這一點：活的會呼吸，死

的就沒有呼吸了，從而認為死之所以到來，正是因為呼吸從死者那里‘飛去’了。

“呼吸（Дыхание），精神（Дух），靈魂（Душа），這些都是同根詞。古代人們會把呼吸（Дыхание）叫做靈魂（Душа）。他們相信，靈魂居住在人體之內，當靈魂在肉體中的時候，人活着，呼吸着，當靈魂一離開肉體，呼吸就停止了，死就到來了。

“由於人們相信靈魂是像獨立的、不依賴於肉體的某種東西一樣而存在着，他們開始認為睡眠時，靈魂是暫時離開肉體的，而死後，靈魂好像是永遠地離開了肉體。”

我問學生：“一個人能夠夢見其他的人嗎？”——幾乎所有的學生都立即回答說：“能夠，能夠！”——“那麼，活人能能不能夠夢見已死的人？”班上通常的回答是：“能夠。”

我解釋說：古代人們不理解夢與清醒之間的區別。他們看來，生活在夢里好像生活在清醒的時候一樣。如果說活人會夢見死者，那麼，由於誤解，這個作夢者就開始臆想：“這是怎麼一回事？人已死去，死者的屍體已埋入土中（或把它燒掉）而他又來了。一定來的不是他本人，而是他的靈魂，這靈魂離開了肉體而且在什麼地方繼續活着。但是，靈魂住在什麼地方呢？”因為在清醒時沒有遇見過這些靈魂，古代人們就認為，靈魂是住在什麼其他世界，即死後世界。

對陰間生活，和對死後世界的信仰就是這樣發生的。

我把相信陰間生活問題同木乃伊和埋葬問題（這個材料我是按照教科書來闡述的）相聯系起來。

講述奧西里斯的法庭的時候，我強調指出：對陰間生活的信仰被僧侶、奴隸主們所利用；他們借宗教之助而力求鞏固自己對奴隸與農民的統治。我引導學生得出這樣的結論：隨着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出現，宗教變成為奴隸主鎮壓人民鬥爭的工具，變成為模糊人民意識的鴉片（欺騙）。

當人民起義之際，僧侶們以可怕的天罰恐嚇人民，而這種剝奪陰間生活的恐嚇乃是最可怕的恐嚇手段之一。

為了向學生指明，僧侶乃是奴隸主階級的一部分，我按教科書中的插圖“古代埃及宙宇地產上的勞動”（第32頁）來進行關於寺院和僧侶的講述。

在結束“古代埃及的宗教”這一課題的學習時，我引導學生掌握在教科書第31頁中所闡述的關於宗教的產生及其階級本質的結論。

× × × ×

在六年級課程中，“基督教”這一課題是對學生



进行科学无神论教育方面最主要的课题。

在“基督教”这一课题的课堂教学开始时，我用已学过的教材进行了综合性提问，这可以帮助学生更加深刻地掌握基督教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阶级根源。

问题：

(一) 从公元一世纪到三世纪罗马经济衰落的原因是什么？

(二) “蛮族”（罗马部族）是在什么时候并且为什么侵入罗马帝国的？

(三) 从公元一世纪到三世纪罗马帝国中奴隶、农民、手工业者以及佃奴的状况怎样？

(四) 罗马各省平民的生活怎样？

(五) 说明从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一世纪期间的奴隶、佃奴，农民和手工业者的起义。

我按下列提纲讲解新教材：

(一) 基督教产生的历史原因：

(1) 奴隶、佃奴、贫民起义的失败。

(2) 奴隶与贫民充满绝望情绪。

(3) 相信神遣的救世主。

(4) 对救世主的信仰，对死了而又复活的神的信仰和对阴间生活的信仰，三者的相互结合。

(5) 基督不是历史上的人物。

(二) 基督教是怎样成为世界宗教的：

(1) 公元一世纪到二世纪初的基督教会。

(2) 公元二世纪到三世纪基督教会组成成分的改变。

(三) 基督教教会

在阐明提纲中第一点的内容时，我说道：在广大的奴隶制罗马帝国境内居住着许多民族（在地图上指出罗马及其统治范围）。

各地奴隶、农民、贫民因遭受奴隶制罗马的压迫而受苦。他们在各处奋起斗争但遭到了失败。

奴隶群众特别沉痛地经历了斯巴达卡斯领导的起义的失败。

在公元后一世纪，由于斗争没有获得胜利，人民大众充满着绝望情绪，他们对自己力量丧失信心，对在反奴隶主压迫者斗争中的胜利也丧失了信心，并且开始期待着神遣的救世主。就这样，被压迫者无力摆脱剥削，他们的失望，不相信自己的力量便产生了新的宗教——基督教。基督教是当作“奴隶和解放了的奴隶、穷人和无权的，被罗马征服了的或被罗马融化了的民族的宗教”而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第二册，第409页）。

关于基督教的起源，一位法国共产主义者历史

家，积极进行反抗的斗士沙尔·恩斯廉说得好：“可以说，基督之所以胜利正是因为斯巴达卡斯遭受了失败。”（“宗教的起源”，外文出版社1954年版，第118页）

是的！如果奴隶、佃奴、贫民胜利了，那么新宗教产生的任何基础也都不会有的（任何悲观主义，任何绝望，任何无望的基础也是不会有的）。但是，奴隶与贫民没有胜利，而且也不能胜利。

新的宗教并不是立刻就被称为基督教的。

相信救世主是基督教最重要部分之一，这种信仰很快就在罗马帝国的各民族中传播开来。被压迫群众冀望得神之助，他们期待天使、期待天使会庇护他们并会解脱他们的苦难生活。随着时间的推移，基督的名字就愈来愈与为被压迫群众所期待的救世主固结起来。

实际上，基督并不是名字。“基督”一字在希腊文里意为“神之王”。

多种族的罗马帝国的奴隶与贫民长期地期待着救世主，期待它解救他们摆脱奴隶地位和苦难境遇，并在世上建立大家平等的制度。一年年在穷困、绝望、无望中度过，而救世主还是没有到来。无望情绪更加强化起来了。而且，渐渐地产生了传说，说：救世主已经到来，但被统治者抓起来并遭杀害，后来复活了而又升上天去。关于基督的“生活”与“奇迹”的传说（也包括基督的“复活”传说）成为新宗教的主要部分。

还在五年级的时候，已经分析过对死了而又复活的神的信仰是怎样产生的这个问题。因此，我问学生：“关于死了而又复活的基督神话，使你们回忆起已经学过的什么东方神话呢？”学生们回答说，这个神话与古埃及的奥西里斯神话相似。我使学生们回忆起，类似的关于死了而又复活的神的神话也发生在其他各民族那里。在美索不达米亚有过塔满斯的神话，在波斯有过密特拉的神话。欧洲人发现了南美洲，认识了当地民族的宗教，他们带着惊异的心情发现：美洲各族虽然从未与基督教世界发生交往，但在他们中间也存在着对死了而又复活的神的信仰。

这些事实帮助学生独立地得出结论：关于基督的“生活”和“奇迹”的神话和关于救世主的神话共同成为基督教宗教的主要内容，而这个关于基督的“生活”与“奇迹”的神话又是基于古代关于死了而又复活的神的神话之一而产生的。

加入到基督教宗教中去的第三个神话，是关于阴间生活的神话。人们认为，“基督复活了，但基督不是活在人们中间。那么，他在哪里呢？”为着回答这个问题，要利用早已学过的关于阴界、死后世界的神话。

人们把复活的神想像成活在阴间的威严法官，他审判死者灵魂，惩罚恶人，奖赏善者。对阴间里天堂

生活的幻想使被压迫阶级忍受苦难，使他们脱离了为改善自身状况的斗争。

新的宗教宣传说，奴隶不应该向自己压迫者复仇，神会惩罚他们，压迫者要遭受天上的惩罚。宣传服从，宣传奴隶与穷人因在世間受苦而将在天上受赏赐，这些为早期基督教所具有的特点，使新的宗教不但对统治阶级采取容忍态度，而且甚至使它成为统治阶级有利的与所必需的东西了。

上述一切让学生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基督不是历史上的人物，而是臆想的、神话的（像奥西里斯，塔满斯，密特拉等等一样）。

有时间的话，可以向学生讲述下面一些事实来证明这个结论。关于公元前一世纪和公元后一世纪时期所发生的事件，曾保存了很多同时代人的记述文献。但是，没有一个记述文献里提到基督这一词。基督的“生活”曾记述在名叫福音书的这本宗教书籍中。最初，有好几十种的福音书，是由不同时代的不同作者所记述的。它们之间有着如此惊人的矛盾，以致使教徒们要从其中选择四本矛盾最少的福音书，而把其余都宣布为伪书，并加以毁灭。不过，保留下来的四本福音书也是矛盾百出的。例如，对基督在何时诞生的问题，其中就有不同的说法。一本福音书上说，基督诞生于犹太王希律时期，另一本上说，是生于罗马总督克威里利亚时期。希律王死于公元前四年（即“基督诞生”前四年），而克威里利亚是在公元后六年任总督，也就是在“基督诞生”后六年。如果说基督是诞生在希律王时期，那么他就不能诞生在克威里利亚时期，反之亦然，这因为两者之间是相距十年的。

据说基督曾在巴勒斯坦地方传道，而福音书中说到的巴勒斯坦城及其自然条件，也是矛盾百出的、不确切的。譬如，仿佛基督曾“居住”过的拿撒勒在当时是完全不存在的。这座城市是在基督“死”后一百五十年方出现的。

大多数基督徒都在十二月二十五日庆祝“圣诞节”。而这也不是偶然的，因为在基督神话出现以前许久，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人们已在十二月二十五日庆祝塔满斯诞生，在腓尼基庆祝阿东尼斯诞生，在波斯则庆祝密特拉诞生。

十二月二十五日——这一天是开始昼长夜短的日子。还在远古的时候，农业生产者和牧人喜欢这一天，期望这一天。有些基督徒在一月六日（在阿美尼亚王国）庆祝“圣诞节”。这也不是偶然的，因为在埃及和希腊，于基督神话出现以前的许多世纪间，都在一月六日这天庆祝本国死了而又复活的神——奥西里斯和道尼斯的诞生。

由上述的这些材料看来，基督并非历史上的人物，基督神话的出现是与关于死了而又复活的神的古代东方神话存在相联系的。在课堂上时间不够的情况下，教师最好是利用这些材料同个别学生进行课外谈话，和在课外作业中利用它。

转到提纲的第二点时，我说，基督教会最初是奴隶与穷人参加的，基督教会会员理想着在世界上人人平等，互相帮助。

但是，从第二世纪中期起基督教会组织成分开始很快地变化着。奴隶主开始加入到基督教会中来，并逐渐地掌握了基督教会的管理权（关于富人加入到基督教会中来的原因，我是按教科书中的材料讲的）。

基督教会由奴隶主所控制，便开始大力宣传忍受苦难和顺从，宣传保护奴隶制度、剥削制度，同时允诺被压迫者因在人世受苦难而在“阴间”得到奖赏。就这样，从第二世纪末起基督教便变成剥削者阶级手中的压迫工具了。

罗马是一个大国，包括了当时文明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在罗马帝国全部领域内都出现了基督教会，大部分的帝国居民也都加入该会，结果就使基督教变成世界性的宗教了。

关于基督教会（课堂教学提纲的第三点），我是按照教科书里的教材来讲述的。

在课堂结束的时候，我作了简短的结论，说：好几百年奴隶和穷人们为争取自身解放而进行着斗争，但是，他们每次起义都遭受失败。由于对斗争方式获得拯救感到绝望并丧失信心，奴隶和穷人们便开始期待神遣的救世主。可是救世主到底是沒有来到，于是在被剥削者中间则流传说，救世主已经到来，而被当权者杀害了，后来又复活了，居住在天界。在那天界里，对生前作恶的人加以惩罚，穷人能顺从，死后则遣入天堂。

新的宗教在广大的拥有不同民族省邦的罗马帝国里建立起来，它就不能不汲取发生在几千年以前的旧宗教因素，所以关于死了而又复活的神的古代神话，以及相信阴间生活的神话就成为基督教构成部分的主要神话了。

最初，基督教乃是奴隶和穷人的宗教，不久富裕的奴隶主们便鑽进基督教会中来。宣传基督徒忍受苦难和顺从对于他们是有利的。他们把基督教会的领导权抓到自己手中之后，就开始欺骗人民，向人民灌输服从基督和皇帝的思想。

关于对基督徒施加迫害和变基督教为罗马帝国国教的问题，我是按教科书的材料在下堂课里讲的。

（郑铭奎译自苏联“历史教学”1956年第五期）



## 初中古代羅馬史的課堂復習

越南河內中華中學 戴日新

復習課是教學過程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卡爾曹夫曾說，“與其說是復習課，不如說是概括課：它的基本任務是總結所研究過的東西”（“小學歷史教學法”，人民教育出版社1953年版，第220頁）。這就是說，復習課不僅對於幫助學生鞏固知識有重要作用，更重要的是可以加深學生對已學知識的理解。下面，我想就自己對“古代羅馬”這一編的課堂復習談一下我的體會，希望得到同志們的指正。

“古代羅馬”這一編，在教學大綱（草案）和教學參考書中都給我們明確地指出，它在世界古代史中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在古代奴隸制國家中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通過這一編教材的復習，不僅要求學生把已學過的歷史知識系統地和有重點地概括總結起來，牢固地掌握它，更重要的是通過對羅馬這一典型奴隸制國家歷史的復習，使學生進一步理解奴隸制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

完成這樣一項任務，除了要求我們具有一定的政治修養和透徹地領會教材外，還必須恰當地選擇和運用教學方法。我體會這一堂課用談話法比較合適，可以在談話的基礎上進行分析和概括，引導學生自己得出正確的結論，並給以馬克思列寧主義觀點的評價。現將這一堂課的課時計劃和教學過程略述如下：

（一）目的要求：通過本編的復習，要求學生牢固地掌握有關羅馬史的下列知識：羅馬早期階級鬥爭的歷史關係；羅馬的對外擴張；大土地所有制的興起和奴隸制度的發展；羅馬的奴隸起義鬥爭；羅馬奴隸主共和制度的復亡和軍事獨裁政權的形成；奴隸制經濟的崩潰和西羅馬帝國的衰亡。並且要求學生進一步認識奴隸制度發生、發展和衰亡的規律，認識奴隸起義鬥爭是奴隸社會發展的主要動力。

（二）教學方法：問答式的談話法。（具體問題見教學過程）

（三）教學時間：一課時，四十五分鐘。

（四）教學過程：從略，僅摘記教師的要求、小結和學生的回答如下。

這一堂課開始的時候，教師向學生提出：“回憶我們過去所學的歷史，在歐洲部分的主要古代國家除了希臘以外，還有哪個國家？”待學生齊答“古代羅

馬”後，即引導到本課，進行一系列問答。

教師：古代羅馬公社解體以後，分化出哪兩個不同的階級？（指定某生）

學生：平民與貴族。

教師：什麼時候才出現貴族共和國？共和國形成以後，為什麼平民跟貴族還繼續鬥爭？結果怎樣？

學生：公元前六世紀末。貴族共和國形成以後，貴族掌握政權，對平民壓迫更殘酷，因而平民向貴族繼續開展反對奴役、爭取政治地位和土地的鬥爭。結果取得勝利。

教師（導引）：這只是形式上的勝利，以後隨着貴族勢力的發展和擴張，對平民的壓迫日益加深，甚至使平民破產淪為奴隸。

接着，教師在黑板上寫出時間、簡要史實和中心問題。（下面每次問答後皆如此）

教師：羅馬在什麼時候開始向外擴張？向哪些地方擴張？（由學生自動起立回答）

學生：在公元前五世紀開始向意大利本土擴張，公元前三世紀就向地中海地區擴張。……

教師：羅馬與迦太基怎麼會發生戰爭？在什麼時候？結果對羅馬有什麼影響？（指定一人答，兩人補充）

學生：……羅馬統治階級為了爭奪土地，……為了向地中海發展勢力，……而在公元前264——前146年與迦太基發生戰爭（稱布匿戰爭），雙方都是侵略，結果羅馬勝利，掠奪了北非等大塊土地和大批戰俘，掌握了地中海的霸權。……

教師（分析、導引）：這一次戰爭對羅馬貴族有利，他們取得大塊土地，把戰俘變成奴隸，使用奴隸勞動種植大塊莊園。戰爭給羅馬的平民帶來了更大的痛苦，使他們更多地淪為奴隸。這樣，在公元前三世紀以後，羅馬大土地所有制就興起，奴隸制也發展起來了，成為典型的奴隸制國家。

教師：羅馬的奴隸主對待奴隸是怎樣的？奴隸怎樣表示反抗？（要學生自動起立答）

學生：奴隸主把奴隸當做會說話的工具。帶鎖鐐，受飢餓，繁重的勞役，殘酷的鞭打，……使奴隸淪於死亡的邊緣，只有起義反抗……。

教师：在公元前二到一世紀时有哪些大規模的奴隶起义？对罗马有什么影响？（指定某生）

学生：有公元前138年西西里奴隶起义。……尤其是公元前73——71年斯巴达克领导的起义斗争最英勇，走遍了意大利半島，严重地打击了奴隶主阶级，震撼了奴隶制度，……以致奴隶主共和制度复亡。

教师（評論、导引）：是的，斯巴达克起义是具有真正的解放性的革命的立場。馬克思称道斯巴达克是一个“偉大的將軍……，高貴的性格，古典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者”（轉引自科瓦略夫：“古代羅馬史”，三联書店1957年版，第571頁）。列宁說“斯巴达克是約兩千年前最大一次奴隶起义中一位最卓絕的英雄”（列宁：“論馬克思恩格斯及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6頁）。由于奴隶起义的打击，迫使奴隶主不得不改变統治办法以加强其統治力量，宁願抛弃貴族共和制度而拥护軍事独裁政权。……

教师：軍事独裁政权与罗马奴隶主共和制度，在性質上相同嗎？为什么？（指定某生）

学生：政体虽然改变了，但性質仍是相同的，因为都是维护奴隶主利益的奴隶社会制度。

教师（导引）：这种軍事独裁政权国家，就是奴隶制帝国，它說明罗马奴隶主共和制度已复亡了，也說明在公元前一世紀以后奴隶制已发展到最高阶段，奴隶主对奴隶剝削压迫更殘酷，阶级矛盾更尖锐。……因而奴隶制社会内部正在产生崩潰的因素。

教师：罗马奴隶制經濟为什么会崩潰？怎样出现了“隶农”？（指定某生）

学生：……奴隶劳动排挤了农民和手工業者的自由劳动。奴隶来源减少。奴隶对劳动沒有兴趣，破坏工具，使生产力下降。……罗马奴隶主不得不改变土地經營方式，將土地分成小塊，出租給奴隶和破产的农民，每年他們收取高額租稅。这种租种土地向土地所有者交租的人称“隶农”。

教师（导引）：奴隶主將土地分成小塊出租，說明剝削方式的改变。这样，奴隶主就变成土地所有者（地主），奴隶就变成隶农。这表明公元二——三世紀罗马奴隶制度正走向崩潰，新的剝削制度——封建制度正在萌芽。

教师：罗马帝国在什么时候发生分裂？它的分裂說明什么問題？（指定某生）

学生：在四世紀（公元395年）分成东西罗马帝国。它的分裂，說明罗马奴隶制度进一步崩潰，趋向衰亡的边緣。

教师：西罗马帝国为什么会衰亡？什么时候灭亡？（指定两个学生分別回答）

学生：（略）

有兩人作答，一人补充，一人根据同学回答和补充在黑板上写出如下簡要提綱：

公元476年西  
罗马帝国灭亡  
的原因

- （1）奴隶、隶农起义（內因）。
- （2）日耳曼族侵入（外因）。
- （3）奴隶制經濟崩潰（內因）。

教师（訂正）：

公元476年西  
罗马帝国灭亡  
的原因

- （1）奴隶、隶农起义
- （2）罗马奴隶制經濟崩潰
- （3）日耳曼族的侵入（外因）。

（內因）

小結：从公元前六世紀到公元五世紀，一千多年的罗马奴隶制国家由于奴隶、隶农起义，日耳曼的侵入，……而灭亡了，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結果，这一发展过程是有規律的。它的灭亡，标志着西欧奴隶制制度的衰亡，也是世界古代史的結束；同时标志着封建制度的发生，也是世界中世史的开始……。

最后在黑板上出現一个历史簡表，这是在边提問边回答的过程中摘記下来的。簡表如下：

古代罗马 奴隶制社会 发展过程	公元前六世紀罗马公社解体，分化出平民与貴族，貴族共和国形成。	奴隶制 发生阶段
	公元前五——三世紀罗马向意大利本土扩张，平民日益淪为奴隶。	
	公元前三——二世紀布匿战争后，罗马在地中海的霸权形成。大土地所有制兴起，奴隶制度发展起来。	奴隶制 发展阶段
	公元前一世紀——公元一世紀罗马奴隶大起义，共和制度复亡，軍事独裁政权和奴隶制帝国出現。	
	公元三——四世紀罗马奴隶制經濟危机，隶农出現。	奴隶制 衰亡阶段
	公元四——五世紀罗马奴隶制衰亡（西罗马帝国灭亡）。	

（附一点說明：在复習过程中，有些学生回答得不完全，甚至有錯誤，但在每轉入另一問題以前，都經教师糾正过。）

（五）課后教学效果檢查：学生对这样复習很滿意，認為能有重点、有系統地領会主要問題，時間和历史事实能緊密地結合，能够使他們清楚地掌握这一阶段历史发展的基本綫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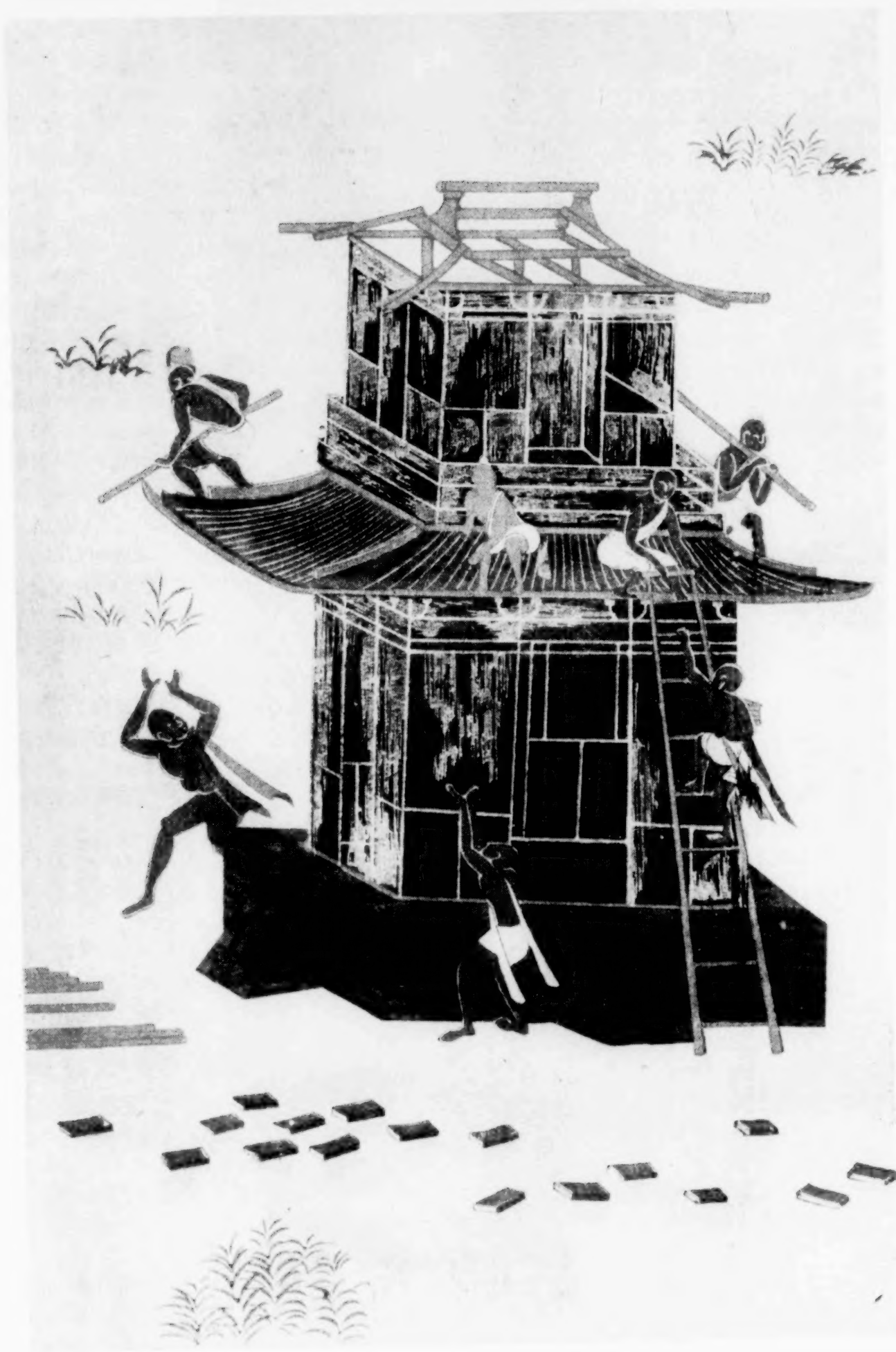


中國歷史參考圖片 (三十八)



圖一 唐明皇打球圖

宋李公麟原本，清丁觀鵬臨摹。采自北京故宮博物院影印本。



圖二 修造圖

甘肅省敦煌縣莫高窟第445窟，唐代壁畫。采自“敦煌壁畫選”。



